

炎黄春秋

田纪云：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龚育之谈党史人物研究

吴象：步云乡直选的历史意义

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

追踪两千多年前的战备工程

第 **6** 期

2004年

炎黄春秋杂志社主办

目 录

本刊特稿

- 1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田纪云
12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龚育之

一家言

- 15 步云乡直选的历史意义.....吴 象
17 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孟祥才

春秋笔

- 19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孙有光
25 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潘祝平
30 日据时期台湾的“文斗”志士.....钟兆云

亲历记

- 36 周总理与《中国青年》杂志.....邢方群
39 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杨培新
44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马洪林

往事录

- 50 在父亲王森然身边的日子.....王润琴
55 新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张 彦
59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张开善

怀人篇

- 65 铁骨金声 巍巍其人
——吕荧先生逝世35周年祭.....赵淮青
70 悼念袁晓园女士.....欧 初

求实篇

- 71 追踪两千多年前的战备工程.....王雪生
76 谁翻译了《伏尔加纤夫曲》.....达 生

文荟苑

- 77 发人深省的官署对联.....赖某深

编读窗

- 79 读者来信摘编.....汪龙义等

文配画

- 80 面谏与听谏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陈四益文 丁聪画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一鑫
李学勤 李维民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宋文茂 苏双碧 张 镏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范敬宜 钟沛璋 凌 云 曾彦修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徐 孔(常务)
杨继绳 吴 思

执行主编:

李 晨 徐庆全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底先华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理 事 单 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管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010)68522852 (办公室)
(010)68534879 (编辑室)
(010)68532048 (发行部)

传 真: (010)68532569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期刊网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 4.80元

回顾中国农村改革历程

● 田纪云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真正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鼓舞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国农业、农村迈向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开始谱写新的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虽然开始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但由于它顺民心,得民意,故犹如长江之水,滚滚东流,不可阻挡,不可抗拒,迅速普及神州大地。农村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解决了全国人民建国以来没有解决的衣食温饱问题,而且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现在如实的回顾一下中国农村改革的历程,分析一下它的伟大意义,将是十分有益的。

中国农业和农村走过的曲折道路

中国农民祖祖辈辈都是以耕种土地为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中国农民的本色。在旧中国,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80%土地和大部分耕畜、农具,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农、雇农、中农和其他劳动者,只占有20—30%的土地。广大农民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向地主租佃土地耕种,忍受残酷的剥削与压迫。可以说,“耕者无其田”是旧中国贫穷落后的基本原因。

在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工农红军依靠“打土豪、分田地”调动广大农民参战的积极性,所以能突破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堵,实现两万五千里

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在抗日战争期间,依靠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参战、支援前线的积极性,使抗日根据地得以发展壮大。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打垮国民党几百万军队进而解放全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广大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大大调动了广大农民参战、支前的积极性。可以这么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依靠武装起来的农民取得的,而农民参战的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保卫胜利果实——土地。从一定意义说,中国共产党的天下是依靠农民打下来的,农民的功劳比天高、比地厚!

但建国后农民的命运又如何呢?

建国前后,即从1947年到195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彻底废除了几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实现了祖祖辈辈所盼望的“耕者有其田”的愿望,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他们放鞭炮、扭秧歌、唱大戏、玩龙灯,一派喜气洋洋,庆祝自己的胜利。他们衷心拥护共产党,拥护毛主席。我自己于1946年下半年,即解放战争开始后也曾在山东朝城县(现莘县)一区任土改工作组组长,亲眼目睹了土改给农民带来的喜悦和争相参军保卫胜利果实的热情。

经过土地改革,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彻底翻身得解放,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这是解放初期能够迅速战胜困难,恢复经济,并顺利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改革初期,适应一家一户“办不了”或“办不好”情况,大量出现了变工队、耕田队、互助组等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他们为军烈属代耕,为鳏寡孤独帮忙。这种互助合作组织的宗旨是“自愿结合、等价交换和民主管理”,发展基本上是正常的。应该说,这种形式对当时贫穷落后、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农村来说还是需要的,对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促进作用。

然而,好景不长。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提出,要适当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这样,原来的互助组很快变成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虽然文件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是入社并非自愿,退社更不自由。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明确提出中国农业要走由初级社到集体所有制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路子,合作化的步子进一步加快。1955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尖锐地批评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等人是阻碍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的“小脚女人”,是“右倾机会主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更进一步助长了已经存在的急躁冒进情绪,高指标、浮夸风大大加剧。就这样,在实际工作中把总路线中说的“相当长的时期”变为了“相当短的时期”,把“逐步”变为了“跑步”,快了又快,初级社还未建起来就搞高级社,高级社还未搞起来就搞人民公社。谁慢了谁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小脚女人”,并把在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说成是“阶级斗争”,就要批,就要斗。因此,从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末,在不到三年时间里就在全中国范围实现了高级合作社,把农民刚刚得到的土地、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都“归大堆”了,“共产”了。虽然《决议》上也说对入社的生产资料要折价,要赔偿,但实际上既不折价,更无赔偿。用农民的话来说:“刚到土地屁股还没坐热呢,又被收走了”,“不仅把土改时分来的土地收归公了,把我们自己原有的土地也充公了,牲畜和农具也都统统归公了。”这是对

农民的第一次剥夺。

1958年初,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要用15年或20年至30年的时间,在工业生产和经济上“超英(国)赶美(国)”的目标。1958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同志主持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确认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进入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时期。在经济计划中搞“第二本账”,鼓励高指标,互相攀比。在急功近利思想的指导下,各地竞相争放农业生产“卫星”,《人民日报》报道的丰产“卫星”一个接一个,并提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有的地方放出的水稻“卫星”亩产达6万多公斤,小麦“卫星”亩产2万多公斤,花生“卫星”亩产1.5万多公斤。工业战线则掀起了“大炼钢铁”运动。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听取了汇报后表示非常赞赏这个县的工作,并提出“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要各地研究。国家统计局发表的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公报称,当年的粮食、棉花的总产量均比1957年增长1倍以上。1958年8月,毛泽东同志视察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发出“人民公社好”的号召,随后,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决议》认为,建立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在农村加速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决议》指出,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不是遥远未来的事了。

接着,“人民公社化”的风暴骤起,两三个月内,全国就实现了公社化,有的地区还建立了以县为单位的人民公社或县联社。“人民公社”把穷富拉平,强调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把一切生产资料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家畜家禽等都收归公有,取消评工记分,推行“吃饭不要钱”的“按需分配”方式,提倡“放开肚子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普遍建立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食堂。这是对广大农民的第二次剥夺。

1958年底至1959年上半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問題有所察觉,并试图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

风和“共产风”。1959年8月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本来是纠“左”的，即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但半路上杀出了一个“程咬金”，彭德怀大将军根据他到各地调查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上书毛泽东，陈述自己的意见。彭德怀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取得很大成绩的



邓小平、陈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

同时，指出不少人头脑发热，浮夸风滋长蔓延；所谓“粮食创高产、粮食翻一番”是自欺欺人，有损党的威信；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导致我们犯了“左”的错误，丢掉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等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看了彭德怀的意见后，认为彭德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于是，会议的方向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由反“左”一下子转为反“右”。八届八中全会对彭德怀等人作了错误的处理，并发出《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指示》，认为当时的主要危险不是左倾而是右倾，要求从上到下开展所谓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斗争”。从此，浮夸风、共产风非但没有刹住，反而越刮越凶，到处“插红旗拔白旗”，不知多少人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反右倾”的折腾下，加上1959、1960连续两年的自然灾害，农业全面大幅度减产，国民经济陷于空前困难，城乡市场供应紧张，浮肿病、非正常人口死亡大量出现。1960年冬，党中央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中央于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有7000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初步总

结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经验教训。1961年，安徽、贵州、甘肃、河南、湖南等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迫于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窘境，悄悄地搞起“包产到户”即责任田的办法，得到一些地方领导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毛泽东同志认为，这是刮“单干风”，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于是，1962年9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的号召，并对支持包产到户的邓子恢、曾希圣等人作出了错误的处理。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困难、带来的问题是什么、有多大，是现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邓小平同志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灾难。”（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115页）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是这样说的：“1977年6月，党中央派我到安徽当第一书记。安徽是个农业大省，又是‘左’倾错误的重灾区。‘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推行学大寨的那一套‘左’的东西特别积极，农村问题特别严重，农民生活特别困难……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样子，门窗都是泥土坯的，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

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我不能不问自己，这是什么原因？这能算是社会主义吗？人民公社到底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农民的积极性没有了？”“我刚到安徽那一年，全省 28 万多个生产队，只有 10% 的生产队能维持温饱，67% 的生产队人均年收入低于 60 元，40 元以下的约占 25%，我这个第一书记怎么能不犯愁啊？”“人民公社化后发生的三年困难时期，到处浮肿病，饿死人。据了解，光安徽省的所谓非正常死亡人口就三四百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过去‘左’了那么多年，几乎把农民的积极性打击完了。”（见 1998 年 4 月 30 日《中国经济时报》）对农村实际情况的了解，可能是万里之所以成为农村改革闯将的基本原因吧！

我本人 1965 年在贵州也曾率团到农村搞“四清”，亲历“人民公社化”的所谓“优越性”。人民公社一般是一乡一社或一区一社，以生产队（自然村）为单位，集体吃饭，打钟上工，敲锣下工。一年四季，何时下种，种什么，何时收割，怎样收割，一切听从公社指挥。那个时候，农民要想务工经商，会被当成不务正业，搞点家庭副业还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一家养几只鸡都有规定，超过是不行的。哪块地种什么都要按上边

的命令做。行距、株距都规定的很细。种的不对，就要拔掉。在这种制度下，农民简直成了公社的“奴隶”，失去了生产的自主权，更没有产品的支配权，也就没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劳动时社员们像一把扇面，一字排开，一小时休息一次，一次半小时，实际上出工不出力，磨洋工，聊天、吹牛、说空话。结果是，公共食堂办了不到一个月就垮了，连稀饭也喝不上了。中国农民被折腾得够惨啊！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粉碎“四人帮”之后，当时的中央领导提出“两个凡是”、“抓纲治国”等口号。“两个凡是”就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抓什么纲？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这就是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学大寨”等等都是毛主席的决策，都不能变。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在 60 年代初期是个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发建设山区、改变山区贫困落后面貌的先进典型，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却把它变成为在农村推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左倾错误的政治工具，搞什么“一批二斗三大干”，“以大批促大干”，“七斗八斗不停步，斗一步进十步，步步斗进一路”，影响深远，危害全国。万里说：“学大

寨实际就是推广以大批促大干，取消自留地，不准搞家庭副业，推行‘大概工’，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搞穷过渡。”

“所谓普及大寨县，就是不仅要农业学大寨，连工业、财贸、文教、卫生都要学大寨，大寨有什么工业？有什么文化？据说中学生都没有几个，大部分是文盲，怎么值得全国学习？这样学法只能是越大越公越‘先进’。”（出处同上）

回顾三年困难时期，到处闹浮肿，饿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达数千万，



广东番顺县龙山公社的社员在公共食堂里吃饭

比整个民主革命时期死的人还要多。是什么原因？刘少奇说“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现在看基本上是人祸，这个“人祸”就是瞎指挥，就是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左倾机会主义”。

多年来，我以为“合作化”是毛泽东同志的发明，是中国的“土特产”，后来我才知道，非也。它像“计划经济”的模式一样，是从苏联“老大哥”那里搬来的，无非加了点自己的作料。

请看苏联农业的集体化：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接受了农民平分土地的要求，使农村普遍小农化了，农民有了处理自己劳动成果的自由，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轻工业高涨，商业也为重工业积累了一些资金。新的实践使列宁改变了看法，他提出通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依靠农民对自己利益的关心，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1927年至1928年苏联在粮食收购问题上出现“危机”，斯大林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是“富农”的破坏。因此，一方面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打击“富农”，另一方面加快集体农庄建设。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工业与农业紧密结合为一个工场的社会。他认为，苏维埃制度不能建立在两种不同的经济基础之上，社会主义国有工业与小私有制农业是相互排斥的。斯大林不相信广大个体农民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认为必须想办法拴住农民，让农民听命于国家。

1929年11月初，斯大林发表《大转变的一年》，自上而下发动一场集体化运动。同年12月27日，他又提出从限制存有余粮的“富农”过渡到“消灭富农”。于是，全盘集体化就同他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结合起来了，成了一场急风暴雨，“富农”被扫地出门，财产被没收，有的被处死，有的被驱逐到边远地区。

在斯大林“为集体化的飞快速度而斗争”的口号下，靠行政命令搞集体农庄成了普遍现象，有2.5万名城市工人、干部下乡强行搞集体化，许多州提出的口号是：“谁不加入集体农庄，就是苏维埃的敌人。”这种强制政策不仅用于对付“富农”，也扩大到对付中农和所有不愿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民。农业被看成是国家工业化的手段和工具，农民则把集体农庄称为“第二次农奴制”。

中共中央关于加快 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原则通过)

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入了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一九七九年起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条件。我们只有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才能使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富裕起来，也才能促进整个国民经济蓬勃发展，加强工农联盟，巩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为此，中央特作如下决定。

一、统一全党对我国农业问题的认识

为了加快发展农业，全党同志对我国农业的现状和历

- 3 -

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业问题的决定(草案)

1933年1月，联共(布)中央宣布：“把分散的个体小农经济纳入社会主义大农业的轨道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2000多万农户被20多万个集体农庄所取代。集体农庄由国家选派的干部按国家统一计划进行生产，对农产品实行义务交售制。农民失去经营管理权，也失去了产品的处理权。

不愿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在绝望中屠宰牲畜，毁坏工具和焚烧谷物。1933年与战时困难的1916年相比，牲畜存栏骤降1/2至2/3，粮食总产跌入低谷，直到1952年粮食总产都低于1913年，但国家征购却有增无减。(以上摘自《苏联“农业全盘集体化”的教训》一文，见2001年5月7日《学习时报》)

看！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苏联的农业全盘集体化何其相似！

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说：“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去太多了，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损害。”遗憾的是，我们中国的

办法(苏联的办法加自己的创造)比苏联把农民挖得更苦。

1930年夏,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在莫斯科鲍曼区党代表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我国的集体化不符合列宁的原则,这种集体化按其方法与列宁的合作社计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中央领导人实行这一政策时没有同党商量,也没有同人民商量。”(出处同上)由此可见,苏联的集体化的悲剧是斯大林滥用自己的权力造成的。我们中国,也因权力没有强有力制约,在农业、农村问题上同样也发生了类似苏联这样的严重失误。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一大发明,一大创造,被邓小平称之为“农民的伟大创举”。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呢?说白了,就是土地归集体所有的性质不变,把经营权即耕种权承包给农民家庭,其产品在交纳国家税收和集体提留之后的剩余部分归自己,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1990年7月,我去看望一位老领导,他问我:“什么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不懂,不就是‘分田单干’吗!”我向他解释说:“所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有两层意思,一是土地这一农业的基本生产资料仍然归集体所有,性质不变;二是把土地的经营权、管理权包给农民家庭了,由集体与农民签订合同,一定多少年不变,承包期间,由农民给国家交税,给集体交提留,余下的归农民自己支配。所以,它同‘分田单干’还是不同的。”这位老同志听了后说:“噢,是这样啊,那同‘分田单干’还是不同嘛!”我说:“对!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

“包产到户”,也叫“家庭承包经营”,现在说起来很轻松了,一则因为大家都享受到了这一改革的实惠,二则它载入了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但这一改革,即使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是“不合法”的,因为它违背“两个凡是”,违背当时党中央的《决定》,也不符合当时的宪法(1978年宪法肯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按照传统观

念,就是搞资本主义。众所周知,安徽、四川一些贫困地区搞家庭承包责任制是冒了极大风险的,凤阳县小岗村村干部搞的大包干的“秘密协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农民实在无路可走了,他们要吃饭,他们要生存,继续走“一大二公”的路子实在走不下去了。于是,他们胆子壮起来了,有点天不怕地不怕了,要为生存而斗争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许多地方放手让农民去实践,去选择,去试验,只要有利于促进生产发展的就支持。地方党委慢慢地胆子也壮了起来。由于“包产到户”符合中国的国情,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中国广大农民的意愿,所以,在短短几年时间里,犹如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迅速在全国推开。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同意这样干,围绕农民这一伟大创举的不同声音和争论仍然不绝于耳。特别是当时不少基层干部因失去了昔日大集体、大锅饭时代的权力,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想不通,有的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更多的人则提出一系列的问题,比如:水利工程管理怎么办,大型农业机械怎么办,集体工副业怎么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办,计划生育怎么办,民兵训练怎么办,等等。言下之意是“单干不如集体”。

为了实地考察农村改革发生的变化,研究农民在实践中是怎样回答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的,1982年11月30日至12月28日,在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分管经济工作的时候,根据当时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万里的指示,我率领由有关部门参加的12人工作组赴山东、河南、四川作了近一个月的农村经济调查,撰写了三篇考察报告。这些调查报告客观如实地反映了当时农村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农村改革的喜悦和期盼,对我任副总理后在领导中国农村工作、坚持和完善农村改革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调查组写的三篇调查报告,先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作为内部文件印发,后由《人民日报》连载。

这些调查报告,以无可辩驳的大量事实说明:

第一、广大农民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衷心拥护在农村实行的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农村形势一派大好: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农业生产连年增产,基本解决了建国三十年来没有解决的吃饭、穿衣问题,到处呈现一片兴旺发达景象,新房多,林木多,牲畜多,赶集上会的人多,农村集市贸易空前活跃。所到之处,流传着许多赞美党的政策,赞美现实的顺口溜。例如:“大包干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



1993年6月,田纪云在全国人大八届二次常委会上

“过去‘三靠’(即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越靠越穷,现在‘靠三’(即靠三中全会路线),越靠越富。”“过去是:地瓜干当主粮,老母鸡是银行。现在是:粮满囤、油满缸,穿新衣、盖新房,光棍汉子娶新娘,大把票子存银行,日子越过越舒畅。”

第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村已扎了根,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家庭承包初期基层干部担心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正在解决。已经解决的有:水利设施的使用管理;农业机械的使用管理;集体牲畜的分包养用;作物布局的调整;集体债务偿还;烈军属、五保户的照顾;干部报酬;义务工的摊派;农田造林的收益分成等。正在解决的有:地块的调整;各种合同的签订;集体财务的整顿;提留的管理使用;机耕、植保的统包;集体工副业的承包等。

实践证明,广大群众是勇于实践、富于创造的,他们既然选择了大包干等形式的责任制,就一定会想办法完善它,发展它,使之更适应于生产力的发展。

实践也证明,责任制已经不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而是作为一种原则,在种植业以外的各个领域推广。人们说:“责任制是个宝,用到哪里哪

里好。”农业包,副业包,社队企业包,商业包,连农村教育也搞包干责任制。一个“包”字,打破了大锅饭、平均主义,大大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第三、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民购买力的提高,提出了改革商品流通体制、改革作为农村商业主渠道的供销合作体制的必要性,长期实行的由国家“独家经营”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了。调查报告提出了改革初步思路。

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深刻体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农村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强劲的生命力。也使我们深刻体会到马克思所说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物质利益有关”、“物质利益是人们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基本动因”的真正含义。

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中央并没有下命令,说一定要在哪年哪月全面推开,而是由于各地看到承包以后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性,然后很快自发推广的。有的地方想挡也挡不住。结果,实践证明凡是实行了家庭承包的地方,农业生产状况迅速改观,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在事实面前,绝大多数同志的思想逐渐统一起来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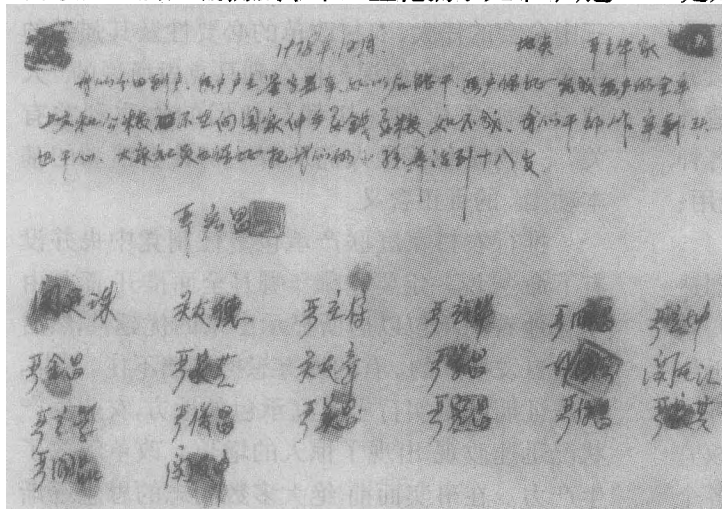
且在以后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最终形成了现在这种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农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伟大创新。其伟大之处就在于它使生产力最基本的要素——劳动者获得了第二次解放,而这一解放的实质,又在于使农民获得了对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的经营自主权,获得了对自身及其劳动所创造价值(大部分)的自由支配权。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在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的同时,乡镇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把它称之为“农民的又一伟大创举”。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其意义不限于农村,它使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道路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邓小平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持续了几十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乡镇。”(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238 页)过去我们搞工业化,主要是由国家拿钱投资,搞建设。而且这些投资多是搞一些重工业项目,这些项目资本密集,相对吸收的劳动力较少。所以我们城市中工业化搞了几十年,连

城市中本身新增劳动力都吸纳不了,“文化大革命”时不得不让 2000 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不用国家投资,只是在税收政策上给一些优惠,农民用自己的钱搞工业化建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吸收的劳动力相当于城市大工业三十几年里吸收劳动力的总和。有人说,乡镇企业对国家贡献少,税收低等,这是一面之词。殊不知国家一分钱没给它,它办起了那么多企业,安置了那么多劳动力就业,繁荣了经济,为市场提供了种类繁多的商品。出口创汇中,乡镇企业占了约三分之一。它一年拿出的用于以工补农、以工建农,用于公益事业的建设,用于办学校、办卫生、搞福利的钱等在 200 亿元以上。1991 年交的税款 454 亿元。乡镇企业的活力和效益明显高于国营企业。当然,乡镇企业在发展中也出现这样那样一些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进一步促进乡镇企业的发展呢?

1992 年 11 月中旬,我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经验交流会议,我在《解放思想,抓住机遇,加快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发展》的报告中强调,要加快中西部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步伐,继续提高东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水平,形成东、中、西部地区相互促进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对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的发展,我提出:1、要培养启用各类人才,尤其是大胆选拔和放手使用那些敢想敢干,善于经营,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各类农村能人,即使过去犯过某些错误但有一定专长的人才,只要基本素质是好的,就要大胆地启用;同时要以各种方式积极引进人才。2、实行“多轮驱动、多轨运行”的方针,乡办、村办、联户办、户办(包括个体、私营)以及股份制、股份合作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等一齐上,不限规模看发展,不限速度看效益,哪个“轮子”转得快就让它快转,在政策上要一视同仁,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3、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只要市场需要,保证质量,有效益,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违法乱纪,能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速度能多快就多快。4、因地制宜、合理布局、适当集中。尤其是乡镇工业企业不能走“遍地开花”的路子,也不能不切实际地搞消灭“空



1978 年,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干部签订的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

白村”之类的活动。而应从市场、资源、人才、交通、能源等综合条件出发,主要依托现有乡镇,相对集中发展,使乡镇企业与集镇建设同步推进,取得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双重成果。5、加强横向经济联合,充分利用当前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换代,以及沿江、沿边和内陆省会城市开放的大好时机,打开省门、县门、寨门,实行各种形式的东西联合、城乡联合、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联合,实行以东带西、以城带乡、以大带小,做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共同提高。6、培育和发展市场体系,这是加快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要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特别是广大农村市场。要打破垄断,搞活流通,积极鼓励农民和乡镇企业进入流通领域,并积极建立和充分培育人才、技术、劳务、资金等市场。这次会议制定了对中西部乡镇企业发展的一些具体的扶持措施,促进了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

坚持并不断完善农村改革

中国农村的改革,是一场真正的革命。正是这一场革命解决了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为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了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

这一改革从根本上废除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抛弃了归大堆、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体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这一基本生产资料交给了农民去管理、去经营。与此同时,大幅度的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民得以休养生息,并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允许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允许兴办乡镇企业等等;继而取消了实行多年的“统购统销”制度,陆续放开了绝大部分农产品价格,发展市场经济。农村的改革以及与之配套的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的出台,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和实惠,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充分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的意义不亚于全国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从而为我国农业生产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一举结束了我们这个十二亿人口的大国始终难以解决温饱的历史,奔向小康之路。从1979年开始,直到80年代末,可以说是我国农村的黄金

时代,连年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农民生活显著改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喜气洋洋、国泰民安的景象。

我从1983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1985年中央政治局确定由我分管农业和农村工作,亲自参加并参与指导了这一伟大变革的实践。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伟大而具深远意义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斗争。一些思想极其僵化、死死抱住“左”的马列教条不放的人,对家庭承包经营就是看不惯,就是不顺眼,说它是“集体经济瓦解的根源,资本主义复辟的风源”,必欲除之而后快。特别是1989年“六四”风波以后,有人甚至一心想把农民重新拉回到“一大二公”道路上去,并重新制定了《合作社章程》(草案)。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党坚决顶住了这股逆流,同这种僵化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也多次发表文章和讲话,反复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证明,家庭承包经营适应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符合广大农民的心愿,符合中国的国情,必须保持稳定并不断完善,这是关系国家大局的事情。只有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才能稳住八亿多农民的心;只有把八亿多农民的心稳住,才能把农业搞上去;只有把农业搞上去,才能把整个经济稳住;只有把经济稳住,才有利于社会和政局的稳定。我强调,中国农村的改革,使农民得到了“自主”、“自由”、“实惠”,这是农村改革最基本最实质的东西,也是被农民视作命根子的东西,农民有了对土地经营的自主权,有了对自己生产产品的自由处理权,当然也有了自己选择职业的权利,他们从改革中得到了经济实惠,这是农村改革之所以具有生机与活力的基本的动力。所以农村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最基本的改革不能动摇,一动摇生机和活力就没有了,人的积极性没有了,其他什么措施都没有用。我还说,不要心血来潮搞什么新花样,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

我在十三届八中全会的发言

十三届八中全会于1991年11月25日至

29日召开,会议主要是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为了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防止保守势力再次兴风作浪,我作了《关于稳定农村基本政策的几个问题》的发言,进一步阐述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坚定不移地稳定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稳定党的农村基本政策,是稳定大局,进一步推动农业发展的最基本因素。我国农村由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过渡阶段,农民有那么几亩地,可以亦工亦农,亦商亦农,能进能退,是一项最大的社会保险。这也是乡镇企业之所以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基本因素之一。所以农民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命根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观察,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等一系列农村基本政策,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适合我国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也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它不仅在八十年代,就是在现阶段仍有旺盛的生命力。不要随便乱刮风。

第二、坚定不移地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逐步发展集体经济。家庭承包仍然是集体经济的一部分,并非分田单干私有化。这是我们之所以要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制度的理论根据。实行家庭承包制,与人民公社时期的不同之处在于,已经由过去那种单一的集中经营变为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组成的两个经营层次。家庭经营在集体经济双层经营中属于分散经营层次,但是,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的范畴之内。这种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比过去人民公社生产队单纯的集中经营体制,由于符合农业生产经营的特点,而且符合中国的国情,更能为中国农民所接受,因而也更富于生命力。农村改革十年来的发展表明,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农村集体经济不仅没有因为家庭承包制而遭到削弱,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目前我们提出要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主要是加强和更好地发挥统一经营层次的作用,为家庭承包经营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而不是削弱家庭的自主经营权,更不是取消家庭经营层次。

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乡镇企业,是农民奔向小康、农业现代化、农村工业化的必由之路。发展乡镇企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商品的重要供应者,财政收入和外汇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国民经济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长远看,乡镇企业对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实现小康目标,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以及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等方面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在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的同时,要采取积极方针,坚持不懈地抓好乡镇企业,任何时候都不要摇摆。实践证明,乡镇企业发展了,就可以稳定农业,就可以增加农村就业人口,提高农民的收入。当前,农民增产不增收,是农村的一个突出问题。解决这个问题要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例如大力疏通流通渠道,搞好流通;适当增加国家农产品(粮棉油肉糖等)储备,实行丰歉调剂;适当增加出口;有计划地调整种植结构,适当增加经济作物面积;陡坡地逐步退耕还林,或林粮间作等等,都将有利于缓解增产不增收的问题。但我认为,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最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发展第三产业,使滞留在种植业上的大批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向多种经营发展,这是广辟就业门路,增加农民收入,农村富裕的主要出路。农民收入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对农业的投入也会增加,就可以扩大市场需求量,促进城镇工业发展,繁荣城乡经济。“七五”期间,全国农民纯收入净增量的一半来自乡镇企业。现在江苏、上海等一些乡镇企业发达的地方,农业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逐步减少,农民收入的增加主要靠乡镇企业。综观目前我国农村包括东中西部农民收入的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水平的差距所导致的。种植业方面的差距,单产的高低也存在,但差距不大。要实现“小康”目标,没有工业,没有乡镇企业的发展,仅仅靠农业是办不到的。可以这样说,要实现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二步战略目标,九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没有乡镇企业的继续发展是绝对办不到的。没有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就没有农村的小康,没有农村八亿多人口的小康,就很难实现全国十二亿人口的小康。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对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要坚定不移,不能摇摆。乡镇企业的发展是近年来小城镇繁荣和一批新的小城镇兴起

的主要经济基础。把发展乡镇企业建立小工业区同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是发展我国农村城市化的主要途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了,乡镇以及县一级的财政状况就会有大的改善。一些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乡镇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来自乡镇企业,日子好过多了。这些地方尝到了发展乡镇企业的甜头。

我在发言中还说,我们党在农村实行的这些

基本政策是成功的、得人心的,正是这些政策,大大激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使我国农业生产节节上升,登上了新的台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和成就。我特别强调:只有稳定农村基本政策,才能稳住八亿多农民的心;只有把八亿多农民的心稳住,才能把农业搞上去,才能把整个经济稳住;只有把经济稳住,才有利于社会和政局的稳定。

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说:“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人们就会说中央的政策变了……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稳定……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邓选》三卷371页)这就是结论。

纵观世界,古往今来还没有哪个国家是靠“一大二公”的集体化把农业搞上去的。原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都以彻底失败告终。现在仍然坚持农业集体化的国家,人民在忍饥挨饿,难以为继。再看世界上农业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从事种植业的人口很少,有的只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三,但农业却十分发达,不仅本国人民丰衣足食,而且大量出口农产品,赚取外汇。为什么?从根本上说,它是靠个人利益的驱动。



改革开放后,四川郫县农民在收割、脱粒水稻

我考察过不少西方国家的农牧业生产。他们基本上是以家庭农牧场为基础,以利益为纽带,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共同体,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国家扶持(轻税、无税甚至补贴)。这种形式,具有旺盛的生命力,长期活力不衰。其秘诀在于,它的生产是社会化的,但它又是由各个独立的家庭、个人利益连接而成,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无大锅饭可吃。

发达国家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切不可社会制度划线,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生产形式拒之门外。当然,中国人多地少,一般说,不可能形成几千亩、上万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但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逐步形成几十亩、上百亩、几百亩地规模的家庭农场还是可能的。政府应该积极扶持龙头企业,推动贸工农结合,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我认为,这是中国农村深化改革的方向,也是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别的唯一可行路子。

现在的问题是,必须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保护广大农民赖以生存、也是全国人民衣食之源的耕地(基本农田),那种任意拿农民耕地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恶政该结束了!

(责任编辑 杜导正)

关于党史人物研究

● 龚育之

共产党修史,从联共党史起,似乎就是综合论述党的发展的历史过程这一种格式,似乎正史就是如此,只能如此。其实,这种格式固然有它的长处,是现代修史、科学地修史所不可缺少的,但不应该用这一种格式来限制修史。中国历史悠久,修史经验丰富。中国古代修史,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有纪有传。本纪和列传,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可以说,人物传记居中国古代正史的主体地位。我们现在不来争主体地位,但是一定要看到,人物传记在历史上、在党史上有重要地位。没有众多的,鲜活的,生动的,有文采、有故事、有个性的人物传记,历史不就贫乏了吗?不就苍白了吗?不就只剩下几个社会发展阶段或几次路线斗争了吗?所以,要大大重视和加强党史人物的研究。

那么,何谓党史人物?这是个说来清楚又不容易说得很清楚的问题。

古史的纪传体,本纪是帝王的传记,这很清楚。当然,项羽,是列入本纪,还是列入列传?司马迁恐怕很费了心思。《史记》把项羽列入本纪,是司马迁自己定的,还是经过审批的?《项羽本纪》,显现了司马迁修史的胆识和文采。

列传是将相的传记,大官的传记,名人的传记。大与不大,名与不名,这界限就不大好掌握,也不知道要经过什么程序。解放以前,大官名人逝世,报上常说,要“宣付国史馆立传”,也不知掌握的是什么标准。我们共产党不讲这一套了。但我们的大官名人死了,什么人见报,什么人不见报,什么人详细报道,什么人简略报道,好像也有一定的规格。不过,这规格对于修党史,写党史人物传,顶多可供参考。如果就按这个规格来定名单,写党史人物,那就很容易,不需要修史者有

什么眼光和史识了。

何况我们共产党人修史,不能只看到大官名人,还得看到人民群众,我们的大官名人,是来自人民群众,联系人民群众,为了人民群众的。

所以我主张,党史人物的范围还是放宽一点为好。乔木讲写党史的三个新的态度(对人民斗争的态度,对党外共同奋斗者的态度,对党的广大干部和党员的态度),《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的十二个分篇(领袖篇,先驱篇,英烈篇,模范篇,军事篇,民运篇,隐蔽战线篇,政治经济建设篇,科教篇,文化篇,统一战线篇,国际友人篇),就展现了宽选的方针。

从现在已经写入党史或写了传记的情况来看,我认为还可以再放宽。

一是往多写经济建设人物方面放宽。

道理很简单,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嘛!过去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党史上当然就要多写军事政治人物,建国以后,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军事政治人物还很重要,但是,党史上就应该多写经济建设人物了。

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数字。数字能够说明问题,但总不能见数不见人吧。

现在党史上写经济建设,写了许多事迹。例如:建国之初鞍钢的恢复和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六十年代的大庆油田,六七十年代的尖端工业,七八十年代的宝钢,九十年代的三峡,新世纪的“神五”。《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里鞍钢写得稍多一点,宝钢就少写了几笔,陈锦华同志还就此向我提出意见。以后应该写得更充分,更周到。但是,总还是不能见事不见人吧。

的确,经济建设人物不容易写。据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讲中国近代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

钢铁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纺织业不能忘记张謇,化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航运业不能忘记卢作孚。“四个人物”这么一概括,中国近代工业的历史就给拎起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的半个多世纪的工业建设、经济建设,无论从规模上,从水平上,从成就上,都是那四个人所代表的事业所根本不可比拟的,我们难道不应该、不能够从中写出四个、十四个、四十个中国共产党搞现代经济建设的代表人物来吗?

近年来,关于两弹一星元勋的宣传,关于神舟五号人物的宣传,比较引人注目,党史人物研究要从这个起点上前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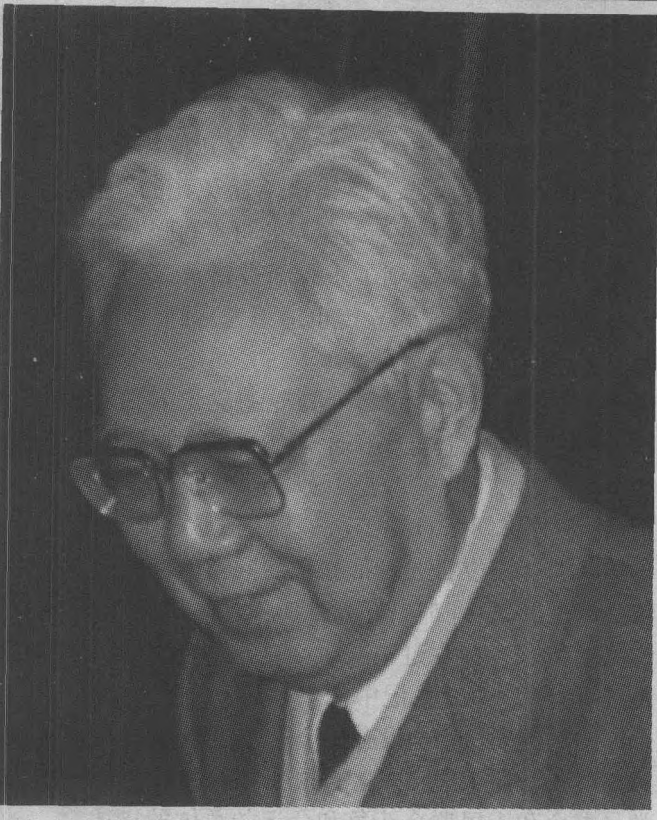
二是往多写科教文人物方面放宽。

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人物,前面说了,已经开始引起党史界的注意。当然,还要更加引起注意。在这里特别讲一讲还要注意社会科学方面的人物。

今年1月25日,温家宝同志亲自前往北京医院和协和医院,看望了两位老同志,一位是薛暮桥,一位是陈翰笙。薛一百岁,陈那天正是一百零八岁生日(茶寿)。这次看望,我以为意义重大。一是尊老,二是尊社会科学,三是尊马克思主义学者。尊一尊社会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老学者,应该说,现在正是需要的时候。这两位学者,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就是说,都是“载入了党的史册”的人物。陈还是写进了邓小平为宋庆龄所致的悼词中的人物。陈、薛写进《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是根据乔木所定的编写方针。编写出来送审的稿子,乔木看了,对把这两位学者写进党史还特别表示赞赏。《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本新修订的篇幅更大的著作,按乔木的三个新的态度做了许多工作,可惜没有把这两位人物写进去。《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著作,不是说,后来写的著作要亦步亦趋照搬《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而是说,《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的优点和长处不要忽略了,不要抛弃掉。希望第一卷以后再修订时,能够补上去。

三是政治人物也要放宽。

犯过错误、有过争议的人物写不写?重要的、影响大的还是要写。已经出版的党史人物传中,就有陈独秀。陈算不算“党史人物”,是有过争议



本文作者在全国党史人物研究会上(魏久明摄)

的,他后来被开除出党了嘛。但开除出党,不等于从历史上把他抹去,他如果在历史上有地位,是无论如何抹不去的。把陈独秀列入党史人物,这带了一个好头。其实,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就说过,将来修党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党史人物传执行了毛的这个指示。

由此就联想到胡耀邦。不是要把胡耀邦同陈独秀相提并论。完全不可以相提并论。就胡来说胡,胡耀邦从1980年2月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有党的主席和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到1981年6月被选为党的主席,到1982年9月在十二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这是没有党的主席副主席体制下的总书记即党的最高领导人),到1987年1月辞去总书记,前后长达七年之久。辞去总书记后,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逝世时,仍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悼词对他在党的历史上的贡献,特别是在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中的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估计。这样一位党史人物,在党史研究中是不是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呢?是不是也应该像别的许多重要领导人那样,由正式的机构组织力量,为他编选

集、写传记呢?

还有,为英烈写传,要不要也为被错杀的、冤死的中共党员写传呢?精选本军事篇中有先例,为许继慎、段德昌、曾中生立了传,这几位都是在十年内战中被党内错误路线错杀而冤死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杀而冤死的写不写呢?《中国共产党简史》里写到了张志新被错杀,这有胆识有气魄,我很赞成。立传也应该考虑到这样的同志。

除了劳动模范、战斗英雄这些党史人物外,比较不容易的是怎样写普通人物。我在党史札记中写过三篇文章,一篇是《读〈金凤自述〉》,一篇是《读〈冀朝铸自述〉》,一篇是《读〈张泽石自述〉》,这三位自述者都是我的同学,都有相当特殊的经历,也许都不好算是应该写入党史的人物。对此,我专门写过一段话:“把这篇《读〈金凤自述〉》列为党史札记中的一篇,是不是主张把金凤写进党史?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党史并不只是党的文件和会议,党的领袖和英雄,而且是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斗争和命运的总体的描述,一个一个的故事和经历未必能写进党史,而研究党史则不能不研究一个一个人的历史。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研究党史的人,要多读些各种人写的、写各种人在这时代中的经历的书。”

最后讲一个问题,我主张写党史人物眼界要宽,但也不能宽得没有边。提这个问题,不是虚拟的,而是经历了一件事情得出的结论。什么事情呢?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的李申同志,给我送来一封信和一摞材料,反映一位打着“周易应用”的招牌算命看相的先生,居然胡吹自己被作为重要人物写进了党史!据这位“预测学家”邵伟华自称,因为他的“突出贡献”,于2001年10月被写进一部党史(风采卷),“这不仅是党中央对我国传统文化《周易》、四柱等信息科学的继承和发扬的关怀与重视,更是对这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邵伟华先生及他的研究成果的最终肯定。”

我不相信有这等荒唐事,以为不过是邵和吹邵的人的信口开河。交给党史学会的同志去查,先是告诉我查无此书。要求再查,查来了结果:此书确有,而且是权威出版社出版的大型多卷本,但只有中央卷和各省市自治区卷,都属正规,没

有什么《风采卷》,也查不到关于邵伟华的记载。我以为就可以用“查无此书,实属信口胡吹”十个字回答李申了。但又一想,还是再向此书主编问问吧。一问,结果不像我想的那样简单,此书确有一本卷外卷《风采卷》,是答谢这套大型出版物的赞助单位和个人的,不公开发行,只分送赞助者。邵伟华得讯,出一万八千元赞助,还拿出他与党的领导人的合影,编者不察,让他钻了进来。

2002年10月,邵伟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们胜利了!》,说什么这一天是“中央党史编委会”把邵伟华“载入党史一周年”,并建议把这一天定为“《周易》节”!须知,“中央党史编委会”这样的机构是根本没有的!合影照片是很容易伪造和合成的,清末戊戌政变之后,什么人要陷害别人,就到照相馆里把那人的照片同康有为的照片合成在一起,就可以把它当作那人是“康党”的“证据”!何况就是真的合影,本身也不能说明什么。邵伟华是什么人?据他自我介绍:“说白了,就是研究算卦,算命的”。他的事迹,据他自我介绍,就是能算出人的死亡之灾和牢狱之灾,并能为之化解。他的先进性,就是亲自给达官贵人算命,收费很高,贫民百姓来算命,他就介绍给他的徒弟,每次只收六百元!他的著作《周易预测学讲义》、《周易预测例题解》、《四柱预测学》等,经审定被定性为“名为宣传科学,实为卜卦算命,宣扬迷信,社会影响很坏”,并且宣扬到这样荒谬的程度,说什么毛泽东主席领导解放战争的胜利,就是依据于周易预测,依据于八卦布阵!因为这个缘故,上个世纪90年代新闻出版署曾几次查禁此书和此类书籍。我手头还有一份新闻出版署1995年新出图1300号文件,就是为处理此书对下属新闻出版局的批复。现在邵伟华宣布“我们胜利了”,是对新闻出版署的胜利吗?还是对什么的胜利?

据那部多卷本的党史书的主编告诉我,他并没有看过这本卷外书,这本卷外书也不公开发行,他已叫经手此事的人告诫邵伟华,不得再以这本书作为宣扬自己的资本!

我是收到李申的揭发信才去请人调查的。除了把查来的结果告诉李申之外,我还能同他说什么呢?只好说:“党史人物编纂,谁交钱谁就能列名,此风若渐,夫复何言,夫复何言!”

(责任编辑 杜晋)

步云乡直选的历史意义

● 吴 象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健全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完善公开办事制度，保证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这是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的。《步云直选》一书的出版，无疑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弘扬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起到了促进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内外瞩目，举世公认。而政治体制改革却举步维艰，明显滞后。对此，邓小平曾经表示忧虑。他在1986年9月3日同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谈话时说：“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他还有一次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我们所有的改革

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可惜，不争的事实仍然是，关系到整个改革成效的政治体制改革继续滞后，进展甚微，而且似乎越来越成为敏感的话题。当然，应当承认，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困难，要充分估计其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决不能急切从事，一哄而起，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秩序地进行，采取既坚决又慎重的方针。

1997年党的十五大就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曾提出明确要求，并指出城乡基层政权机关和基层群众性组织，都要健全民主选举制度，实行政务和财务公开，让群众参与讨论和决定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在这方面值得称道的是村民自治。迄今全国所有90万个村先后实行直接选举，建立了自治的村民委员会。据民政部考察，其中60%左右进行得比较成功，经过激烈的竞选，村民得到了民主的训练，提高了

参与管理政事的愿望和能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人作过调查，对此也有积极的评价。尽管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牵涉到众多深层次的体制性矛盾、结构性矛盾，村民自治可能解决的问题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由于整个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甚微，村民自治的成果也不能不大打折扣，但实践毕竟已经证明，借口农民文化素质低、民主观念差、宗族封建势力影响大而否定村民自治，实质上不过是想剥夺农民合法的政治权利。必须破除这些借口，把蕴藏在农民中的巨大创造力进一步解放出来，完善村民自治，巩固和扩大村民自治的成果。

既然一个村能实行直接选举并取得良好的效果，那么，一个乡、一个镇能不能实行直接选举呢？在许多地方犹疑不决的时候，四川省遂宁市市中区1998年底在步云乡进行了一次大胆的试验，通过直接选举建立了乡政府新的领导班子，结果怎么样呢？选民参与的积极性之高是出人意料的，干部受教育之深也是出人意料

的。近四年来,直接选举产生的这个新的领导班子,廉洁奉公,比较重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确实为全乡人民谋取福利,为全乡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人们自然想要知道,这次选举是怎样组织的?选举的程序有哪些?在指导思想上有过一些什么考虑?进行过程中遇到过一些什么阻力和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等等。所有这些,《步云直选》一书和其它报刊都有详细记载,不必赘述。这里只想着重指出一点:如果人民不能决定干部的命运,就不是真正的当家做主,民主仍然是一句空话;如果人民能按自己的意愿选择干部,决定干部的去留,民主就落到了实处,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就会为之一变,从根本上遏制腐败也就有了希望。

为什么这样说呢?

现在不负责任的太平官太多了,他们奉行的原则是不

做事没事,做事就出事。只看领导颜色,只重复上级说的话,而不去具体化,并把真话变成空话,有人为这种太平官画了个像:“要发文件,等待实践。要去实践,等待文件。啥都不干,难找缺陷。不做事情,不担风险。组织考察,没有缺点。如此结论,形成经验。”太平官得到赏识、重用、升迁,导致干部队伍中认真工作、讲求效率的越来越少,逢迎奉承、跑官要官的人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后果堪忧。我国不少地方的乡镇干部,过去并非没有选举,但候选名单是上级定的,参加选举的人是受控制的,选举只是走走场,很难反映群众真正的意愿。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决定干部命运的只是少数几个上级领导,干部自然很难意识到自己是群众选出来的公仆。步云乡冲破了传统的做法,实行了真正的民主,其效果也就与过去形式上的民主大不相同了。这一点,

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也就是步云乡经验的最可贵之处。

二十多年前,一个寒冬的夜晚,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户农民实行土地大包干,其历史意义当初并未得到普遍的重视,但正是这一星星之火,燃起了农村改革的熊熊烈焰,启动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

四年前,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的直接选举,同样没有引起普遍的重视,但这并不能说它没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基层单位人民的积极性。步云乡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行乡政权的直接选举,是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新的突破,如果能得到重视和推广,必将激发广大农民潜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大大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创造新的辉煌。

(2002年11月18日)

(责任编辑 杜晋)

中华行政区划歌

● 王文奎

据有关报刊披露,周恩来总理曾将我国当时三十一个省、市、自治区的名称写成一首(四句)七言诗。随着海南省、重庆市(直辖)的设置和港、澳回归后分别设立的两个特别行政区,原诗已不能准确表述目前的行政区划概况。本着与时俱进的精神,故在周总理原诗的基础上,扩写为一首七言八句中华行政区划歌诀。

两湖两广两河山^①, 四江三海二宁安^②。

吉福云贵川甘陕, 新藏内台北重天。

港澳特别行政区, 一国两制前程宽。

企盼早日金瓯圆, 共书中华锦绣篇。

注:①两湖——湖南省、湖北省;两广——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两河山——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

②四江——江苏省、江西省、浙江省、黑龙江省;三海——上海市、海南省、青海省;二宁——辽宁省、宁夏回族自治区。

附:周总理七言诗

两湖两广两河山, 五江云贵吉福安。

四西二宁青甘陕, 还有内台北上天。

秦汉时期反贪的启示

● 孟祥才

秦汉大帝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走向成熟的开端,无论是辉煌的事功和灿烂的文化,还是繁荣发达的社会经济,都达到了一个后代王朝长期难以企及的高度。尤其是所谓的西汉文景之治、昭宣中兴,东汉建武、永平之政等,皆堪称一代盛世。然而,贪污腐败的问题就像帝国的孪生姊妹一样始终伴随着帝国的行程。尽管秦汉帝国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对反贪和澄清吏治进行了较大的努力,也曾取得了相当成就,但却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吏治崩溃和政权瓦解的悲剧。纵观秦汉的反贪史,不管是其中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无疑都是留给后人的珍贵启示。

第一、必须对贪污腐败的巨大危害性保持清醒的认识。秦商鞅,西汉董仲舒、贡禹,东汉王充、王符、仲长统等当时的思想家,都反复指明了贪污腐败对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权侵蚀的严重性。事实上,秦末的腐败流行和兵徭征发等急政一样,都是秦二世灭亡的关键因素。即便是社会经济没有接近崩溃边缘的西汉和东汉后期,也由于官吏的贪污腐败和横行不法,直接造成了民众对现政权离心离德的社会大危机,并进而分别演变为王莽代汉和东汉在张角起义、董卓篡权、军阀混战等事变冲击下走向瓦解。因为,吏治腐败的直接受害对象肯定是广大无辜的普通民众,无论是横征暴敛、贪赃枉法、损公肥私等种种花样,最终的后果和负担还是不合理地压在他们的头上。所以,民众对官吏的贪污腐败最敏感也最仇视和痛恨。如果出现贪污腐败问题,他们会在忍让承受寄望于政府处理的同时,也以各种手段表达自己的不满和反抗。一旦现政权缺乏或者忽视了对贪

官污吏的有效控制,当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来自社会中下层的反抗风暴必然会起来以雷霆之势荡涤一切官场丑恶,秦、新朝和东汉的倒台都是如此。当然,这要以巨大的社会性牺牲为代价。所以,为了尽量避免发生伴随王朝覆灭而来的巨大社会震荡和破坏,清醒的统治者总是对贪污腐败的危害性保持高度警戒,坚持不懈地抓好反贪工作。

第二、构建严密的监察机构是反贪有效进行的必备前提。秦汉反贪的主要成功经验之一就是很大的投入构建了由中央到地方成完整体系的监察网,东汉时遂基本定型为:尚书令、御史中丞、御史、刺史、郡守(兼)、督邮、县令、长(兼)、廷掾等共同构成的庞大监察机构,并配备有相当数量的监察官员。实践证明,当整个政治大环境比较健康的时代,秦汉监察机制确实收到了澄清吏治的良好效果。但也存在着较明显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彻底。例如郡守、县令、长是地方长官,但他们同时也为辖区内的最高监察官,都是集地方行政与监察权于一身。监察权与行政权分离不彻底,不但容易造成监察与行政的互相干扰,不利于监察的进行;更重要的是由于监察权的不独立,就使其经常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从而使秦汉时代的监察在效能上大大弱化。郡守和县令、长集行政、监察权于一身,他们自己却没有同级监察。督邮、廷掾等既为监察官又同时为郡、县长官的属吏,他们在行使监察权时当然必须秉承行政长官的意志,因而不可避免地使监察权屈从于行政权。然而,监察权一旦独立,监察体系又成为不受监督的独立王国,为害更烈。这是中国封建王朝难以跳出的怪圈。

第三、反贪污腐败的主要武器只能是法律,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从《秦律》开始,就继承了战国法治文化的成果,规定有详细的以惩治渎职和贪污腐败为主要内容的官吏法规,对各级官吏的违法行为都用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了以“轻罪重罚”为特色的惩罚标准,对贪官污吏有着强大的震慑力。此后的《汉律》也基本继承了《秦律》的精神,并有意识地加大了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西汉武帝朝、东汉明帝朝都是如此。此外,两汉在通行法律之外还规定有《刺史六条》、《三互法》等专门的监察法规,分门别类地针对各种贪贿行为予以惩治,确实做到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情况则时好时坏,像汉武帝、汉宣帝、汉明帝等都基本上做到了有法必依,既不以贵、官抵罪,也不因功废法,保证了法律在反贪领域中的权威性。但更多时候,法律都受到了皇帝、贵戚、宠臣们的破坏,尤其是西汉中期以后,强调人治的儒学理论导入汉代法律之中,有罪不罚或同罪异罚的所谓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宪等“八议”大行其道,对贪官污吏以各种名义逃脱惩罚打开了方便之门,从而加速了西汉中、后期腐败之风的蔓延,这一历史教训值得后人吸取。

第四、官府直接经营工商业,虽然有利于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状况,但却极易滋生严重的腐败问题。这不仅表现在官员直接从中损公肥私,大肆侵吞,而且往往会与商人共同勾结,出卖经济情报,或故意贵买贱卖,以此谋取一己私利。同时由于官吏直接经营工商业,也会严重败坏官吏的形象,毒化吏治空气。汉武帝朝所以在强化反贪力度的条件下仍难以有效控制腐败的蔓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推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等官府经商政策。王莽新朝吏治的迅速腐败至不可收拾的程度,主要原因也在于此。

第五、统治阶层奢侈享受的不正之风,不仅浪费大量的社会财富,也是贪污腐败产生的重要根源之一。因为不论在任何一个政权中,官吏的合法收入总是比较固定和有限的,而奢侈享受就像无底洞一样,永远也难以得到满足。如果奢侈享乐形成风气,许多官吏便难免会走上贪污受贿、谋取不义横财的绝路上去。西汉、新莽、东汉后期的数次吏治腐败高潮,也都与由皇帝、外

戚带头掀起来的奢侈歪风有关。倘若奢侈无度得不到有效地控制,则无论怎样加大反贪力度也难以收到良好的效果,因为在享受贪欲的刺激下,贪官污吏总会层出不穷的涌现,直至吏治彻底崩溃的绝境。

第六、民众在反贪中要有发言权。秦汉反贪的一个成功经验就是在制度上保障民众参与反贪、揭发贪官污吏的权力,尽管这种权力实际上在逐渐减弱。两汉都有授权民众进京告发地方官吏横行不法的言“变事”制度,东汉时还把民间舆论即所谓的民谣作为黜陟官吏的依据之一。许多贪污腐败的大案就是在民众的揭发下败露的。其中道理也很简单,贪官污吏们无论怎样试图遮掩贪污腐败的事实,虽然可能逃脱上级的监察,但要完全逃脱民众的眼睛是不可能的。关键在于反贪过程中必须避免不应有的黑箱操作,不能单纯依赖往往有官官相护嫌疑的官僚队伍自身,要鼓励民众,并努力创造有利条件,让民众敢于也乐于参加到反贪中去。这样,哪怕是再隐晦的贪污腐败丑行,也会大白于天下。

第七、表彰廉吏、提高官吏自身修养水平对保持官吏廉洁奉公是必要的,但不能对其作用估计过高,更不能迷信。因为品质优异、能够自觉做到廉洁奉公的官吏永远只能是少数,从整体上要求官僚队伍达到他们的道德水准是不可能的。譬如汉宣帝反贪就特别重视表彰廉吏,希望全体官吏们都能以他们为榜样,可实际效果并不见佳。一方面贪官污吏们决不会按照榜样们的标准来修正自己,还是在利益驱动下照贪不误;二是反而出现了许多沽名钓誉的伪君子,像王成、黄霸等人的清廉美行都是人为宣传出来的,当谎言被戳穿以后,更加剧了腐败问题的恶化。这种情况在东汉尤其突出。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秦汉反贪皆以失败而告终的结果,证明了在专制主义政体的条件下,想要比较彻底地解决吏治的贪污腐败是不可能的,而只能取得一些局部的、阶段性的成果。中国古代社会所以不断上演“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悲喜剧,原因之一也就在这里。

(此文原载王春瑜主编的《中国反贪史》,另两位作者为范学辉、宋艳萍。本刊转载时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 孙有光

1949年,我在中共中央社会部便衣保卫队工作,这支部队直接受李克农部长领导,队长高富有,指导员焦万有,副指导员沈平。按照李克农部长指示,我们队负责中共中央驻地香山至西直门公路沿线的便衣警卫工作。队部住颐和园内的东七所,颐和园内的保卫工作也归我们队负责。高富有队长还兼颐和园管理处主任。柳亚子先生是1949年3月底由六国饭店搬进颐和园住的,他的生活管理和警卫工作全归我们便衣队管,因此,我亲眼目睹了柳亚子先生发牢骚、打门卫、骂哨兵和打管理员,周恩来副主席对柳亚子先生的批评及田家英同志给柳亚子先生送毛主席写的《七律·和柳亚子先生》的经过。现回忆如下。

一、中共中央号召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柳亚子应邀北上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安排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来解放区,准备于1949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柳亚子先生偕夫人郑佩宜女士于1949年2月27日,由中共党员乔冠华等同志协助送上一艘挂着葡萄牙国旗的“华中号”海轮。由金仲华、罗雁子、赵凤扶等护送,同行的还有陈叔通、叶圣陶、马寅初、张纲伯、沈休兰、傅彬然、刘尊棋、宋云彬、徐铸成、赵超构、郑振铎、包达三、王芸生、曹禺及随行家属等男女老幼共27人,他们乔装改扮,有的冒充船员,有的扮作管舱员或管账先生。柳亚子先生身穿灰色长衫,目光炯炯,按捺不住满心的喜悦。他心里十分清楚,伟大的事业在远方召唤。1949年2月28日,“华中号”海轮自香港启程时,他赋七绝一首:

六十三龄万里程,前途真喜向光明。

乘风破浪平生意,席卷南溟下北溟。

在从香港北行的海轮上,每天晚上总是有兴趣盎然的晚会。柳亚子一路放歌,豪情满怀,经过6天的航行,于1949年3月5日到达山东烟台。海轮靠岸,烟台市徐市长和驻军贾参谋长已在码头上热情迎接。

3月18日上午10时,专车抵达北平,北平市长叶剑英、民主人士沈钧儒、郭沫若、李德全、许广平等数十人在车站热烈相迎,面对如此热烈的礼遇,柳亚子心潮激荡,即撰《抵北平感赋》:

旧游十五年前事,此日重来一惘然。

尊酒碧云应告慰,人民已见太平年。

是夜寓居东郊民巷的六国饭店。翌日傍晚,叶剑英设宴,为柳亚子一行洗尘,出席者有李维汉、齐燕铭、连贯等人。叶剑英致欢迎词,指出:此刻犹如百里征途刚刚开始,今后要在军事、政治上继续取得胜利,尚相当艰苦。即使一切反动势力俱已铲除,犹如辟一平地,其一切建设也非容易,贵乎大家的努力合作。

席间柳亚子和陈叔通相继发言。柳亚子非常高兴,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大呼万岁,彼得意。尽黄酒十余大杯,数年来无此乐事矣。”柳亚子由香港到北平,可以说是一路春风得意。

由于建国在即,北平热火朝天,他多年不见的老友陆续云集北平,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这些先生们也大都下榻在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和德国饭店,相距都不太远。这些大饭店都有专车来往,可以互访叙旧,听时事报告,参加民盟例会,游览名胜古迹,参观大专院校,对柳亚子先生都很方便。尤其是住在六国饭店的几十名老友随时可访。从3月18日到北平一周多来,柳亚子可以说是:满怀喜悦,满心振奋。

二、移居引起的牢骚

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及中共中央机关和中央军委机关移居北平。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决定同国民党政府的和谈定于四月一日在北平举行。”中央确定六国饭店为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三十余人下榻和工作的地方。为此,决定原居住在六国饭店的民主人士搬出该饭店,分别移居他处。有的迁往北京饭店,有的迁往德国饭店,有的另辟公馆。通知柳亚子移居颐和园内的益寿堂。

由于柳亚子先生对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本来就不同意,此时为了给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腾住地,又让他从生活条件优越的六国饭店移居到生活条件相对较差的颐和园居住;黄炎培3月25日到北平,3月26日毛主席就在香山双清别墅宴请黄炎培,畅叙别情、纵谈时局,而他到北平一个多星期了,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有的高级民主人士一来到北平就给了专车,而没有给他,几件事引起他的不满,因此,他在1949年3月28日,撰写了七律《感事呈毛主席一首》:

开天辟地君真健,说项依刘我大难。
夺席谈经非五鹿,无车弹铗怨冯驩。
头颅早悔平生贱,肝胆宁忘一寸丹。
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

1949年3月29日,柳亚子先生搬进颐和园

益寿堂,他的生活供给和安全都归我们便衣队负责,为了照顾好他,高富有队长特意分配两名便衣队员,其中一名专管安全,另一名专管生活。柳亚子到颐和园时,就是带着不满情绪去的。他看到在他周围为他服务的都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八路”,与他在六国饭店时的服务员相比,有很大的反差。他说我们穿的土布衣服难看,穿着解放区老百姓支援前线的土布硬底山地鞋走路脚步重,说话声音大,影响他工作和休息等等。总之,这一切在他看来都不顺眼。

他虽然居住在相对偏僻的颐和园,但去看望他的人却不少,经常有人来给他传递一些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看望某代表团,接见某来人的消息。特别是毛主席1949年4月3日,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了李济深、马叙伦、蔡廷锴、陈其尤等民主人士,就国共和谈进行了交谈。他还听说,在此前,毛主席还在香山双清别墅接见过傅作义。他说:“共产党内有些高级干部说:‘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我也有同感。李任潮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是跟着蒋介石屠杀共产党的;傅宜生在1946年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后,执行蒋介石进攻解放区消灭共产党的命令是最积极的。现在他们倒成了毛主席的座上客。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是被蒋介石通缉的,我一直是反对蒋介石,跟着共产党走的,现在却让我来这里坐‘冷板凳’了。”他心里很不平衡,因此动不动就发脾气。

便衣队员们把这些情况反映到队部,高富有队长说:“柳亚子先生是高级民主人士,还是毛主席的老朋友,要尊重他。因此,在他发脾气时,大家要忍耐。”但武装警卫战士,尤其是门卫、哨兵,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按照上级布置的规定,对不认识的人要查问,这就引起了柳亚子先生对门卫、哨兵的不满。

1949年4月5日,柳亚子先生到西苑逛市场,买回一个孙中山先生的小型石膏像,门卫以为他是颐和园内的住家户的亲友(当时东宫门内和知春亭东侧住有十多家市民),就挡住问他:“找谁?”这一下惹他生气了,他说:“我住在这里七八天了,你还不认识我?”说着就举起拐杖打门卫,门卫举起右手迎他的拐杖,由于怕用力过猛把这个老先生推倒,结果右臂挨了一拐

杖,但门卫还是不让他进。在东宫门内住的居民围了一圈,在看热闹。几个便衣队员看见宫门口围了一群人,走过去一看,是柳亚子先生在与门卫吵架,就说服门卫让他进来了。

1949年4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央社会部长李克农等在景福阁召开保卫工作会议,景福阁周围布置了武装警卫哨,不是参加会议的人,不让上景福阁。偏偏这时柳亚子先生偕夫人要上景福阁,又受到哨兵挡驾,他又大骂哨兵,生气而返。

当天上午保卫工作会议结束后,高富有就把以上情况向李克农、方志纯、王凡等社会部的领导作了汇报。

1949年4月7日晚上,周恩来副主席在听鹂馆宴请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邵力子。柳亚子听说周恩来到颐和园没有去看他,以为毛主席、周副主席忘了他,就更生气了,牢骚也更多了。他说:“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再不理我,我就跳昆明湖或吊死在益寿堂。”高富有将他这些言论即时向上级作了汇报。周副主席对柳亚子的这些情况有所了解,只是因为周副主席那几天特别忙:一方面在筹备召开新政协,一方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和谈,还要协助毛主席指挥军队作战,经常废寝忘食,没有时间与柳亚子谈话。周副主席给高富有打了电话,要他照顾好柳亚子先生的生活,不要惹他生气,并特别嘱咐要注意柳亚子先生安全。尽管我们队员小心谨慎,怕他生气,但不愉快的事情还是再次发生了。

在周副主席到颐和园宴请邵力子以后不久,大约是4月12日,柳亚子先生提出,要吃炒青扁豆角和顶花带刺的鲜嫩黄瓜。管理员到东宫门外、青龙桥、西苑、海淀等菜市场跑了个遍,都没有这两种菜。他一边走一边想,这类菜六七月份才能上市,现在才四月,为时尚早,买不着也不为过,回去给柳亚子先生解释解释,想他也会理解的,因此,也没有再到城里去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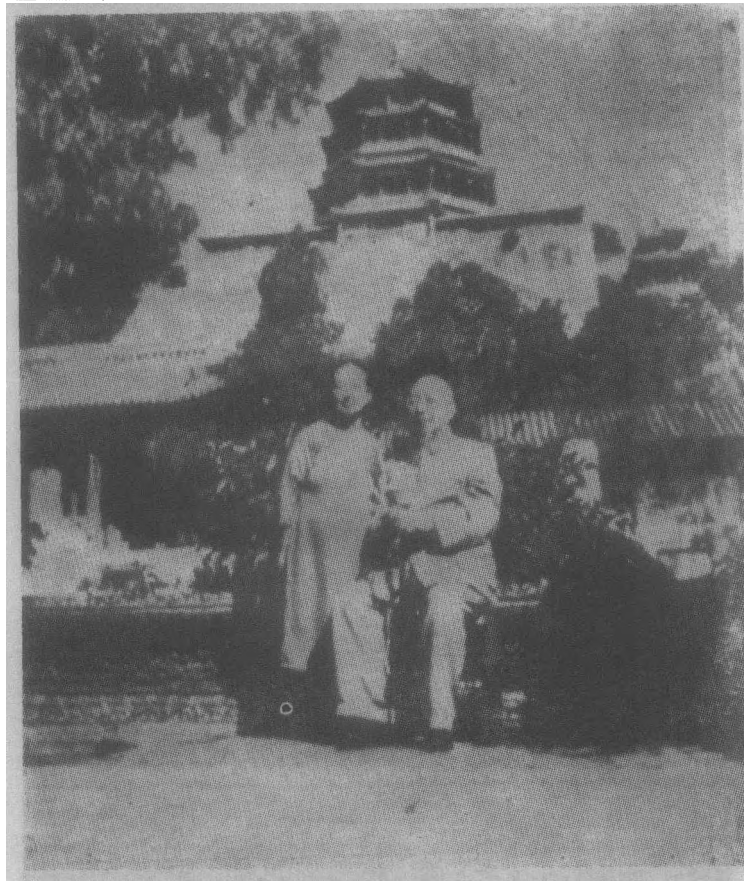
柳亚子先生本来就有气,一看到管理员回来,没有买回他想要吃的那两种菜,气就上来了。询问间,管理员刚要向他解释,一句话还没有说



毛泽东与柳亚子

完,柳亚子先生就打了管理员一个耳光,并说:“你没有尽到职责,还讲什么客观理由!”

这个管理员是我在军大时的同学,他在部队任过连队的副指导员,是和我一起从军大调到便衣队来的,出身于贫农家庭,在部队立过功,他文化水平不高,但对人忠诚厚道,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干部。由于在革命阵营见惯了上下级平等,官兵一致,亲密无间的同志关系,对旧军队、旧政府那种以上压下、以强凌弱的人际关系是深恶痛绝的。这个同志在被打耳光后,感到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大的侮辱,但在这种情况下,对柳亚子老先生又能怎样呢?能还手吗?不能。只有委曲求全。但这口怨气总是咽不下去。于是,便伤心地去找高富有队长,回到队部就有回到家的感觉,见到高富有队长就像小孩子见到亲人一样,哭起来了。他边哭边说:“我有什么错误,可以批评甚至处分,有什么意见提出来,我还是愿意做好工作的,怎么不容分说,就随便动手



柳亚子和夫人在颐和园

打人呢？”

但在这种情况下，高富有队长能说什么呢？只能做安慰、劝导、解释工作。安慰他说：“不要难过，要想开一些。为了党的事业，你能够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有苦处回家里诉说这很好。柳亚子先生是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元老、诗人、高级知识分子，他长期与我党合作，是支持革命的。这次他来北平，是我党请来的，毛主席和周副主席都很尊重他，因他有病身体不好，让他来颐和园住，有些活动没有请他参加，他有些误解，打骂门卫、哨兵，也打了你一耳光。你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说明你很有涵养，你做到了‘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能宽宏大度和委曲求全’，我想你一定能把委屈化为力量，更加努力地做好工作。”经过高富有队长做工作，这位管理员同志的情绪好多了，他说：“请组织相信我，为了革命的利益，我一定顾全大局，正确对待这件事，尽自己的能力把工作搞好。”

管理员同志走后，高富有回想起柳亚子先生前几天说过“坐冷板凳”“投昆明湖”“吊死在

益寿堂”以及打门卫、骂哨兵，这次又打管理员耳光，这些举动并不单纯是对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不满，而是对毛主席和周副主席没有接见他不满的一种不良情绪的反应，就将这一情况及时向李克农部长做了汇报，希望领导同志能来和柳亚子先生谈谈。当李克农部长向周副主席汇报之后，周副主席说：“我要抽时间去见他，我要批评他。”

三、周恩来对柳亚子的批评

1949年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发电报给张治中并南京政府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各代表，拒绝在《国共和平协定最后修订案》上签字，国共和平谈判宣告破裂。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当天，人民解放军30万大军就渡过了长江。

这时周副主席的工作，比起与国民党代表团谈判时轻松了一些。

1949年4月22日上午，周副主席电话通知高富有说：“我要和邓颖超同志请柳亚子先生夫妇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你和颐和园管理处的另一位同志作陪。”在预定的吃饭时间之前，周副主席和邓大姐就到达了听鹂馆，周副主席让高富有把柳亚子先生到颐和园以后发牢骚的话及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显然这是进一步核实情况。在处理问题之前，周副主席总是要再三核对落实，搞清事实的真相，这是周副主席处理问题的一贯作风。然后，周副主席对高富有说：“我没有时间陪他们吃饭，这里有邓大姐同你们一起陪他们，我要批评他，饭后你们一定要陪他们夫妇到寓所，保证安全，不要让他们发生任何事情。”

吃饭的时间到了，柳亚子先生和夫人郑佩宜女士按时到达了听鹂馆，宾主握手寒暄之后入席，周副主席站起来举杯祝酒，在觥筹交错相互碰杯之际，周副主席说：“为柳先生和柳夫人的健康干杯！”干杯后，大家在开始举筷品尝菜时，

周副主席讲话了。他说：“我们来到北平已经 20 多天了，由于忙，没有及时来拜访和请教先生，请柳先生谅解。最近听说柳先生情绪不大好，我感到很不安，今天特来拜访先生。”周副主席先简单介绍了一下与南京政府谈判破裂，我 30 万大军已渡过长江以及时局发展的情况。紧接着周副主席很直率地说起了柳先生与门卫、哨兵、管理员之间发生的几件不愉快的事情。说：“我们的同志刚进城，很多事情还不懂，没有把事情办好，惹柳先生生气了；不过这几件事，柳先生你做的也过分了。我们的朱总司令，可谓影响大、职位高，可是他从来没有打过任何一个战士，没有动过战士一指头。打人在我们人民军队中是不容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军队内部的民主制度，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领导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门卫、警卫战士应当和气。他们做错了事情，可以指出来，可以批评教育，动手打人就不对了。”柳亚子先生听着，只是点头，没有说话，看上去他在反思。周副主席接着说：“门卫就是为了门里的人的安全才设的嘛！如果门卫对不认识的人，不查证件、不闻不问，谁都可以随便出入，那设门卫还有什么用？门卫对不认识的生人阻挡询问，这是他们的职责。如果他们不管，就是失职。我也遇到过门卫阻挡，不让进门的事，前几天在北京饭店就遇到过，不单我遇到过，陈毅同志、彭真同志、邓子恢同志都遇到过，其他民主人士朋友也遇到过。希望柳先生对门卫、哨兵的工作能够理解。”柳亚子先生再次连连点头。这时，周副主席慢慢坐下，心平气和地说：“至于柳先生说的要‘投湖’‘上吊’，那就更不对了。我们刚刚进城，百废待兴，许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完成，我们希望有更多的民主人士朋友来参与建立新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因为柳先生年岁大，身体不好，有些事情没有麻烦您，柳先生可能有些误会。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不一定在政府里就不安排重要职位，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的，也不可能都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希望柳先生把眼光放远一些。多多保重身体，今后有的是重要工作要您去做。”这时柳亚子先生的表情轻松多了。

说罢，周副主席微笑着站起来伸出右手说：“柳先生、郑女士，我还有急事，先走一步，有邓

颖超、高富有同志陪你们，希望你们吃好，喝好，多多保重。”说完就与柳先生夫妇一一握手告辞，匆匆离席。

高富有紧随周副主席走出听鹂馆门外时，周副主席再次对高富有说：“柳先生的生活，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里不是陕北，也不是西柏坡，有的食品蔬菜，西郊市场买不到，可到城里东单菜市场买菜，到东安市场买水果。如果这些地方也买不到，可到北京饭店，你们便衣队的副指导员沈平同志不是还兼北京饭店的总经理吗？让他想办法嘛！总之，柳先生的生活水平，不要低于住北京饭店民主人士的生活水平。”

高富有遵照周副主席的嘱托，后来派人去东单菜市场和东安市场，果然买到了柳先生要的蔬菜和水果。柳亚子先生满意了。

通过周副主席对这件事情的处理，使我们便衣队员们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也使我们认识到搞好保卫工作，也必须搞好保卫对象的服务工作。

四、毛主席赠《七律·和柳亚子先生》

周恩来副主席批评柳亚子后，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柳亚子先生虽说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批评，但他也得到了一些信息：将来他在新政府中，还是有一定职位的。从此，他再也没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发过脾气，但变得沉默寡言了，也很少出门，多数时间在家里抄书稿，撰书写信，整邮票，贴照片，有时也对着孙中山先生的小石膏像发呆，出门也只是在益寿堂门外或是上景福阁打太极拳。

1949 年 4 月 29 日上午，柳亚子先生又开始到远处活动了，他偕夫人郑佩宜女士游了仁寿殿、玉兰堂、排云殿等处，中午回到益寿堂院里，见到了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给他送来了一封信。他拆开信，看到是毛主席的赠诗《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他很高兴，当场就朗读起来：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
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
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
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读到“牢骚太盛防肠断”一句时,稍停了片刻,紧接着又继续读,读完全诗,并连声说“好诗,好诗”。田家英临走时还告诉柳亚子先生:“毛主席说,请你多保重身体,他抽时间来看望你。”毛主席在诗中劝说柳亚子先生,节制牢骚放眼未来,留在北京参加建国大业。这和周恩来副主席在听鹂馆对柳亚子批评时让他“把眼光放长远一些”是一致的,也许周副主席把柳亚子在颐和园说的“投湖”“上吊”等牢骚话和打骂门卫、哨兵、管理员的事给毛主席详细汇报过。

1949年4月29日下午,柳亚子先生没有出门,在家写诗两首:

其一

《次韵奉和毛主席惠诗》

东道恩深敢淡忘,中原龙战血玄黄。
名园容我添诗料,野史凭人入短章。
汉魏唐猫原有恨,唐尧汉武诟能量。
昆明湖水清如许,未必严光忆富江。

其二

《叠韵寄呈毛主席一首》

昌言吾拜心肝赤,养士君倾礼酒黄。
陈亮陆游饶感慨,杜陵李白富篇章。
“离骚”屈子幽兰怨,风度元戎海水量。



颐和园益善堂

倘逢名园长属我,躬耕原不恋吴江。

柳亚子先生移居颐和园以后,情绪一天比一天低,牢骚一天比一天多,从打门卫、骂哨兵到打管理员,又说要“投湖”“上吊”,可以说他的牢骚是“一浪高过一浪”。至4月22日受到周副主席的批评,情绪开始走向平静,到29日,他读到毛主席的《和诗》,他的情绪就完全转过来了。29日下午,在他写的《次韵》、《叠韵》两首诗中,有了“未必严光忆富江”、“躬耕原不恋吴江”的诗句,可以看出他开始考虑在北平定居了。这时,他只是盼望毛主席尽快来看望他。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知道不知道毛主席什么时候来?”只隔了一天,到了1949年5月1日,毛主席到颐和园来看望他了,并邀请他同游了颐和园。

1949年5月5日上午,毛主席派秘书田家英,用自己的坐车到颐和园把柳亚子先生夫妇接上,赴香山碧云寺拜谒孙中山先生的衣冠冢;中午毛主席请柳亚子先生到双清别墅畅谈并共进午餐;下午三时,田家英送柳亚子先生夫妇回到颐和园益寿堂。这一天柳亚子先生非常高兴。

从毛主席看望柳亚子并同游颐和园以后,再也没有看到柳亚子先生向身边工作人员发过牢骚。总的说来,柳亚子的牢骚,是从3月26日通知让他从六国饭店搬出起,到4月29日毛主席派田家英给他送《诗》止,这一个月多的时间中发生的。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柳亚子先生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这时,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机关已经全部搬到了中南海,我们便衣队在西郊的便衣警卫任务已经完成,也准备搬到城里东城区西裱褙胡同原美国大使馆武官包瑞德住过的那个院子里。柳亚子先生在颐和园时,吃住警卫都是我们便衣队负责的,我们要搬走,当然首先要安排好柳亚子先生。这时我们便衣队的副指导员沈平同志还兼着北京饭店的总经理,周恩来总理就让柳亚子先生先搬进北京饭店,生活安全乃由沈平和我们在北京饭店的队员负责,并说,柳亚子先生的住址以后中央另作安排。这样柳亚子先生就在1949年11月初搬到了北京饭店。柳亚子先生走后,我们便衣队也就从颐和园搬到了西裱褙胡同。

(责任编辑 吴 思)

刘顺元事件与中苏关系

● 潘祝平

抗日战争刚胜利,时任中共淮南区党委副书记的刘顺元即到了东北,先担任中共辽东省委副书记,后为加强旅大苏军占领区的工作,调任中共旅大地委副书记、第二书记。刘顺元在旅大期间,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苏军的专横霸道,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几次不同程度的抵制,导致苏军以“反苏”为由,在中国的国土上将刘顺元无理“驱逐出境”。

旅大苏军占领区的由来

刘顺元是在旅大苏军占领区被“驱逐出境”的,因此首先要明白这一占领区的由来。此事须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2月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背着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了严重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其中对旅大问题作了如下规定:“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以恢复。”这一条款就是让苏联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前沙俄在我国东北霸占的旅大港口。

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迫使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了《雅尔塔协定》的有关条款。苏联作为回报,承诺只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由其接管东北。该条约在旅大问题上,虽然规定旅顺港中苏共同使用,旅大地区的防务委托苏联政府,旅大地区的行政权属于中国,但日后苏军在旅大地区却实施了全面的占领管制。

刘顺元当时还不知道《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有关内容,因而也不会知道苏联竟会继承沙俄的衣钵。

初到旅大的忧虑和困惑

刘顺元一向对苏联怀有特殊的崇敬仰慕之情,然而初到旅大后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对苏军的所作所为产生了忧虑和困惑。

苏军1945年8月22日空降占领旅大时,曾受到万人空巷的热烈欢迎。但苏军纪律出乎意料的败坏,猥亵甚至强奸妇女,劫夺公私财物,拆走工厂精密机器等等,时有发生。以致不久即引起了旅大人民的不满和反感。刘顺元初到旅大后,耳闻目睹了苏军纪律败坏的种种劣迹,甚感纳闷和忧虑,曾善意地向苏军司令部反映并提出建议,但收效甚微。

苏军为了在表面上将旅大地区的行政权交中方管理,在其策划和操纵下,于1946年9月20日成立了由中方人员组成的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苏军竟指定日本统治时期有劣迹的大连商会会长迟子祥任主任,刘顺元担任了副主任。这一机构名义上由中方掌管,实际上仍为苏军牢牢控制。这里的行政、防务、财政、金融、海关直到报纸广播,全由苏军管理和监督。苏军还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中共旅大地委进行公开独立的活动。苏军的这些专横举措,使到旅大不久的刘顺元很为困惑和不满。

刘顺元到旅大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华东局要求中共旅大地委利用大连的和平环境和工业基础,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前线。但苏军也以顾全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为由,不允许大连成为中共的军工生产基地。刘顺元等人只得在距离大连较远较隐蔽的地方,秘密进行军工生产。刘顺元对这件事也很为困惑和不满,共产党为何不帮

助共产党,而要顾全国民党?

筹组关东行政公署之争

苏联为阻止国民党接管大连的行政权,在1947年3月以后,抓紧在旅大地地区建立一个听命于苏联的由中方人员任行政长官的地方政府,将旅大行政联合办事处升格为关东行政公署。苏联为此特派梅尼兹柯夫元帅前来旅大主持筹组工作,刘顺元参与了筹组工作的全过程。在筹组工作中苏军专横霸道,根本不把中共旅大地委的意见放在眼里。

矛盾的焦点是行政官员的人选问题。苏军坚持由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并由其推荐的人任财政厅长、建设厅长,由财政厅长兼任关东银行行长。如果中共旅大地委同意如此安排,苏军可同意刘顺元任关东行政公署副主席,并由中共干部继续掌管旅大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这个方案就是将旅大的行政权、财政金融权交给对苏军俯首贴耳的迟子祥,中共旅大地委的责任只是帮助苏军维持社会治安。

苏军指定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遭到普遍反对。刘顺元将各方面的意见集中起来,向旅大苏军政治部主任彼得罗夫斯基中将反映。这位苏军中将专横地表示这个名单是梅尼兹柯夫元帅定的,一点也不能改,强令中共旅大地委必

须保证迟子祥在旅大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

鉴于苏军如此专横武断,刘顺元提请中共旅大地委将与苏军的争议,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当时这两个领导机关忙于组织“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重要战役,无暇顾及此事,只是笼统地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政方针还是以苏为主。”这样中共旅大地委和刘顺元只好站在屈从的位置,勉强同意迟子祥任关东行政公署主席。

关东行政公署建立后,仍然要听命于旅大苏军司令部及其派出机构苏军民政局。遇事还是过去的老办法,把关东行政公署的官员叫到苏军司令部听训话。对关东行政公署的日常工作,事无大小都要过问。重要会议都要派人监督。还给所有行政机关派上军代表进行监控。凡此种种,中方官员稍有不逊或抵制,便会扣上“反苏”的帽子加以追究,甚至由苏军中的特务组织格伯乌加以逮捕。

刘顺元对这一切虽有争议和不满,但还是忍耐着。因为当时保持与苏联的友好关系,对东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

忍无可忍的抵制

国民党东北行辕副参谋长为首的视察团,定于1947年6月上旬到大连视察。在此之前苏军

准备应对防范措施时,接连发生了几起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和中方权益的事件,刘顺元在忍无可忍时进行了抵制。

第一件事是苏军强令进行货币改革。

苏军进入我国东北后,滥发军用券在东北通用。旅大苏军司令部为防止国民党视察团到大连用苏军所发的军用券抢购物资,1947年5月17日宣布进行货币改革,限期从5月23日起5天内完成。居民所



1949年12月,刘顺元(前排中)与中共济南市委同志合影

拥有的军用券,都必须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改变面值。在兑换期间实行现金限额管理,多余的军用券都要存入银行听候处置,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和恐慌。

刘顺元向主持其事的苏联元帅梅尼兹柯夫陈述了这件事将对大连的经济活动和群众利益造成严重损害。这位苏联元帅强令必须如期完成,并指令刘顺元到大连广播电台讲解这次货币改革的意义和办法。刘顺元为避免与苏军关系的恶化,只得忍让表示按期完成,但抵制了苏联元帅的指令,拒绝到电台作欺骗群众的违心广播讲话。这对旅大太上皇的苏联元帅来说,实在有失尊严,引起的恼怒可想而知。

第二件事是苏方强制签订“中苏合作合营”协定。

苏军在强令货币改革后,又担心国民党视察团视察大连后可能接管大连,急于将大连的主要企业和资源都变成“中苏合作合营”。签订中苏电业合作、盐业合作、渔业合作及中苏合营造船公司。签订一方是中方关东行政公署,一方是旅大苏军司令部和苏联对外贸易部代表萨瓦斯基。这些合作合营,苏方无偿霸占了完全属于中方所有的一半资产。在合作合营中,中方也只是挂个名,还是由苏方完全控制。

中共旅大地委考虑,旅大的大中型企业和主要资源都控制在苏军手中,苏方拿出来搞合作合营,对恢复生产稳定职工生活有利,因此同意经过平等协商签订这几个协定。

然而苏方根本未考虑在签订协定之前与中方平等协商,苏军司令部只是通知刘顺元带上关东行政公署的图章去签字。刘顺元在苏军司令部从上午9点等到下午黄昏时分,一位苏军少将和萨瓦斯基才来到会议室,要刘顺元等人立即在事先未经协商未见过面的协定上签字。

在事关中方权益的问题上,苏方竟不允许中方作任何讨论便要强迫签字,实在专横霸道。但刘顺元考虑如因此而拒绝签字,关系就会彻底破裂,只得再次忍让,忍气吞声签了字。但刘顺元签字后,抵制了苏方当晚庆祝签订协定的宴会,以表示对苏方专横霸道的不满。苏方对刘顺元的罢宴,感到非常尴尬和气愤。

第三件事是苏军要刘顺元制造虚假舆论。

1947年6月3日国民党视察团来大连前夕,大连苏军司令格里格耶夫上校要刘顺元代表关东行政公署,到大连电台作广播演讲。规定讲明几点:第一,这个政府是旅大地区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二,这个政府是独立自主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使主权的;第三,这个政府是为旅大地区老百姓服务办了很多好事的。

这些都是苏军掩饰自己专横控制关东行政公署的谎言。刘顺元义正辞严地表示,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讲真话,不能讲假话,我们不能去作这样的广播讲话。此次刘顺元未作任何忍让,这次抵制,更惹恼了苏军司令部。自此以后,刘顺元又继续抵制了苏军的一些活动。

刘顺元被“驱逐出境”

刘顺元已准备大祸临头。不出所料,苏军果然对刘顺元采取果断措施。1947年9月17日上午,旅大苏军总司令留德尼可夫上将的代表巴申上校,在旅顺苏军总司令部,与正在旅大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秘书长杜平谈话。指出了刘顺元的许多所谓错误,认为刘顺元“不明白苏军司令部的政策,不执行苏军司令部的办法,因此要求撤退他。”同时旅大苏军司令部也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发了内容相似的电报。所谓撤退就是驱逐,巴申的谈话和苏军司令部的电报,实际上就是驱逐刘顺元的最后通牒。巴申在谈话后不久还扬言,刘顺元如不离开,即用武装监送。

巴申在与杜平谈话中,还指责了与刘顺元观点一致的旅大工会主席唐韵超和旅大公安局局长边章五,对这二人也要采取果断措施。

中共旅大地委在1947年10月30日的常委会上,将巴申与杜平的谈话记录,与刘顺元见面。在此次常委会上,刘顺元对苏军的无理指责作了反驳和解释。多数常委都对苏军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被苏军指名驱逐的刘顺元和唐韵超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地委书记韩光在发言中反复说明,苏军对刘、唐二人的处理是经莫斯科批准的,已无力挽回。第二天在地委全体会议上宣布人事变动时,韩光对刘顺元、唐韵超被苏军赶走表示了惋惜之情。

中共旅大地委常委原为韩光、刘顺元、边章

五、苏杰、唐韵超 5 人,一下子被苏军赶走了刘、唐、边 3 人(边章五在此之前已被宣布“离职休息”)。刘顺元等人在旅大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苏军专横霸道的抵制,就此而告终。虽然日后苏联不得不将旅大归还新中国,但苏军占领管制旅大期间,中国人饱受屈辱的那段历史不能忘记。

济南再次遭遇苏联人

刘顺元满怀义愤离开旅大,到中共中央南满分局向陈云诉说了旅大事件的真相。于 1948 年 5 月回到驻在山东青州境内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饶漱石、陈毅报告了旅大事件的经过。并说“人家都说我是反苏分子,你们敢收留我?”饶、陈皆好言相慰。陈毅说:“这哪里是什么反苏?是民族气节嘛!”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苏关系公开破裂后,陈毅几次称赞刘顺元是中国共产党内敢于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第一人。

刘顺元回到华东局不久,被任命为华东局宣传部长。1948 年 8 月济南解放,中共中央鉴于济南是被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决定建立直属华东局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任命刘顺元为市委书记

兼济南警备区政委。被旅大苏军“驱逐出境”,被一些人视为“反苏分子”的刘顺元,不但未受任何处分,反而更受信任。

正在济南施展政治才华的刘顺元,并未意识到 1948 年下半年国际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对自己非常不利。一件事是,苏、保、罗、匈、波、捷、法、意 8 国共产党情报局,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公开指责以铁托为首的南共的反苏立场。这一决议虽然与刘顺元在旅大抵制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无直接关系,但对日后刘顺元的困难处境产生了直接影响。另一件事是,1948 年底华东局准备集中力量组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准备接管南京、上海,决定随军南下。另外成立了以康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以刘顺元为书记的中共济南特别市委,易名为中共济南市委,改由山东分局领导。这两件事使刘顺元的命运急转直下,并且陷入无人能够挽回的困境。

康生刚到济南时,对刘顺元曾非常亲切和尊重,多次在会上称赞刘顺元理论水平高,工作有魄力,特别赞扬他在旅大敢于顶苏联人,有骨气。刘顺元早在 1932 年在上海中共中央机关工作时就认识了康生,但无直接接触。在济南相处一段时间,也曾被康生的表象所蒙蔽。但好景不长,嗅觉特别灵敏的康生,得知中央领导和中央报刊先后批判铁托集团反苏以后,对刘顺元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大转弯,不仅态度由热变冷,还在背后指责刘顺元是反苏分子。自此以后,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风波接连发生。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苏联派出代表团来中国参加庆典,并且指名要访问刘顺元为市委书记的济南,看看中共有未处置对苏联不友好的刘顺元。

康生听到苏联代表团要来济南访问,中央通知不要刘顺元出面接待的消息,随即派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匡亚明去北京,以请示如何接待苏联代表团为名去摸底。匡亚明带回的信息是,中央不仅通知刘顺元不得出面接待,还要刘顺元写一份检查由中央交给苏联。康生于是赶紧开会,对刘顺元落井下石,以刘顺元反苏为由,决定给刘顺元以撤职处分,报中共中央和华东局批准。



驻长春的苏军

忍辱负重

康生排斥打击刘顺元的种种恶行,被当时居住在济南的原中原军区政委郑位三看在眼里。一身正气的郑老曾到北京找刘少奇为刘顺元鸣不平,但与刘少奇交谈后,就连声叹息地返回济南。原来刘少奇为毛泽东访苏作准备,1949年7月秘密访苏归来。斯大林与刘少奇会谈时点了刘顺元的名,说:“你们中国有个刘顺元在旅大对我们苏联很不友好,据说现在还得你们的信任,我希望今后苏中合作中不要再出现刘顺元这样的人。”在淮南就非常了解和器重刘顺元的刘少奇,此时只好对郑位三说:“为了搞好中苏两个大党之间的关系,刘顺元的工作岗位只好动一动了。”

刘顺元对中央要他就旅大事件作书面检查,并且要交给苏联,感到非常诧异,过了半个多月书面检查只字未写。郑位三知道了,劝刘顺元忍辱负重,为改善中苏关系作出牺牲。刘顺元才于1949年10月22日写了一份《关于旅大事件的申明书》,由山东分局转送中共中央。这份申明书虽然给自己扣上:“在处理与苏联同志的关系上,犯了头等的政治错误。”但通篇还是辩白多于检讨。

刘少奇看了刘顺元的申明书,于1949年11月1日写了如下批语:

毛、朱、周、师哲阅,退安子文存。

请子文告山东分局,在刘顺元对济南工作交待后,来中央一谈,再分配工作。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在刘少奇的批语上画了圈表示同意。由于批语未提到给予刘顺元撤职处分,而是“再分配工作”,刘顺元被山东分局撤职不但未发正式文件,而且济南市委还于1949年12月18日,为刘顺元开了团以上干部参加的盛大欢送会。

1949年12月下旬,刘顺元接到中央组织部长安子文的通知,于是赴北京听取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刘顺元到达北京的当晚,就被刘少奇派自己的专车接到中南海的办公室面谈。刘少奇听了刘顺元的诉说,而后平静地作了如下谈话: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坚持真理,但也要善于作必要的妥协。你不是读过许多列宁的著作

吗?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与德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布列斯特和约,许多人思想不通。列宁说:当着人民的面签订一个因为力量薄弱而有利于帝国主义的和约,不是背叛社会主义,因为媾和是积聚力量的手段。我们与那些毫无原则的人的区别,不是是否允许妥协,而在于我们将妥协作达到战略目的的手段,而他们却把妥协作战略目的。我知道你这个人,优点是耿直、廉洁,很有原则性,缺点是太耿直,不会绕弯子,有时还显得有点固执。你想想,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帝国主义都在反对我们,我们现在能不同苏联搞好关系吗?据我的了解,有些共产党的领导人,历史上并不很光彩,我们现在还不是照样称他同志,与他握手言欢吗?旅大的事关系到两个大党、两个大国的关系,而搞好中苏关系是我国目前的最大利益所在,是头等的政治问题。所以我找你来,不是劝说你,而是命令你,从搞好中苏两大党、两大国关系的高度,认真写一份检查。至于旅大的主权,我们迟早都要收回的嘛。

刘顺元按刘少奇的要求,于1950年1月2日写出了书面检查,为了党和国家“现实的政治利益”作出了特殊形式的牺牲。

刘顺元的书面检查写出不久,就被连降三级,被任命为华东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下属规划局副局长。刘顺元早有被贬谪的思想准备,从此隐姓埋名,做一些不需要出头露面的工作。华东的党政军领导人都了解刘顺元,陈毅就非常同情刘顺元的遭遇,几次到刘顺元住所探望。以后刘顺元还担任过华东军政委员会人事局副局长、副秘书长、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四年期间从未为撤职降级讲过一句怨言,相信中央完全了解事情的真相。

点刘顺元名的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刘少奇就四处打听刘顺元的下落,要重新分配他的工作。中共中央于1954年9月24日决定:刘顺元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以后又任重新组建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书记、代理第一书记。中共中央重新起用刘顺元,实际上也是为刘顺元的反苏冤案彻底平反。

(责任编辑 赵友慈)

日据时期台湾的“文斗”志士

● 钟兆云

1895年日本侵略者强行割占台湾，遭到台湾爱国军民的殊死抵抗，自日军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近卫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以下，共有3.2万余众伤亡（其中阵亡4642人），几占其所投兵力的一半。在11月28日，日本接收台湾全权大员、驻台第一任总督桦山资纪宣称“全台已完全平定”以后的半个世纪里，台岛反抗日本统治的斗争声浪从未停止，数百万台湾人民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在不见硝烟的“文斗”战场上，一批社会贤达、文化名人，以自己的方式为弘扬民族精神、保持民族文化进行着不懈的抗争。成绩卓著者，有林献堂、连横、蒋渭水、赖和等人。

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殖民当局开展“大扫除”，台湾武装抗日斗争转入低潮之际，出身台中雾峰望族、久有抗日志的林献堂决心以“文”抗日，开展以“反同化”为旗帜的非武力斗争，在其居家莱园组织起栢社。作为日据时期台湾诗人的第一个诗社，栢社在保存祖国文化、培养民族气节、教育子孙后代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吴浊流在《回顾日据时代的台湾文学》一文中，曾说：“我入栢社之后才知旧读书人……骨子里，汉节凛然”，从他们那里“学习不少爱国诗词”。当此时，台湾各地诗社、文社皆以莱园栢社马首是瞻，尊称林献堂为“迷惘年代的掌灯人”。

1907年，26岁的林献堂在日本奈良结识因戊戌政变而亡命日本的梁启超。闽南语与广东话

不能沟通，两人以中国文字笔谈。林献堂问：“我们处异族统治下，最可悲痛者，尤无过于愚民教育，处境如斯，不知如何可以？”梁启超感慨无限：“本是同根，今成异国，沧桑之感，谅有同情！今夜之遇，诚非偶然。”在这么个特定的时空里，台湾的进步青年和来自祖国的优秀分子发抒了共同的感叹，他们的感叹里深深埋藏了割台后两岸情感的痛苦和挣扎。

1911年2月，梁启超应邀访台，曾住林献堂莱园五桂楼中，并写下《莱园杂咏》十首，使莱园更增声价。梁启超在林献堂、连横等陪同下到台湾诸地参观，深为台湾同胞的爱国情怀所感动。还在日本时，梁启超就曾游经马关，对着马关就想到《马关条约》割让台澎的恨事，他写下了“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的诗句，用以表达一腔悲愤。

当台湾的爱国遗老为梁启超设宴洗尘时，他始终被一种爱国爱民的悲愤所笼罩，当场挥毫两诗。其一云：“樽前相见难啼笑，华表归来有是非。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其二云：“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余生饮泪尝杯酒，对面长歌哭古人。”真是凝成血泪而情见于诗，其中“万死一询诸父老，岂缘汉节始沾衣”，流露出他以民族大义与台湾父老相期勉，至于“对面长歌哭古人”中的古人，指的就是抗夷保台不脱祖国版图的千古英雄郑成功。

旅台期间，梁启超还专门改编了十首台湾民歌（他后来名其《台湾竹枝词》，在小序中，公然申明是为“遗黎写哀”），其中一首为：“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树头结得相思子，可

是郎行思妾时？”此诗从表面看是妻子思郎之作，但深层却寓含着台湾同胞思念祖国之情，蕴含着吁请祖国不要忘记他们的大声呼喊。

梁启超浓烈的爱国情怀，深深感动着林献堂、连横等爱国绅士。和林献堂一样，连横也是出身台湾望族，其祖于清康熙年间从福建漳州府移来，世代经商，家业迭兴。日本侵台后，连家的“芳兰号”烟铺及水田被强行征收，连氏家族迁台六代经营所得，就此毁于一旦。连横少好读书，稍长即有反清爱国思想。出于对殖民统治的憎恨，连横发起成立古诗社“南社”，与林献堂的栢社相互唱和。日俄战争爆发，他携眷离台赴厦门，与友人合作创办《福建日日新日报》，并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有所往来。但他实在难舍祖辈的坟茔之地，于是仍在海峡两岸来回穿梭。

梁启超离台后，作为台湾地主资产阶级代表和改良主义领袖的林献堂，就一直没有沉默过。在他发动下，莱园栢社同人和台湾绅民集资 18 万元，创办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今台中一中），专门招收台民子弟入学，以抵抗日本的殖民教育政策。日人矢内原忠雄曾为此惊呼：“这是台湾民族运动的先声。”

1914 年 12 月，日本自由主义者、明治维新的功臣伯爵板垣退助来台成立“台湾同化会”。林献堂等一批改良派和知识分子，误以为日本当局真的把台湾人看作是自己的同胞了，于是纷纷加入。林献堂因出会费最多而做了“台湾同化会”的领导人，他天真地向日本当局争起台湾的待遇来，并不断提出一些社会政治改良的主张。事实给了他当头一棒，不久，这个“同化会”就被日本总督佐久间左马太下令解散。接着，台中州第一高等学校面临停办，栢社的活动也日益维艰（后在该社基础上另建起台湾文社），林献堂以梁启超当年“切勿轻举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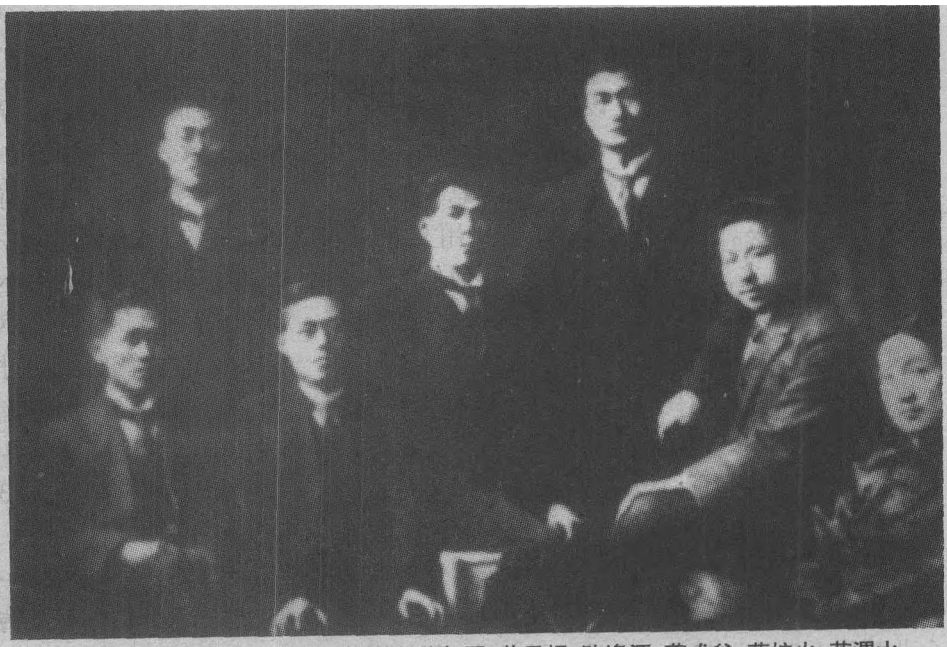
动，避免无谓牺牲”的教导为信条，乃暂居日本。

从大陆复归台湾的连横见此情状，心怀愤恨。为反抗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打破殖民者篡改台湾历史、甚至重新捏塑台胞灵魂的阴谋，他决定撰写《台湾通史》，保存祖国文化，使今人后世不忘台湾历史。由于他一向注意搜集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的史料，在民国初年又曾被延入清史馆，有机会接触到重要史实，在台湾士子中最具备写此通史的条件。他竟日埋头书房，为台湾这个岛屿的本质、真相而废寝忘食地钻研，痛哭流涕地反思。经 5 年呕心沥血，终于在 1920 年出版煌煌巨著《台湾通史》。此书上溯隋朝，下至甲午，涉及近千余年之史事，在台湾文献史的地位甚高。

二

当连横给世人留下如此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因而成为台湾的一代名儒、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时，林献堂等人也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间出现了“国际联盟”这一组织。对于刚从猛烈炮火中走出的欧洲乃至世界人民而言，无不希望通过国际联盟的成立而获取永远的世界和平。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亚洲，从事政治运动的台湾知识分子也深切地



《台湾民报》创刊人，右起：蔡惠如、黄朝琴、黄呈禄、陈逢源、蔡式谷、蔡培火、蒋渭水

感觉到了这股时局的变化。在他们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水分岭,他们满怀期望一个“新世界”,一向遭受凌虐的弱小民族必会享得和平、自由与平等。出于乐观的看法,他们发起了一连串要求自由平等的政治社会运动。

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影响的林献堂,应运组织起了新民会,其最初宗旨便是谋求台湾的自治。但林献堂考虑到完全的自治要求,势必引起日本的强烈反应,招致严苛镇压,对台湾的民族解放反而产生负面作用,所以新民会的政治运动重点,就放在争取台湾人的参政权上,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台湾人和日本人一样的平等待遇。林献堂几经斟酌,决定进行合法的民族解放运动。于是,新民会通过《台湾青年》等刊物,掀起了要求废止对台湾人歧视的法律,要求建立“台湾议会”,允许台湾人参政。1921年2月,林献堂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向日本第44次帝国议会提交了请愿书。此举点燃了台湾近代政治文化启蒙运动的火把,自此以降至1934年,一共发起了15次此项请愿运动。

面对台湾爱国民众从“不法”的武装抵抗有声有色地走到“合法”的民族运动,日本政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按照日本宪法规定的民权原则,剥夺台湾人的参政权明显是违宪行为,何况日本不少学者和民主派的政界人士,也积极支持台湾人的“民权运动”。林献堂发动第一次请愿运动后,日本在台湾的第一任文官总督田健治郎虽然没有同意建立“台湾议会”,但为了敷衍这些改良主义的绅士们,还是设置了一个“台湾总督府评议会官制”,由总督亲任会长,特聘林献堂等9名新民会骨干为“评议员”,对总督的政务进行监督评议。殖民当局原想以“御用文人”的高官厚禄方式,来收买林献堂等人,使他们自愿停止民权运动。谁知林献堂并不买账,依然积极领导和参与民权运动,对日本的殖民统治进行“合法抵抗”。在与殖民当局接触时,林献堂既不唯唯诺诺,也不说日本话,而是带着秘书当翻译,他不高兴时照样骂日本人“马鹿野郎”(日语,马鹿指憨呆之意)。

1921年10月,林献堂又联合台北大安医院开业医师蒋渭水和蔡培火等各阶层进步分子,在台北静修女学校发起成立台湾文化协会,林献堂

为总理,蒋渭水为专务理事。会员很快发展到1000多名,主要为台湾医专、台北师范、高等农校等校学生,也有林献堂家乡台中一带居民。台湾文化协会与台湾议会设置运动、台湾青年杂志社并称为台湾非武力抗日运动的三大主力。在这个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启蒙性质的文化团体的影响下,台湾各地青年纷纷成立读书会等文化团体。台湾总督府对林献堂恼羞成怒,1922年罢免了他的“评议员”职务。在殖民当局强大的压力下,林献堂只好宣布退出议会设置运动。

蒋渭水的骨头似乎更硬一些。1923年1月,因不满林献堂等人“变节”,蒋渭水本着对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心与热情,出面发起组织“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但在台北召开成立大会时,遭日警驱散。于是,蒋渭水亲往东京,重建“台湾议会期成同盟会”,并在台湾设立支部,台湾总督认为“此为非法组织反日团体”。这年底当蒋渭水回台湾率众请愿时,殖民警察以扰乱治安罪将他们逮捕。台湾人民和部分支持台湾民权运动的日本人,在法庭上与殖民当局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庭斗争。消息传出,厦门大学学生李思桢(台湾嘉义人)以所创“台湾尚志社”名义,召开在厦台湾学生大会,并作宣言书,寄送于台湾、东京及国内各地。

看到各地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殖民当局为平息事端,只好下令法院释放大部分被捕者,对蒋渭水等首领只判了4个月的象征性监禁。

在蒋渭水等人被捕期间,林献堂又再度出面,领导请愿运动。《台湾民报》也配发了一系列相关文章。在一篇题为《社会改造和我们的使命》的社论中,把欧战前后的变动比作“世界有史以来的大地震”,文中指出:“回顾我们的台湾,虽然是绝海孤悬的小岛,当此世界的黎明期,难道无一点刺激?……对于这样世界的大变动,好像服了觉醒剂一般,对于从来的信仰希望以及思想制度,颇受反抗的暗示”。文末更以“充实我们的智识,俾使顺应世界潮流”相号召。

相隔不久,1925年3月21日,《台湾民报》又发表社论,说:

原来时代的潮流是一种很普遍很伟大的东西,无论什么山间僻处海外孤岛,时势的势力都会普及得到。……台湾虽是孤悬海外的小岛,难

道解放的钟声就唤不醒岛人的迷梦吗?所以这几年来,受潮流的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

为了“以台制台”,和林献堂等人及所领导的请愿运动和台湾文化协会相对抗,1923年11月,日本第九任台湾总督内田嘉吉任命汉奸辜显荣创设“台湾公益会”。

辜显荣挖空心思以讨殖民当局的欢心。1924年底,他特地邀请在日本讲学名动公卿的宗亲、享誉世界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来台“教化事业”。台湾虽已由日本统治了近30个年头,但辜鸿铭仍觉这还是中国的土地,所以一到这里,便宣扬孔孟之道和他所持的中国文化救世说,一时成为台湾新旧文学之争两派交攻的目标。连横亲自在《台湾诗萃》上发表赞赏文章,对辜来台讲学表示热烈欢迎,张我军等一批主张新文化的台湾青年,则陆续刊发了不少讨辜檄文。

辜显荣劝辜鸿铭安心留在台湾,还说“宁为太平狗,勿为乱世民”。辜鸿铭斥之为“混账话”,愤然表示:“在异族统治下,不管怎样,千万要对得起良知,时刻莫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辜鸿铭这话留在了辜显荣记忆深处,留在了辜振甫(曾任国民党中常委,现为海基会董事长)等台湾辜氏家庭的后人心里。

日本新任总督伊泽多喜男还未看到内田嘉吉下令开办的“台湾公益会”收到什么成效,就得知台北爱国人士200余人集会议决重建被殖民当局毁坏的孔庙。虽然台北孔庙直到1939年才最后竣工,但开工之后不久,便有台北民间组织的“崇圣会”在此举行祭孔大典。当殖民当局野蛮摧残台湾各族文化之时,台北孔庙却成了

台民反抗外来文化侵略、坚持民族文化传统的大集会场所。

随着革命的深入,由不同阶级出身和不同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台湾统一战线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却发生了分裂,分化为三股不同的力量:右翼以林献堂、蔡培火等地主资产阶级分子为代表,他们仍然顽固地站在改良主义的立场,采取叩头请愿的方式,希望在日本统治下实现所谓的“地方自治”;左翼以王敏川、连温卿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坚决主张在台湾进行阶级斗争以彻底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以蒋渭水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彷徨于两者之间,主张以当时实行农工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为榜样,进行以农工阶级为基础的民族运动。

1927年10月,台湾文化协会在台中召开第一次全台代表大会,正式宣告分裂,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等脱离出走,另行组建台湾历史上第一个合法的政党——台湾民众党,正式作为台湾

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登上政治舞台。台湾文化协会(新文协)在左派人物王敏川领导下继续开展活动,毫不屈服殖民当局的高压统治,勇敢无畏地传播民族文化,宣传民族意识。新文协会员有的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有的投身于祖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以实际行动,体现了对祖国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台湾文化协会”的精神内涵进一步明确:台湾的“主体”就是中华文化,“台湾文化协会”坚持和弘扬的“台湾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如果说这是“本土化”,其实质就是“去日本化”。殖民当局对新文协的行动感到恐慌,不断进行干涉和破坏,并将王敏川等人逮捕。

也是1927年,因大陆



1931年,连震东奉父之命前往大陆,行前父子合影

内乱，原台湾文化协会会员连横又迁回到了台湾。在大陆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党人张继、章炳麟等人，并经张继介绍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回台湾后，连横即在台中参加了林献堂主持的汉文教学班，为教育后学而尽心血。1928年，为抗议日本人禁台人使用闽南语，连横又与人合作创办“雅堂书局”（连横字雅堂），只卖汉文书，不卖日文书，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气节。

作为对日本殖民当局充满幻想的改良主义分子，林献堂虽然有着局限性，但他的一系列活动，对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他和蒋渭水等发起建立的台湾民众党，提出了“对内唤起全台湾人民的总动员，对外联络世界弱小民族及国际无产阶级共同奋斗”。以此为契机，日据时期的台湾文教战线并不寂寞，各阶层的爱国人士以各种形式与殖民当局展开斗争，奏响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号。

但随着台湾民众党的日益“左倾”，却引发了林献堂、蔡培火等改良主义者的不满，终于在1930年8月脱离，创立“台湾地方自治联盟”，要求“在不抵触日本宪法之范围内”、“实施完全之地方自治”。次年2月，日本总督府强行将民众党取缔，早已被视为眼中钉的台湾文化协会也随之被取缔。“台湾文化协会”虽然只存在10年时间，但对台湾社会却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感召了许许多多的台湾民众。

1931年8月，就在台湾民众党和台湾文化协会相继被取消后不久，蒋渭水去世。这位有着台湾“圣雄甘地”之誉的医生，临终还就此发表声明，不忘告诉自己的同志：“台湾人的解放，不可能单靠知识阶级及有产阶级完成之。全台湾人的自由，必俟工人、农民、无产市民奋战。惟其如是，方能获取解放运动之完善结果。”

三

1931年9月，日本悍然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在台湾宣传机关报《台湾日日新报》作了大量欺骗台湾民众的宣传。事变的第三天，该报的四个版面尽是有关东北战情的报道，大小标题反映的重点无非是：“战争，非我日本政府所要，实因中国人的节节

进逼（华军袭我、毁铁路等），事后，日本军已在刻意防止事件扩大，为维持威信，才‘严惩’敌人，而且，日军英勇无比，一猛击就使中国军溃走。”在日本政府刻意传达的讯息中，日本人发动这场战争系“自卫还击”，“师出有名”。此后的宣传更是连篇累牍：什么“防止事件的扩大，是我（日本政府）努力的方针”、“为了维持我军的威信，有必要严惩（华军）——杉山陆军次官的声明”等等，不一而足。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之后，听收音机和看国际媒体，成了林献堂仰赖的讯息来源。作为富家人，他自家拥有收音机，不要像穷苦人要从公众的广播塔听消息，那样的广播塔，和《台湾日日新报》一样，都是殖民当局的宣传管道。

当时欧洲各国报刊，如瑞士《日内瓦报》、《地方导报》、美国《纽约世界电讯》等，均在报道中直接对日本“侵略有理”的宣传提出质疑，并隐约传达出日本人掩耳盗铃的伎俩。林献堂这位有反省力的台籍爱国绅士，身在曹营，虽然有时也难免与殖民者虚与委蛇，但仍旧深藏着一颗作为中国人的朴素的心。他对日本蓄意发动这场与祖国间的战争深表气愤，为了让台湾民众能接受到可靠的战争讯息，他以《台湾新民报》社长身份，联合该报各股东，商定要让这份发行五六万份的汉文报纸，“代表四百万台湾人言论立场”。

于是乎，《台湾新民报》就“九一八”事变发出了与殖民当局的报纸、电台不同的声音。单从其在事变期间新闻版的标题，如《满洲遍地起风云，日本军占领奉天》、《张氏通电倡导和平，国家命脉一线仅存，披发纓冠拒容忽视》等，以及称日军不称“皇军”和“我军”，还有夹杂在新闻后头的冷语，如“霹雳一声，奉天城头飘扬着日本国旗，不见有青天白日了！”等，明显可看出该报“心向祖国”的民族主义立场。

在日本高压的统治下，《台湾新民报》“甘冒大不韪”的做法显得极其可贵。曾任该报股东的杨肇嘉在回忆文中指出，“九一八”时期，他亲眼看到《新民报》的编辑，为日本侵略祖国痛心愤慨，将所有电文凡“支那”皆改为“中国”；为不侮辱祖国，轻视自己，常与检查报纸的日本警察发生争吵。该报还经常刊登直接向日本政府发

出警告战争后果的言论。

《台湾新民报》真正反映了台湾人的心声,不仅为台籍知识精英所依赖,还成了台湾民众的“喉咙”。为了让这“喉咙”失声,殖民当局一方面对《新民报》大行拉拢手段,一方面也更加扩大了宣传渠道,除收音机、报纸之外,还利用影片在街坊、学校等处巡回放映。总督府作如此欺骗宣传不够,为防止台湾民众站在中国大陆那头,还发表了禁止建党结社的严令。

看到台湾民众“合法”的民权运动差不多就此画上了句号,连横悲愤之余,乃让独子连震东赴上海,投奔国民党元老张继。他在给张继的信中说:“……弟仅此子,雅不欲永居异域,长为化外之人,是以托诸左右。昔子胥在吴,寄子齐国,鲁连蹈海,义不帝秦,况以轩黄之华胄,而为他族之贱奴,泣血椎心,其何能怒?”对国之忧心,对儿之期望,跃然纸上。

四

1934年,日本政府为准备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提出所谓台湾“自治改革案”,以收买以林献堂等为代表的台湾上层分子。还拟成立各州“国防议会”,以“政府人民团结”的口号,诱惑台民入会,以图把台湾建成日本的“国防第一线”。为此,日本海军军令部长伏见宫亲王和海军元帅黎本宫亲王双双来台,鼓励所谓“国防第一线运动”,并为台湾“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举行成立典礼。

消息传出,台湾爱国民众同声讨伐。在“合法”的民权运动遭受扼制之时,他们决心以非常手段破坏这次“国防议会”成立大会。9月29日,即“国防议会”联合会总部成立前两天,青年工人郑清水只身潜入日本基隆警察署,埋下炸弹,炸毁了部分建筑物,并炸伤多名日警。对这个突如其来的爆炸事件,殖民当局十分恐慌,台湾第十六任总督中川健藏一面下令封锁消息,一面布置搜索。郑清水在杀伤追捕的日警后,毅然剖腹自杀,年仅21岁。

10月,东港乌龙23岁的青年杨万宝,为反抗殖民当局把台湾变成“国防第一线”,杀死日警,被俘关押后仍与看守搏斗,越狱逃出。日本出

动数千名警察和团丁,漫山遍野搜捕,毫无收获。这位勇敢无畏的青年后来病死于山中。同月,台湾紫云寺道士曾宗组织“众友会”起义,失败后会员427人被捕……

这些新一轮的“暴乱”,使殖民当局惊恐之余,加紧了对台民思想、行为的控制。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的日本台湾总督中川健藏,情知民主法律为敌掌握并利用的危害性,乃勒令林献堂停止他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运动”。

台湾议会设置运动从1921年1月开始到1934年9月结束,前后共组织请愿15次。虽然这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改良主义运动,采取的是叩头请愿的和平方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广大台湾同胞反对日本殖民统治、向往民族解放的情绪和要求。在上世纪二三十年文化启蒙尚未蓬勃开展之前,这项运动点燃了台湾近代政治文化启蒙的火把,对提高台湾人民的民族觉悟和斗争意识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连横既反对台湾成为日本的“国防第一线”,更不愿看到和平请愿也遭殖民当局扼杀的局面,于是他再次从日本控制下的台湾迁回大陆,定居上海。1936年6月,连横因肝癌在上海病逝。2个月,其孙连战(现为台湾国民党主席)在西安出世。在孙子未出生前,连横便遗言于媳:“中日必将一战,若生男则名连战,寓有自强不息、克敌制胜之意义,有复兴故国、重整家园、光明希望之象征。”这就是“连战”名字的来历。

身为历史学家的连横真是先知先觉了,如他所料的那样,1937年,日本挑起了“七七”事变,中国人民由此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台湾殖民当局宣布台湾进入“战时体制”,强令解散“台湾地方自治联盟”,强化对台湾的法西斯统治,以防“叛变”。在其推行的所谓“皇民化运动”中,文教界尤其受到箝制,不要说《台湾新民报》等中文报刊或中文栏目均遭停刊,连中文都严禁使用。

高压政策下,一批爱国文士没有沉默,更没有臣服,处身“地下状态”仍在进行激烈的斗争。

(责任编辑 杨继绳)

周总理与《中国青年》杂志

● 邢方群



周总理参观《中国青年》杂志创刊40周年展览

“人民总理爱人民”，这是1976年周总理逝世后广大人民对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和敬爱的领导人发自内心的歌颂。周总理有宽广的胸怀，他胸中装着广大人民；他对新中国的年轻一代的成长，更时常挂在心中。我从1953年到1963年担任《中国青年》杂志总编辑，从周总理关注这个杂志就可以感受到他对青年的热爱。

(一)

1953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刊载一篇

译文，题为《抽烟的害处》。文章着重叙述尼古丁对人体的严重危害，说“只要用十五分之一滴的尼古丁注入狗的血管中，狗就会死亡。一个人抽一支烟就几乎有千分之一克的尼古丁侵入人的身体。这个数量相当于能使人致命的分量的五十分到四十分之一。”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国内外都传说斯大林生前吸烟太多，以致得了不治之症，于是有些人开始不吸烟或

少吸烟。《中国青年》杂志刊出这篇文章后，由于这个杂志发行量大，读者又不限于青年，抽烟的害处便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震动，以至香烟的销售量大为减少。四川省一个专区的烟酒专卖公司在一个月没有完成销售计划，便埋怨《中国青年》杂志。不少青年写信问编辑部，既然吸烟有那么大的害处，为什么政府还允许农民种植烟叶？烟厂生产香烟？商店出售香烟？这些情况总理得知后，在一次会上，他说，在青年中提倡禁烟是完全应该的；但吸烟在中国以至全世界，有长期的历史，有广泛的群众性，因此，政府不能下令

一律禁止种烟卖烟和吸烟。他还指出,《中国青年》杂志登的那篇文章,在某些论述上把尼古丁的害处夸大了。文章说,一个人吸入多少尼古丁就会死亡,但要知道,抽烟的人不是一次就把那么多的尼古丁吸入体内的。另外,还有个国家税收问题。我们编辑人员听到总理的讲话后,认识到,宣传一个事物,不论是赞成或反对,都要注意科学性,对事物要进行恰如其分的分析。当然,总理是不赞成吸烟的,他自己就从不吸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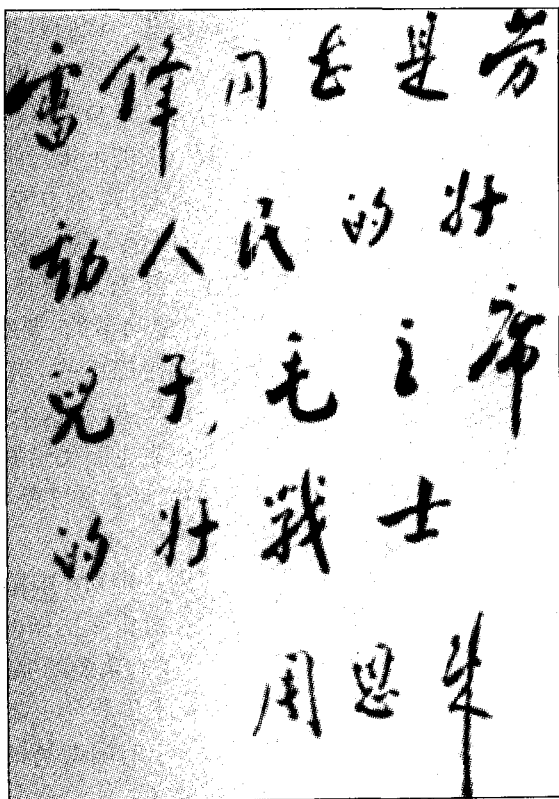
(二)

1957年10月初,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来,说有一篇文章,是周总理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的谈话记录。总理嘱交《中国青年》杂志刊登。我们听了很高兴,急忙派人把文章取来,还附有两幅照片。文章和照片都刊载在1957年《中国青年》杂志第20期上。现在我翻阅那期杂志,从一幅照片看出,周总理坐在美国青年中间,面带笑容,手打着拍子,与青年一起欢快地歌唱。另一幅照片是周总理俯身在一个乐器(类似“吉他”)上签名,两旁站着一些美国青年在注视着。总理同美国青年的谈话,口气亲切,立场鲜明。他一开始就说:“中国人民很欢迎美国朋友来中国访问。我们两国人民在过去很长时期内彼此往来得很多。最近这个时期中断了。这次你们一来就来了41位,你们作了打开两国人民来往的先锋。因此,我代表中国人民非常欢迎你们,同时,中国政府也欢迎你们这种友好的访问……”一个美国青年问:“我们两国之间更加密切的关系,对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何影响?”周总理说:“如果中美两国友好起来,毫无疑问,对两国的经济发展都会有好处。……任何一个

国家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完全闭关自给,总是要互相需求,首先是贸易的来往,技术的合作。这对我们中美两国,也不例外。当然这种友好来往,经济来往,也是要建立在不平等互利的基础上,这正是亚非会议29个国家所通过的原则。”一个美国青年提出:“美国国务院曾多次说过,在中国发生过种种暴行,被清除的人以百万计,这就作为不承认中国的理由之一。他们又说,在西藏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愿意评论一下?”总理答道:“一个革命的国家,当她初建成以后,总有一些反对新政权最严重的反革命分子,国家要消除一些,镇压一些,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美国和法国的历史中,也有过这样的事。总之,这是我们的内政……至于说到在西藏发生的什么事情,那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相反地,倒是美国有一部分人通过西藏的几个坏分子,进行西藏‘独立’的活动……这就是世界上常说的在别的国家进行的颠覆活动。这是一种敌视中国人民的行动。”周总理接见美国青年代表团,并同他们进行亲切坦诚的谈话,美国青年代表团很感动,团长说:“我代表大家感谢总理给予我们来华以后的一个特殊的光荣。”

(三)

中国共产党党员、模范共青团员、五好战士、解放军原沈阳部队工程兵某部运输连班长雷锋,于1962年8月15日因公殉职。他的模范事迹在沈阳人民和青少年中传诵着。1963年2月初,首都几家报纸先后刊载了雷锋的部分日记。共青团中央于2月15日发出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活动的通知。《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部决定出学习雷锋专辑。为此,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请为雷锋题词。信是在2



周总理为雷锋题词

月中旬发出的。编辑部首先收到周总理的题词,词句是:“雷锋同志是劳动人民的好儿子,毛主席的好战士。”之后,编辑部又收到毛主席的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毛主席题词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报刊要求刊登毛主席题词的手迹。有的报纸还要请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中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都为雷锋题词。周总理听说毛主席题了词,叫秘书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社,询问毛主席题词的内容。我们向总理作了报告。于是总理作了第二次题词,词句是:“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周总理题的这几句话,显然是经过思考的。因为毛主席的题词是“向雷锋同志学习”。学习什么呢,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周总理指明了学习的方向。

(四)

1963年10月18日晚,《中国青年》杂志社为纪念创刊40周年(创刊日期为1923年10月20日),在团中央礼堂举行晚会,并在礼堂的一个会议室里,举办一个展览,陈列有关《中国青年》杂志历史文物和当前状况的种种资料、图表、历年出版的杂志以及一些读者的反映等。我们夙知周总理关怀青年,也关心团的报刊工作,特发柬请总理前来参加纪念会。晚上八点钟左右,总理来了,我们事先已知道总理要来,团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克实、刘西元同志在礼堂门口等候,我也在场。总理来后先到展览室参观,他在室内边走边看边问边讲,我在他身旁作解说。杂志社不少同志聚集在一边,亲睹总理的风采,亲聆总理的教诲。当他翻阅陈列着的《中国青年》杂志1960年第21期(内容多是介绍“毛选”第四卷)时,批评说,文章太长了,和《红旗》杂志差不多,青年看不完,我们老头子看也觉得多了。帮助青年读“毛选”,最好一个问题讲一段,一年把四卷讲完,最好用札记的形式。文章多了,当时学起来也许有些心得,但是往往看不细,理解不深,过后还是忘了,短些的文章好。总理看到一个青年手抄的《中国青年》雷锋专辑(按:这个青年当时买不到那期专辑,向别人借来一册,亲自抄

录有关雷锋的文章。过了一段时间,他把手抄本寄给《中国青年》杂志社),很有感慨地说:“这证明你们刊物的发行份数需要增加。”又说:“你们还要把青年中这类动人的材料经常向我们反映,向各方面宣传。”总理绕着展览室参观了一遍,就站在一张长桌子旁,面向大家,对《中国青年》的方针和内容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说,党和政府考虑问题,要为全体人民着想,从刚生下来的小孩到老年人,都要想到。婴儿要进婴儿室、托儿所;稍长一些,要进小学;青年要学习、结婚、参加劳动;老年人要安度晚年,这些问题都要放在我们心里。拿青年来说,农村青年占绝大多数,城市中的知识青年,有的也要去农村,这就要解决他们的精神食粮问题。总理指出,你们纪念《中国青年》杂志创刊40周年,应该考虑今后20年怎么办?要有计划,确定新的方针。现在刊物发行145万份,百分之七八十在城市,只有很少部分在农村,无论从发行情况和刊物内容来看,都和农村青年的需要不适应,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进。我看今后《中国青年》的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总理说,如果你们愿意和能够担负这个任务,我就要替你们为增加纸张而奋斗。你们要我来,我就要解决这问题。

1965年2月26日,周总理接见各中央局和部分省、市、自治区出席安置工作会议的代表,并听取他们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几次提到《中国青年》杂志,叫杂志专门设一栏,讲农村青年的问题,每期至少要一半讲农村。内容里面有政治、农业生产知识、农业技术知识、农村通讯。要登些新的歌,要简谱的;要有革命的歌曲,搞些漫画,漫画要画得简单些。当时参加会议的团中央书记处的一位同志说,这个刊物的转变,还要一个过程,长期以来主要是给城市青年看的。团中央还有一个刊物,叫《农村青年》,今后要加强领导。

周总理对《中国青年》杂志的关怀,体现了党中央对青年工作的重视,对广大青年的重视。另外,我们亲爱的邓颖超同志,也同周总理一样,关怀《中国青年》杂志。在这方面,原《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委黎勤同志也写了一篇文章,我就不重复了。

(责任编辑 李晨)

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

● 杨培新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根据他在国统区的亲身考察指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中国的四大家族已经成为官僚资产阶级,垄断中国的经济命脉,正在残酷地掠夺民族资产阶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饱受官僚资本的欺凌和掠夺,敢怒而不敢言,他们盼望着国民党和四大家族的灭亡。南方局副书记董必武设想,可以利用“在商言商”的口号,动员舆论工具,支持和鼓励民族资产阶级站起来,反对和对抗四大家族,把党的统一战线扩大到工商界,进一步孤立四大家族。在这一方针下,1943年让我到重庆《商务日报》当记者。运用“在商言商”方针,支持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及其国民党政权的斗争。由于党的方针符合实际,民族资产阶级逐步站了出来,促成了反对四大家族的统一战线,为新中国诞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上世纪40年代,这一斗争大体上经过四个阶段:运用重庆《商务日报》,团结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掠夺的斗争;1945年抗战胜利后在上海筹备《商务日报》上海版的斗争;1947年参加上海《文汇报》,揭露四大家族的斗争;1948年参加创办香港《文汇报》,揭露国民党垂死挣扎,发行金圆券的斗争。

运用重庆《商务日报》,开展反对四大家族掠夺的斗争

重庆《商务日报》是重庆市商会的机关报,温少鹤家族支持这家报纸。三青团看到报纸的困难,乘人之危,抢夺了这家报纸,派高允斌当了社长。但是国民党内分崩离析,争夺权力。军统、中统割据一方,社内既无国民党的组织,也成立不

了三青团,党认为必须乘虚而入。原有的共产党员徐淡卢、徐逸安进入经理部,又让我进去当外勤记者,要我在数月内成为名记者,夺取采访部主任职务。董必武同志亲自制定了具体方针,并让他的秘书鲁明随时传达他的决定。徐逸安承担对高允斌的争取工作。当时总主笔周寒梅和总编辑金东平靠发表特务机关炮制的污蔑共产党的新闻和文章领取津贴和赏金。中政校毕业的傅某凭采访部主任头衔到自流井找盐商,混到了钱和一个美丽的妻子。经理则乘机取得贷款,经商赚钱。社长高允斌大权旁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供给几元钱的津贴,由于法币贬值,仅能买到几盒香烟。高允斌想收回实权,仰仗徐逸安出谋划策并组织一批人。我们提出“在商言商”的主张,建议不登反共新闻,以提高报格,并提出支持工商界反对统制经济的呼声。董必武同志指出,支持金东平参加中外记者团去延安,以便调虎离山,由我们接替编辑部和校对室,掌握发稿权。由我们推荐一批外勤记者占领采访部。王烈望主笔是交通大学教授,比较接近我党,因此言论部多发支持工商界的社论,由少发到最后不发反共言论。

在斗争中,对我们的对手采取只挤不赶的策略。金东平从延安归来,我们已经占领编辑部所有岗位,他急于上班,我们要高允斌采取拖延的办法,照发工资,不让上班。我们工资发不出,但他的工资却保证照发不误。日子久了,他习惯于不干活光拿钱的生活,从而避免了矛盾激化。

《商务日报》被我们争取过来以后,从1943年到1949年重庆解放,中共党员彭友今同志一直安然掌握实权。我们利用“在商言商”这个社会习用的口号,隐蔽政治面貌,真正做到了“隐蔽

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完满实现了党在国民党地区的方针。董必武同志十分看重这一时期的斗争,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还交待鲁明,要好好总结这段工作经验。

《商务日报》在商言商,在政治新闻方面,只发中央社的新闻,不登载左的言论,对工商界的利益坚决维护,深得工商界的拥护。沿海内迁工厂组织的“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头面人物如章乃器、吴羹梅、吴蕴初、胡厥文、范旭东、李烛尘和金融界的王志莘、陈光甫、徐国懋,都把《商务日报》当做自己的报纸。四川企业界的温少鹤、范崇实、何北衡、胡子昂以及自流井的盐商、内江的糖商,都支持我们。为了集中力量打击四大家族,我们对受四大家族欺凌和奴役的政学系也予以同情和支持,例如支持中国植物油料厂的张禹九、张肖梅,反对复兴公司垄断植物油出口。他的兄弟张嘉璈深得美国的支持,回国以后,特地约我在黄山见面,发泄对四大家族的不满。1945年中央银行黄金加价舞弊案发生后,我们集中火力攻击主事的宋子文及郭锦坤,放过政学系的财政部长俞鸿钧,这使他对我们产生了好感。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对抗四大家族的民族资产阶级的阵线,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我约《新华日报》记者李普同志一起去看李烛尘,李对政府低价收购永利公司产品发了一顿牢骚,我把它发了新闻。李生怕国民党找他的麻烦。可是几日后,国民党却提高了其产品收购价格。从此,李烛尘开始了对共产党的交往。后来李烛尘作为共产党提名的工商界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后出任轻工业部长。

到上海再办一个《商务日报》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努力争取和平,准备议会斗争,同时准备打仗。我党对《商务日报》团结工商界孤立四大家族的作用,作了足够的估计,考虑要在上海再办一个《商务日报》。潘念之老师是老共产党员,从事党的情报工作。他向周恩来同志建议,充分利用《商务日报》,并由广大华行卢绪章处拨给五百万元法币作为筹备经费。通过俞鸿钧的秘书黄苗子和吴铁城的秘书汪公纪,取得他们的介绍信,找到上海市长吴国

桢、社会局长吴开先、敌伪产业管理局长刘攻芸、南京内政部长张厉生,批准《商务日报》在上海出版,并拨给虹口三处敌伪产业房屋。党内指定宦乡、闵刚侯、王纪华帮助筹备,并争取民革的李世璋、李维城、农工民主党的章伯钧、民盟的吴晗支持报纸。我们在工商界得到胡厥文、余名钰、王志莘、周耀平等的支持。《新华日报》上海复刊未果,准备将卷筒印刷机转移给《商务日报》。当时负责筹备的有钦本立、徐逸安和我,我们不拿工资,靠写稿自筹生活费。我白天跑关系,夜晚给生活书店写书,给《文萃》投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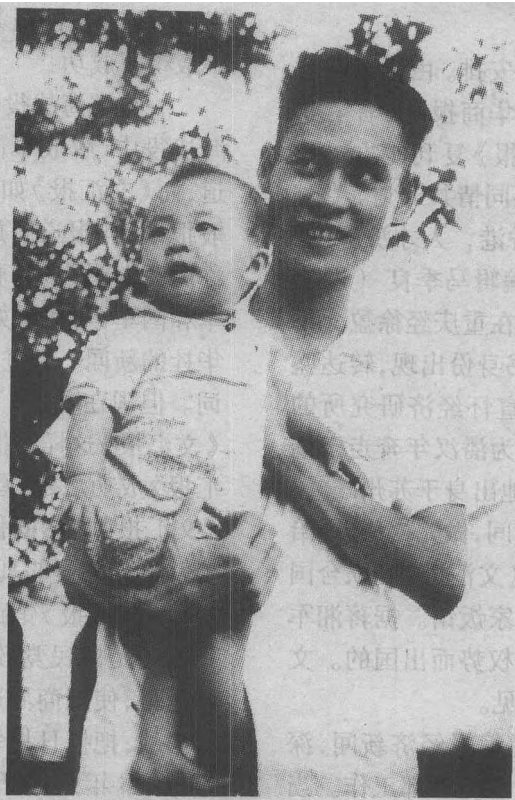
《商务日报》上海版对宣传我党主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起了重要作用。

参加上海《文汇报》

当时万事齐备,只等和平局面来临,就出版报纸。但是后来和谈破裂,1947年中共代表团撤退,我们决定停止《商务日报》上海版的筹备,参加上海《文汇报》工作。《商务日报》的到沪人员刘火子、王思曙、程光锐已参加《文汇报》编辑部,我和钦本立决定也到《文汇报》工作。我写信给徐铸成,徐铸成立即约见,欢迎我们去《文汇报》主持经济版。1947年3月我们进《文汇报》,是为了便于继续执行团结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的方针。

在重庆期间,我就看到桂林《大公报》具有自己的特色,言论比较公正,对文化界比较接近,并知道是徐铸成主持该报。上海《文汇报》则是新闻界的一朵奇葩。它在日本人占领上海之后创刊,在暗杀、恐吓中坚强不屈。抗战胜利后复刊,徐铸成和总经理严宝礼,吸纳了宦乡、陈虞荪、孟秋江等知名报人、共产党员,反对内战,敢与国民党抗衡,深得文化界、学生、工人的欢迎,成为群众运动的号角。《文汇报》是大型报刊,在知识分子中影响深远。为了在工商界中扩大影响,礼聘张锡昌、寿进文、秦柳方等经济学家主编经济新闻,并撰写社论。徐铸成对我和钦本立进《文汇报》深表欢迎。由我主编经济新闻并撰写一部分“编者的话”。钦本立、王思曙、夏其言同志采访经济新闻。王思曙写的《中国植物油厂内幕》,深刻揭露他们的丑闻。报纸上不时出现一些精彩的

新闻和专栏文章，成为上海《文汇报》的新亮点。我夜间去上班，看一万几千字的没有标点的稿件，边看边打标点。到凌晨再划出版样，加上标题，最后看过大样，步行回虹口休息。报馆提供龙井茶，泡上浓浓一杯，提神看稿。回家后兴奋，难以入睡。同时还应姜椿芳同志之邀，为苏商《时代日报》写半周经济述评，并一度应陈虞荪同志推荐，帮助《新民报》编“生意经”。中共代表团撤退后，《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坚持阵地，成为群众运动的号角。国民党视为眼中钉。在1947年5月，利用复旦学潮中吴国桢挨打事件，下令封闭三报，并逮捕



1948年香港《文汇报》创刊时的杨培新

《文汇报》记者麦少楣、《联合晚报》记者姚芳藻。中共党员孟秋江同志是《文汇报》采访部主任，利用记者身份到各大学学潮中采访之机，向学生运动领导人通消息，传达指示。报纸被封后，他迅速隐蔽。他曾写信慰问我，说他在居处附近打转，但不能相见，要我提高警惕，夜间不要在家过夜，患难之中见真情。不久他避难去香港。

在这紧张时刻，《文萃》编辑陈子涛经常在夜间来我家，彻夜编稿，黎明离去。他说，已得到党的支持，决定编印《文萃》地下版，要求我们给以支持。《文萃》的住处不能住了，他们要把房子顶出去，并从而筹集印刷费。徐逸安同志帮助找一位地下商人租下编辑部住地。国民党侦察房子盘顶经过，但由于经过报纸登过招租广告，无法加罪，只得作罢。《文萃》地下版，印了好几期，有《论纸老虎》、《新傀儡戏》。《文萃》封底印有读者扛着一支笔的暗记，出版后到外滩批发，报纸一抢而光。国民党政府穷追陈子涛。陈子涛一次到印刷厂看校样，被卧底的特务逮到，一对照片，才知道此人正是鼎鼎大名的陈子涛，被中统局逮捕。陈子涛把校样咽下腹中，使特务无法追究撰稿人名单。陈子涛与麦少楣同拘于中统局拘留

站。由于陈坚不吐实，被打断腿，终无所得。后来被押送南京，和编辑骆何民同被处以绞刑，英勇牺牲。经理部的吴承德等下落不明，后来才在宁波发现他们的尸体，弄清他们光荣牺牲的事迹。对陈子涛等烈士，我深为敬仰，追怀不已。

为《文萃》、《经济周报》写稿中，拆穿国民党利诱政学系和民族资本家的阴谋。国民党内战中耗尽了黄金和外汇。这时让张嘉璈当中央银行总裁，引诱陈光甫、秦润卿等出任外汇管理委员会中的一些职务，企图装出一副笑脸，拉拢他们，为四大家族效

力。我写了《两张的财权》（两张指张群、张嘉璈）、《美金公债不是生意经》，劝阻他们不要存有幻想。张嘉璈邀我见面，我面劝张嘉璈不要为他们殉葬。后来张嘉璈赴美，张禹九到南洋，都不去台湾，秦润卿等留在上海。

筹备香港《文汇报》

徐铸成在《新民报》复刊后，曾希冀和叶楚傖公子叶元合作，利用《国民午报》牌子，出版《文汇报》，但国民党绝不松口。不久，徐铸成告诉我，潘汉年是他的表亲，曾劝他不要对国民党再抱幻想，不如到香港去复刊《文汇报》，再销到上海、青岛、平津。徐并邀请我到香港一起参与《文汇报》的复刊，以回应国民党查封报馆的暴行。我和宦乡商量，他赞成这一决策。

1948年夏，我到香港见到徐铸成、马季良、孟秋江、刘火子、王思曙等一些熟人。借陈济棠公子的荷里活道房屋和印刷机，积极筹备复刊事宜。1948年9月3日香港《文汇报》出版。徐要求我除主编经济新闻外，兼任副经理，管理经理部工作。丁君甸是经理，他筹备印刷厂后不久，就不辞

而别,返回上海。

党对《文汇报》复刊,作了安排。由民革李济深先生支持筹集部分资金。《华商报》在香港职工中很有威信,但希望《文汇报》复刊能争取知识分子和工商界这些中间阶层同情共产党。当时文化界和民主党派人士云集香港,人才济济,足以办个有影响的大报。由总编辑马季良(即唐纳)负责联系李济深。马季良在重庆经徐盈介绍找过我,当时,他以盛莘臣秘书身份出现,转达盛宣怀七公子盛老七邀我创办宣怀经济研究所的要求。徐铸成告诉我,马季良为潘汉年奔走于港沪之间。马季良是谦谦君子,他出身于苏州旺族,在电影界很有地位。他在港期间,做完夜班,还给他的爱人写情书。不久,离开《文汇报》到联合国工作,后来听说在巴黎开了一家饭馆。据蒋湘军告诉我,马是为了躲开江青的权势而出国的。文革后,我深深佩服他的真知灼见。

我在香港《文汇报》每晚编辑经济新闻,深夜回家,次日上午又到报馆处理经理部工作。当时,我主要联系章乃器、王宽诚、庄世平、郑铁如、黄长水等工商界头面人物,并且得到他们的热诚帮助。经济新闻记者有王思曙、刘柏桦,他们很辛勤努力。同时还得到《经济导报》赵元浩、孙孺、陈文川等的帮助。王思曙是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生,经金仲华介绍,到重庆《商务日报》工作。他刻苦努力,很快熟悉了经济报道。后来一起到上海,参加《文汇报》,担任经济记者。香港《文汇报》创刊后,他又担任经济记者。建国后,他到人民银行总行国外局担任处长,并出任香港金融工委成员。1957年因代表民建综述成员鸣放情况,转述弼马温官卑职小的意见,竟被划为右派。后来分配到东北密山劳动,因扛树木过重,昏倒路旁,冻饿而死,真令人浩叹。刘柏桦是《华商报》总编刘思慕先生的弟弟,是一个好记者,我离开《文汇报》后他曾任总编辑,在“四人帮”统治年代,受折磨死在岗位上。马锐筹是我在恩施《新湖北日报》同事,后邀到重庆《商务日报》任编辑部主任。抗战胜利后赴台湾做新闻工作。“二二八”事件后,被捕入狱。释放后到日本,看到香港《文汇报》发行人是杨培新,赶到香港找我。我引见乔冠华,担任《文汇报》副总编辑,他辛勤工作,鞠躬尽瘁死在岗位上。

香港《文汇报》初战告捷。主要是两个事件中取得了成功:

一是淮海战役中忠实报道,得读者好评。淮海战役中,解放军占领开封,国民党作了虚假报道,而《文汇报》如实报道,令读者震惊。当时一般报纸,均报道解放军为“共匪”,《华商报》则称国民党军队为“蒋匪”。徐铸成认为,应称为共军和国军,对战事如实报道,中央社、美联社和新华社的新闻一起登。对于这点新闻界同仁不无微词。但现在看来,当时工商界思想比较保守,对《文汇报》这样的报道方式还能接受。这正是《文汇报》成功之处。香港领导人乔冠华、夏衍也赞成《文汇报》以中间偏左的面目出现。当时香港要了解解放战争的真实情况,非看《文汇报》不可,这使《文汇报》销路激增。

二是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文汇报》戳穿内幕,使工商界避免了一些损失。国民党为了打内战,把抗日战争中积累的黄金和外汇花个干净。1948年8月19日王云五发行金圆券时,手中既无外汇也无黄金,是想把民间储存的黄金、外汇,连骗带抢掠到手中。

香港《文汇报》的上海特派员钦本立和南京特派员浦熙修,把中央银行的黄金外汇库存被消耗干净如实报道出来,估计物价限价最多能维持一个月,这个报道使工商界震惊,币信破坏无遗,兴起了抢购风,引起了市场崩溃,人心动摇,使这个阴谋彻底破产。当时有些报纸为国民党捧场,为金圆券造势,凡是迷信国民党宣传的商人,遭受巨大的损失。香港《文汇报》的报道,帮助部分商人避免或减少了损失。社会上日益相信《文汇报》的报道,也使《文汇报》销路日增。

香港报纸每天早晨在利源东街批发,新创刊的《文汇报》销路天天增加,为国民党鼓吹的报纸销路日蹙。这就使新闻界猛醒。香港《大公报》的王芸生、杨刚、李纯青等倡议和共产党合作。从而形成《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三报大联合的局面。新闻界的通气会议有乔冠华(代表《新华社》)、夏衍(代表《华商报》)、金仲华(代表《国际新闻社》)、刘思慕、张铁生(代表《华商报》)、徐铸成和我(代表《文汇报》)、王芸生、李纯青、杨刚(代表《大公报》)等参加。从此改变了新闻界力量的对比,扭转了舆论动向,为新

中国的成立呼唤。

浦熙修、钦本立和天津特派员潘静远对《文汇报》作出特殊的贡献。浦熙修和我在1943年重庆新闻界的长寿电力考察中认识,人称“浦二姐”。她写的《长寿之行》很有文采,宛如一篇桃花源记,我为之折服。她是江南才女、诗书世家。浦二姐秀丽温柔,文笔流畅,和《大公报》的彭子冈同为新闻界的女中豪杰。浦二姐对我们十分友善、谦和。她的报道冒了很大风



重庆《商务日报》部分同仁1988年合影

险,厥功甚伟。可叹的是浦二姐、浦三姐(彭德怀夫人)先后遭受反右、反右倾机会主义和文革的沉重打击。浦二姐身患癌症,过早谢世。这是好人一生坎坷,令人感叹不已。

钦本立是我的老战友。他由闵刚侯介绍到重庆《商务日报》。他性格直率,写的文章锋芒毕露。抗战胜利后,一同到上海筹备《商务日报》,后来一起参加《文汇报》。他写的《美帝侵华史》,很有见解。他留在上海,为《文汇报》提供了很好的新闻和通讯。他和浦熙修一起参与上海《文汇报》建国后复刊,闯出了办报的新路。三中全会后,他和李鸿礼创办《世界经济导报》,我建议它应成为中国改革的号角。徐铸成评为最好的报纸之一。可惜他身患癌症,过早离世,对这个老战友,我们怀念不已。

香港《文汇报》的孟秋江同志也是令人怀念的勇者。他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报道学潮、工潮中,发挥了号角作用。他后在天津《进步日报》任社长,再派回香港《文汇报》任社长。文革中应召回国后,被立即押到会场批斗。对“四人帮”的暴行,他以自杀抗争。我曾到张自忠路他的寓所,听到他自杀的情节,真为他以生命直批“四人帮”逆鳞的壮举,感佩不已。

香港《文汇报》在创办之初,经济拮据,同仁工资常拖延发给。严宝礼曾一度到港,带来部分资金,但主要靠民革筹措。香港《文汇报》同仁,

作出了很大的牺牲。我作为副经理,有愧于心,没有同仁的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就没有香港《文汇报》今天的辉煌局面。

香港《文汇报》的成功,应当说,徐铸成厥功最伟。徐铸成是优秀的报人,最好的新闻记者,他在上海沦陷期间,面对日本人的暗杀、恐吓毫不畏惧。在《大公报》张季鸾传人中,最先站出来和共产党合作。他在艰辛奋斗的日子里,创办香港《文汇报》,建国后复刊上海《文汇报》,走出办报的新路子。他爱听京戏,能言善饮,有他的个人嗜好,有文人的个性,但并不妨碍他作为直言不讳、秉笔直抒的新闻记者品质。由于徐铸成在群众中很有威望,被定为政协委员,离港北上。临行前要我接任发行人,我盼他早日返港。

1949年北平解放,我认为“在商言商”支持工商界反对四大家族的使命已经完成,新中国即将成立,我准备到北平去。临行前我向乔冠华汇报,请求党直接领导《文汇报》,解决《文汇报》的资金困难。我从此结束了40年代的记者生涯。

香港《文汇报》现已如日中天,前途似锦。报纸庆祝创办五十五周年,缅怀创业艰辛实属明智之举。昔日艰辛与今日辉煌不可分离。特撰此文,以追悼前贤,抒发哀思,并祝贺今日同仁,共庆盛典,开创未来更加辉煌的局面。

(责任编辑 李晨)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

● 马洪林

一、引子

1970年1月11日，中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在康平路原上海市委书记处小礼堂突然召开了一次由他主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要成员参加，进驻上海师院工宣队团长孙林宝、政委张惠明，驻政史系工宣队连长王金宝、副指导员李芝道，上海师院革委会主任缪财生，教师马洪林、项立岭、王铎全、汤才伯出席的小型座谈会。此事被“四人帮”当权者定名为“元月座谈会”，并由项立岭、王铎全、汤才伯整理成《座谈会纪要》，据说还上了中共中央红头文件。座谈会的基调是：上海某些高等学校的资产阶级势力包围了工宣队，工宣队在资产阶级势力进攻面前打了败仗，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月13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大会，由徐景贤向全市文教、卫生、出版、科技等系统传达。随之，掀起了揪斗“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浪潮。张春桥特派上海警备区政委徐海涛坐镇上海师院政史系，直接指挥批斗以鄙人为代表的所谓“政史系资产阶级势力”。在篡党夺权百忙中的张春桥，兴师动众去围攻一个高校的小助教，实在令人费解。不过，你看了正文就会明白，原来张春桥做贼心虚了。

二、正文

1970年1月9日下午4时左右，我从上海师院第十教工宿舍122号起居室，走到东头出口处报插取《人民日报》，这时政史系政治辅导员朱爱慈正送一个小青年从楼梯上下来，我一看是《文汇报》理论部的记者郭志坤，他约我写过稿子，也可以说是熟人了，可他和朱爱慈朝我笑笑，不打招呼，侧身而过。我以为这些“无冕之王”一向目中无人，做梦也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1970年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枪声就是命令》的思想评论，指桑骂槐地说：“对于那些敌视革命，死抱住旧文科的一小撮人，红卫兵就是要造他的反，贴他的大字报。”公开挑动红卫兵造我们这些抵制“四人帮”的人的反。11日中午12时许，上海师院的所有高音喇叭播放着同一个声音：“请马洪林同志听到广播后，马上到院革会办公室，有要事相商。”我听到广播，立即穿上破棉袄，提起拉链包，从西首门洞走出第十教工宿舍，一辆黑色小轿车正停在水泥路上，缪财生打开车门招呼我上车，我还傻乎乎地问他：“有什么重大政治任务？”缪说：“不清楚，到了市革会就知道了。”

到了康平路原市委书记处大门口，有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拦住汽车，拿着一张打印的名单，一一验明正身，才放入院内。有一位穿军装的秘书特意领着我在前面登上台阶进入小礼堂的前

厅,记得左侧是衣帽间,右侧是盥洗室。又进入一道玻璃门,见是一个大会议室,中间放着几排橘黄色长条桌椅,最里面居中坐着一位披军大衣戴眼镜的中年人,埋首在看一份《白头简报》,秘书把我领到他面前,附耳说了什么。他抬头看了我一眼,一束冷酷的目光从镜片后斜射过来,指着面前的一把椅子说:“坐,坐。”我见是张春桥,立即想起1967年1月28日我和同事们因抗议张春桥派兵包围复旦大学抓捕学生,而参加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炮轰张春桥,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进入交通大学校园时,被“反到底兵团”关起大门抓住,在教学大楼关押一夜,返校后又受到本校“反逆流”干将以“幕后策划者”的追查,心中一直愤愤不平。

下午2时整,会议室已坐满了与会者,有王洪文、姚文元、马天水、王少庸、徐景贤、王秀珍、陈阿大、朱永嘉、徐海涛、郭志坤等,冠盖如云,谋臣如雨。徐景贤环顾左右说:“项立岭同志怎么还没来?”张春桥忙说:“用你的车,快去接!”王铎全自告奋勇:“我认识项立岭的家,我陪你去。”不多时,项立岭身穿呢短大衣进来了,一声不响地坐在我旁边。

张春桥用山东普通话语气严峻地开场说:“昨天晚上看了《文汇报》送来的《简报》,一夜没睡着。在上面批了八个字: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今天找师院政史系的同志开个座谈会,了解一下下面进行大批判的情况。师院政史系的情况值得注意,为什么写大批判文章却受到阻碍呢?究竟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马洪林同志,你是大批判组长,谈谈你们那里大批判进行得怎么样?”

我不知是计,盲目相信张春桥的话,立刻振作精神一五一十地报告,本系组织过多少次批判会,发表过多少篇批判文章,编写过多少部革命教材,本系斗、批、改成绩如何辉煌。忽然听到张春桥大喝一声:“你不要讲了!我今天才知道下边是怎么欺骗我们的。你说的全是假话,和我掌握的情况完全是两码事。有人被你蒙蔽了,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们不是讲分析形势吗?师院的阶级关系阶级力量

对比应怎么估计?分析形势总是要从阶级关系分析,师院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地方,原来占绝对优势,工宣队进校后改变了多少?事实上,你们那里的资产阶级包围了工宣队,用各种方式把我们的工宣队包围着。”我一时被惊呆了,一个中央领导人、上海市的一把手怎么这样专横无理?我说的全是事实,怎么全是假话呢?何况政史系的工宣队连长指导员、学生缪财生、教师项、王、汤都在座,他们都是大批判的参加者和见证人,我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吗?原来张春桥只相信手中那份颠倒黑白的《白头简报》。

据查,《白头简报》是一种不署名、不注明出处的机密报告,由“四人帮”的联络员搜集整理,经《文汇报》印刷,直送“四人帮”头头专阅。此份《白头简报》以项立岭诬告工宣队压制他写大批判文章的信件为主要内容,由项立岭等在密室精心炮制,经郭志坤剪裁成文,在《文汇报》印刷并密报张春桥。粉碎“四人帮”后,我有幸拜读过这份《白头简报》,其特点是有时间、有地点、有的人物、有对话、有背景,深文周纳,假话假说,伪造得和真的一样。这份题为《“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一文发表后,上海师院政史系无动于衷死水一潭》的《简报》共四大部分:

(1)上海师院政史系形成一股资产阶级势力,通过各种手段包围了工宣队。主要人物都是



1977年10月17日作者在西藏江孜宗山上俯瞰全城

炮打张春桥同志的干将，灵魂人物是马洪林，复旦校友兵团头头王春瑜是急先锋。

(2) 政史系工宣队晕头转向，对积极参加大批判的同志进行压制，马洪林吹捧工宣队篡得身兼三职，没有把握阶级斗争的大方向，没有把矛头指向资产阶级，而是指向誓死保卫春桥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上海市革会写作班成员项立岭同志连续被批判6次。工宣队执行了一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3) 政史系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和反动学术权威逍遥法外，没有对他们进行革命大批判，更没有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列出了18人的政治历史问题，认为应发动群众把他们批倒批臭。

(4) 政史系炮打情绪严重，至今未受到批判，有人暗中搜集春桥同志的黑材料，马洪林甚至搜集了春桥同志“一麻袋的黑材料”，企图打倒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思潮至今没有收敛。

张春桥睡不着觉，其因盖出于此。

徐景贤的语气则充满了杀机，他说：“马洪林同志，听说你不辞辛苦，搜集了春桥同志一麻袋黑材料，还用恶毒的语言攻击上海写作班，你竟敢诬蔑‘丁学雷’写作班，是在丁家花园里学雷锋。”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文革年代，收集江青、张春桥的材料，攻击“四人帮”的写作班子，都被定为现行反革命行为。前面张春桥的开场白虽然极具煽动性，但我仍迷信他们都是党的高层领导人，总得实事求是，不能无中生有吧！我甚至天真地认为，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不识阴谋家的险恶用心，竟强项争辩说：“我参加过炮打春桥同志，但没有收集过一份黑材料，只是觉得上海写作班用丁学雷作笔名欠妥。我一直认为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岂能混淆黑白！”

张春桥听了哈哈大笑，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好啊！你的革命大方向完全错了。我张某人怕什么？我出生入死干革命，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一生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写一本《毛泽东传》，想不到遇上你这位阎王爷，使我平生不得志。景贤啊，可别小看了这些人，他们人数少能量大，呼风唤雨，借刀杀人。人家马洪林是大学教师，你是什么学校毕业的？”徐心领神会地说：“我是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张春桥又

问：“洪文呢？”王洪文以不学无术为荣地说：“我小学毕业。”张春桥绵里藏针语带讥讽：“是啊，我是济南正谊中学的中学生。我们都是中小學生，人家大学教师能看得起咱吗？我可告诉你们，上海是个海，无风三尺浪！上海高校是藏龙卧虎之地，有一股死硬的资产阶级势力，是上海阶级斗争的晴雨表。哪一次炮打妖风不是从高校刮起来的？”他气呼呼地站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说：“马洪林同志，不要说你有一麻袋黑材料，就是有十麻袋黑材料，我照样是毛主席的好学生。”他凶狠地点着工宣队连长指导员和我说：“你们是师院的豺狼虎豹！我们这些人要当心，别落进豺狼虎豹之口哟！我今天就是要打倒你们这些阎王，解放小鬼项立岭同志。”我吃惊地看着张春桥骄横的样子，一时说不出话来。他以为击中了我的要害，又猫哭耗子假慈悲地拍拍我的肩膀，用居高临下的口气说：“你别紧张，我们都是同志嘛！我是打不倒的，不信，问问你的学生缪财生同志，他是上海红革会的头头，多次领着红卫兵炮打我，我张春桥不还是张春桥吗？他炮打我，还担任你们院革会主任，我不是照样很信任他吗？此事今后不提了，我决不以拥护我还是反对我来划分革命还是反革命的界线！”又说：“我和文元同志开了关于大批判的会已经有一个多月了，为什么开展不起来？为什么讲了这么长的时间没有行动？我和文元是小人物，讲话没人听。《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指1月5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科大学一定要搞革命大批判》一文），总该听了吧！”并把“政史系不搞革命大批判”的罪名强加在工宣队身上，说什么“我很怀疑有些人拿着工宣队的旗号干刘少奇的事，不准人家搞大批判！”他还批评徐海涛镇压不力，说什么：“徐海涛，今天我又要批评你了！你这个名字不错呀！可惜呀！你既没有海，也没有涛！”我这时才多少明白了一点，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追缴那子虚乌有的“一麻袋黑材料”。

关于本人整了张春桥“一麻袋黑材料”的传说，在师院传播已久。我确实拜读过张春桥的《龙华集》，一张一张地翻阅过张春桥主编的《解放日报》合订本，不知天高地厚地向访问我的一些师生，指出张春桥在《龙华路上》引用革命志士张恺帆《龙华古寺仰高风》诗之不伦不类，在《莫

斯科的月亮》抄袭胡适“美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之东施效颦。也说过张春桥的《论资产阶级法权》有片面之处。一位政治辅导员曾亲眼目睹我在系资料室翻阅《解放日报》，并询问我翻阅这些陈年旧报干什么？今天已无法确定谁是吹出“一麻袋黑材料”的始作俑者，但也使我体验到文革期间的人心险恶。1968年8月，工宣队进驻上海师院的第二个月初就采取“九四”行动，996名工宣队员把师院翻了个底朝天，声称就是掘地三尺，也要挖出这“一麻袋黑材料”，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我是一介寒士，为人处世从不设防，常以直言敢谏自诩。听张春桥还把我叫成同志，又书生气十足地冒死进谏说：“现在北京的梁效，上海的丁学雷、罗思鼎领导着全国的大批判运动。上海写作班住在丁家花园，用丁学雷笔名不妥。因为丁家花园是李鸿章为他的的小妾丁香置的欧式花园洋房私宅，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组怎可冠以卖国贼小妾的姓氏呢？”

这几句大实话，刺得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阵骚动，只听会场上轰然一声，许多人站起来用手指着我大声吼叫：“马洪林，你炮打思潮至今还未收敛，今天还当面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我不服气地说：“我说的都是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王洪文最有“造反派脾气”，他擂着桌子大叫：“马洪林，你再狡辩就砸烂你的狗头！你到现在还在炮打，有些话是很恶毒的，你把写作班比作什么？有些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搞资产阶级专政，搞独立王国。”以大批判杀人出名的“姚棍子”则对项立岭说：“你们这些造反派，锐气哪里去了，怎么棱角都磨光了，为什么不写文章反驳他们？”

张春桥不知是兴奋还是紧张，不小心把面前茶杯打翻了，茶水顺着台面流到我的面前，我赶紧用抹布把水擦干，引来张春桥一声

冷笑：“你们看，马洪林这样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其特点就是口甜手勤，而老干部的特点则是个老奸巨猾。”徐景贤接着无限上纲地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吹、捧、抬、拍的方法向无产阶级进攻，比糖衣炮弹还厉害一百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接着王秀珍对我进行“触及灵魂”的批判。可惜她声音沙哑，不如张春桥那样能言善辩，声声如刀。

这次座谈会挂帅印的自然还是张春桥，他一擂鼓点，其部属必轮番上阵。其中以徐景贤最会揣摩主子的意图，对张春桥极尽奉承阿谀之能事，他紧锣密鼓地说：“师院政史系的工宣队打了败仗，资产阶级势力已经占领了那里的文化思想阵地。马洪林同志，你是教育革命组长，大批判组长，又是教材编写组长，身兼三职，你不嫌太多了吗？你到底站在哪一边？站在无产阶级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一边？”

张春桥显然感到对我几个小时的狂轰滥炸，还没有制服又酸又硬的我，便拿出一份上海市革委会文件宣读一遍，并解释说：“最近发现有人在农村演出时，公然在舞台上丑化杨子荣的光辉形象，破坏革命样板戏，这是明目张胆的现行反革命行为，而在台下看戏的复旦大学写作班，竟然拍手叫好，简直是麻木不仁。为了誓死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我特意亲自起草这个文件，对破坏样板戏的人处以极刑。”徐景贤明知故问：“春桥同志，什么叫极刑呀？”张春桥得意地向椅背上一靠，厉声高叫：“极刑，就是



1977年10月18日作者(右三)访问后藏帕拉庄园“朗生”(奴隶)

枪毙!”又霍地站起来用凶狠的目光扫视全场:“极刑,就是杀头,明白吗?”顿时,全场一片寂静。张春桥挥笔杀人,比法西斯还法西斯。

张春桥意犹未尽,咬牙切齿地说:“不要怕难,针插不进就用锥子,锥子不行就用刀子,我今天不是动刀了吗?在这块阵地上战斗,不准备头破血流是不行的。这次还得动刀子!”秘书叫张春桥去吃晚饭,他摆摆手说:“不吃了,今天要斗争到底!”

张春桥接着对王洪文说:“上海煤气公司有个小技术员桑伟川,竟然狗胆包天,写文章与文元同志商榷,为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辩护,我亲自写了编者按语,把他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让人们见识见识什么是大毒草。听说他不服气,那就叫工总司派人押他到各工厂批判,我就不相信武器的批判不能战胜思想的批判。”桑伟川拒绝出席,手执铁棍头戴藤帽的文攻武卫队员们,就用铁棍把他挑起来抬到各工厂游斗。桑伟川被“武器的批判”打得遍体鳞伤,气息奄奄,直到被逼疯了,仍然像猫玩老鼠一样,对他实行二十四小时连续批判。

张春桥一看表,已是晚上7点,从2点至此,我已经站了5个小时。张春桥宣布:“今天座谈会就开到这里。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希望你今后挺起腰杆子做事,夹起尾巴做人。”我对这种仗势欺人的座谈会心中不服,拎起拉链包转身走出大厅,发现张春桥跟在后边,就加快速度走出过厅,在下台阶时张春桥竟追上来与我握手言别,一时又把我弄糊涂了,可我一到家就被宣布隔离审查了。我不敢相信,他那“马洪林同志的问题不予追究”的话言犹在耳,怎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呢?

三、余响

从此我跌进了灾难的深渊。“元月座谈会”次日,我被押回松江县佘山公社陈坊桥大队江秋八队接受审查。下午,在佘山旁的凤凰山大草棚内召开全院大会,张惠明传达了张春桥的讲话精神,布置了批判“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战斗任务。政史系工宣队被诬陷包庇重用炮打情绪严重的教师,连长指导员成了“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揪斗他们的名字写得巴斗大。但工人师傅坚

持真理,实事求是,并没有在“四人帮”淫威面前屈服,被以“轮换”为名赶回工厂。为了打垮师院的“资产阶级势力”,工宣队召开了“宽严大会”,当场给师院附小校长曹炯戴上手铐,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把王春瑜揪上台示众,宣布成立专案组隔离审查,对所有参加炮打的教师进行抄家;对王春瑜实行毁灭性抄家,即把所有家具砸得粉碎,把书籍全部撕成碎片。同时还隔离审查了蒋葆庆、孙仲发、陈新权,日夜逼供交待炮打张春桥的“罪行”。王春瑜被折磨得了急性肝炎,生命垂危;陈新权被长期关押患了肺病,仍批斗不止。在一次批斗会上,陈新权昏厥跌倒直挺挺躺在地上,批判者竟说他是因为被揭发“攻击林副统帅”吓昏的,倒在地上是装死,冲上去反剪他的双手,抓住他的头发,拖起来继续批斗。

座谈会不久,佘山脚下开来了一长串车队,由徐海涛带队,有上海各高校的头头,《文汇报》、《解放日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新华社记者现场观摩,开始押我到各系科、各生产队游斗。我的贱名被写得有一人高且倒立打叉,涂满了江南山野乡村的白墙。虽然没有给我挂牌子、戴高帽子和坐喷气式飞机,但在“批马领导小组”精心策划下,到5月31日返校前,已进行了上百场的“口诛笔伐”,折磨得我面黄肌瘦、形销骨立。他们还在《文汇报》上撰写了长篇大批判文章《从康有为到刘少奇》,批判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所谓改良主义,诬陷我编写的《商鞅变法》是为改良主义招魂,鼓吹“三自一包”,企图从理论上把我压倒。这期间我企图以死抗争,梦想效法屈原投江自沉或追随外语系的龚皓跳罗山自裁,都因被人日夜看守而未成千古恨。粉碎“四人帮”后,我听说敝校被大批判逼死了22人,夏乃儒教授惊异地说:“马洪林被张春桥点名批判未死,是师院文革的一大奇迹。”这期间,张春桥遥控指挥着手下人给他的密报《对市革会元月座谈会的反映》简报(1—11期),穷追所谓黑材料而未得逞。

5月31日上午,一辆大客车把政史系教工从松江佘山拉到师院卫生室前停下,当全体教工下车回家时,工宣队宣布我留下,押回政史系继续隔离审查。当他们把车门关上时,我听到一个小女孩凄惨的叫声:“爸爸,回家!”我不顾一切地站

起来,看到我的小女儿马燕站在车下哭泣。看守人伸出头大喝一声:“你爸爸是反革命,不能回家!”而大客车押解着我调头就走,这小女孩竟发疯似的在车尾狂追不舍,直到她那瘦小的身影消失在汽车扬起的尘埃之中。

我的囚室设在师院东部办公楼西出口楼梯右边北向房间,内设两张双层床,令我睡在一张床的上层,下床要报告,以免逃逸;另一张床横在门口,由两个中国“盖世太保”蛇盘狼踞其上,严密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四壁和门窗早已贴满了大字报和文革流行语:“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马洪林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我简直就像被关在一个用大字报糊成的纸笼子里,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这样顶牛到7月1日党的生日,我这个共产党员才被“特赦”回家。

再说时令到了九月初,张春桥在师院的联络员特意到系里通知我:“今天下午一点半,在东部礼堂召开全院大会,你必须准时参加。”我对张春桥遥控千万人追查“莫须有”的“一麻袋黑材料”反感透了,届时不仅拒绝赴会,而且在床上高卧不起。据说主持人准时在东部礼堂主席台上大叫:“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押上来示众!”满礼堂的人站起来四处张望,不见鄙人的影子,立即闹轰轰响成一片。主持人被我的蔑视惹恼了,他站起来大喊:“这还了得!派人去抓马洪林到现场批斗!”专案组长得令,立刻率领一批小将飞奔到第十教工宿舍,架起我的双臂,脚不点地冲出人群,直奔东部礼堂而去。

东部礼堂正门大开,我被押着从正中甬道走向主席台。这个礼堂原系华东音乐学院的演出厅,该院迁走后留给我们师院的,共鸣效果极佳,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这山呼海啸般的怒吼,真是慑人心魄,荡人元气。也许正应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古训,我故意昂首漫步,模仿走向刑场的志士状,气得会议主持者们暴跳如雷。我被押上主席台右侧,仍像一头山东倔驴不肯就范,这时从台下跳出来两条“武林高手”,拼命揪着我的头向下压,我则用尽吃奶的力气向上撑,在垂死挣扎中我听到造谣公司老总们上纲上线的批判。最后,主持人拍着台子问我:“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马洪林,你认罪不认罪?”我认为这些打

手的发言全是胡说八道,只回答了两句话:“谎言重复千遍也不能成为真理;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结果我在一片打倒的吼声中被轰出了会场。

我不堪凌辱,多次提出申请,要求回老家种田,均遭拒绝。1972年春,我被押着作环绕上海一周的拉练,当走到昔日我参加“四清”的金山县松隐公社田间时,陈新权问我:“远处土堆上的人在干什么?”我过去曾和贫下中农在那里烧过砖,便不假思索地说:“贫下中农在那里造窑,准备烧砖!”有“包打听”火速报告领队,谎称:“马洪林诬蔑贫下中农造谣!”不容分说,当晚就在松隐公社七一大队对我召开了批判大会。

1976年夏季,上海高校掀起了支援西藏的活动。据说是周总理生前的嘱咐。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在一夜之间要求支援西藏的大红纸决心书,挂满了系办公室前50米的长廊。那时我隶属于中国历史教研组,教研组长是我的老师陈旭麓教授,他动员我支援西藏,可以暂时脱离“上海陷阱”之苦。

1976年7月14日,我和上海高校42名战友到达拉萨西藏师范学院(今西藏大学),1978年7月15日离开拉萨,经敦煌、北京、青岛返回上海。在西藏整整两年为翻身农奴服务,是我人生最有价值的黄金时代。在这里,我有幸遇到了新华社驻拉萨的资深记者魏辅政先生。他早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当时任职于新华社江苏分社,也是支藏干部。他与我作过几次长谈,对我遭到“四人帮”迫害非常同情,挺身而出要为我这个小人物写一份通天的新华社《内参》。他说只印22份,直送每位政治局委员。不久,中共上海市委接到中央为我平反的批示,由上海市教委主任兼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凯同志亲赴上海师范大学本部指导为我平反。

1976年12月28日,西藏党政军民两万人,在拉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举行声势浩大的深揭猛批“四人帮”篡党夺权滔天罪行的大会,我作为自治区宣传系统的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会后举行了群众大游行。著名歌唱家、西藏歌舞团团长才旦卓玛走过来紧握着我的手说:“马老师,你第二次解放了,扎西德勒(藏语,吉祥如意)!”

(责任编辑 李晨)

在父亲王森然身边的日子

● 王润琴

童时的记忆

在我小的时候,很少见到父亲,他整年不在家,当时是在直隶保定教书,后来嫁给田汉的安娥、王若飞的夫人李培之、张苏的夫人齐树容都是他那时的学生。武昌起义爆发,他是第一个剪掉辫子的,并不让他的大妹妹裹小脚,还送她到定州城里去读书,大姑多次偷着跑回家,常常把脚再裹上,当时女人不裹脚是让人耻笑的,而且会嫁不出去。那是父亲在当时对封建社会的最早冲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专门接见了父亲。

父亲很喜欢我,记得六岁那年,就让我跟着两个姑姑上了定州城里女子师范学校附属的幼儿园。五四运动后的很长时间父亲辗转在北方各地教书,那时他和邓中夏、何孟雄一起投入了一系列的爱国运动和革命工作,因而遭到北洋军阀头目曹锟的通缉,被迫避往北京大学,受到李大钊的掩护,并结识杜斌丞,与李子洲、魏野畴先后往陕北榆林,刘志丹是他在榆林中学所教的学生,刘澜涛谈到父亲说:“尤其令我追念的是,王森然同志也是对我的思想进步起了启蒙作用的师表,其实他的影响远远地超出了陕北的范围。”父亲后来到山东一师任教,教国文专修科国语教学法课程,山东第一师范也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李广田、邓广铭、臧克家都是当时的进步学生。父亲在该校任教期间,宣传进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支持学生“五卅罢课”,大大壮大并发展了这所学校的进步力量。因为革命浪潮猛烈冲击着军阀统治,反动政府把父亲视为“祸根”,因此又遭到张宗昌的通缉,便由蔡和森介绍,与蒋听

松到绥远,仍为军阀蒋鸿煜捉拿,最后被迫来到北京。

父亲任教于文化大学和四存中学的同时,又在北京大学听课,父亲与鲁迅的交往就始于这个时期。我家就在离北大不远的骑河楼公寓居住,后又搬到附近胡同里一个叫做慧兴寺的尼姑庵内,是个很安静的院子。那时我在张雪门主持的孔德学校上小学,一直受到奶奶的照顾,还是很少能见到父亲,早晨我起床他走了;晚上我上床,他还没到家;他白天忙着上课,夜里不停地写文章。回想起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年月里,我家来往的人很多,至今印象仍很深的有胡也频、蒋冰之(丁玲)、于赓虞、焦菊隐、许超远、沈从文等等,他们经常在深夜里,谈论国家大事和文学艺术,常常争论不休。那个时期让我记忆最深的是差不多每天吃完晚饭,父亲都还没有回来,胡也频叔叔和蒋姑姑就带我到骑河楼东口的北河沿散步,等着父亲,蒋姑姑特别喜欢我,总是紧紧地搂着我,一路上他们谈论着我听不太懂的事情。这样的温情每想起如今仍历历在目,永远难忘。尽管在以后几十年的时光中,包括父亲的晚年,都只忆及胡也频,很少提起丁玲。

把生命放在极限上的父亲

1926年,张季鸾、吴鼎昌、胡政之接办了天津《大公报》,父亲在北京师范教课期间,受聘为《大公报·艺术周刊》的主编,父亲在为创刊号撰《本刊缘起与宗旨》中写道:“本刊最要紧的宗旨,是从根本上去整理,切切实实地下一番功夫去研究,把高尚的、优美的提倡起来,使一般人确

实知道真善美的意义与价值；一方面把卑劣的、丑恶的消弭下去，不使他们遗毒社会，堕落人心，引导公众的眼光到高尚的道路上去。”在同一个时期，父亲还创办了《摸索》杂志，不久又为《世界日报》主办《骆驼》文艺副刊。通过这些文学和艺术的园地，他不仅仅宣传革命文艺思想，也发现培养了不少爱国青年和文学艺术人才，如最早开创以毛笔写生描写劳动人民生活为内容而擅长画农民和驴的赵望云。当时，赵随舅父学徒，生活很苦，父亲让他在我家居住，边指导他用国画写意方法描写农村穷苦人民的现实生活，边给他阅读进步书刊，并在《大公报·艺术周刊》上陆续介绍他的作品，还特意给他写了《群众画家赵望云》等具有品评和指导意义的文章，这样，再加上他自己的刻苦努力而慢慢有了成就和名气。此时我家在北师附近端王府夹道居住，后又一度搬到护国寺对面的宝禅寺，直到1930至1931年间才买了前车胡同北下洼子的房子而安定下来。

当今讨论李苦禅的艺术定位时，美术理论家李松认为，“李苦禅当时处于一种文化艺术圈内：蔡元培、齐白石、徐悲鸿、林风眠，还有王森然、潘天寿、赵望云——他们是在直接影响这一时期中国画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人，苦禅先生就属于这个圈中的一位艺术家。”就在那个时期，李苦禅因常来我家，很快与赵成了朋友。那时父亲曾在《艺术周刊》主办他俩的专页画刊，介绍宣传他俩的绘画艺术，后来父亲又专写了《画家李苦禅》等系列评论。因此，李的成就也不可排除父亲心血的浇灌。

1928年7月7日的《大公报·艺术周刊》，有父亲以我的名字留下的这样一段文字：

新文化运动

之后，谁都承认吧！在枯脊的中国荒原里，播上完好的种子，而渐能结起繁茂的枝叶的，当然是绘画与文学了。我们应当一齐呐喊，高唱绘画革命以援助他们不？到过去年中西画展览场的，李君苦禅名字之外，还记得一位赵望云吗？他并不灰心，依然勇往直前地走，同李苦禅、侯子步连结起来，从事于新的中国画的创作。所谓新的中国画，即是把中西艺术的真精神融合一起，新中国画才将出枝叶，要想它开灿烂之花、园美之实，则全在望云与苦禅几位新艺术家之刻苦努力。好在他们都在壮盛之年，都有同样改革国画的抱负，只要不畏威武的气焰，奋勇直前，什么能作他们的梗阻？绘画革命！新的中国画连连出现！我们有厚望于望云与苦禅！

1927年的夏天，蔡元培在与父亲的通信中，建议父亲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这样，1928年父亲以《明堂制度考》为论文，考取了京师大学国文研究馆史学组研究生。1929年，京师大学恢复北京大学校名时，蔡元培曾再被任命为校长，虽然他此后并未北上到任。

就在那个较长的日子里，父亲已经担任着河北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蒙藏学院多所高等学校的教授，经常忙于各种关于文学革命和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的讲座，由于他当时的社会影响，又应邀相继为京华美专、王悦之创办的



重重劫难之后幸存的王森然在北京家中与家人合影（摄于1960年，后排正中为王森然，后排右3为本文作者）

美术学院讲授艺术概论等理论课程,继而创办了华北大学艺术专修科,并任主任。

那个时期我的家更热闹了,除了赵、李两位常住客,至今能记起的还有王悦之、王雪涛、王青芳、胡佩衡、邱石冥、侯子步、萧松人等常来常往,这些人来了,不是铺纸泼墨即兴创作,就是临时抓个话题,变成了时事论坛。我一生不忘的是,这些叔叔伯伯们来了之后,不是个个聚精会神的作画而鸦雀无声,像没有一个人似的;就是交相高谈阔论,一片喊声、笑声,像要冲破屋顶一般。特别是苦禅叔那次用奶奶絮被子的棉花即兴泼墨,在窗户纸上先画了几个大荷叶,然后用毛笔画上荷花和一只小鸟,真是惟妙惟肖,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此外,无法忘怀的是,父亲除很早把奶奶和我接了出来,又陆续把我的四个姑姑送大学读书,再后又将早去世的两个叔父的四个孩子和我的妹妹也接来上学,这是多大的负担啊!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父亲一人教书、写文章来养活,真是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华北大学艺术系的创办,正值“九一八事变”发生,父亲接受了大批的东北流亡学生,把父亲称为“恩师”的鲁迅美术学院院长张启仁,当时就是流亡到北平的东北穷学生,他自己回忆往事的时候说,他不但从父亲那里接受了进步思想,而且更是父亲出钱把他送到延安抗大去的。后来在文革前办学非常困难的一段很长的极左日子里,张启仁从鲁迅美术学院调来中央美院主持工作,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决策,给予了很多对正义的支持。

回忆起一个世纪中非常有限的可利用时光里,父亲都把生命放在极限上,父亲的一生是多么辛苦的一生,又是多么让人敬佩的一生!分别了已经二十年的父亲,让我深刻懂得了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宝贵。今天,父亲为之奋斗终生的祖国繁荣富强了,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安慰和幸福的,更会忘却那些痛苦和折磨的;他给我们留下的不仅是永久的怀念,更有他对祖国、对他终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的无限忠诚与奉献。

心底的伊甸园

我家在北京居住了近四十年的房子,是父亲

用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国文教学概要》、《世界妇女运动大系》和《印度革命与甘地》几本书的稿费和蔡元培先生的资助购买的,坐落在西四北平安里北下洼子二号。

院门是两扇棕红大门,走进门洞右手一间为门房,隔着门洞连接着与之一体的两间西房,门上面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琴室”,那是我小时居住过的,连同南面厨房,构成一个小长方院子,我们称之为前院,前院一片竹林,走进竹林半遮的月亮门,北屋正房的山墙下,有父亲种植的无数悬垂着的圆圆的栝楼,每天与家人微笑着,迎接着来往的客人;绕进去是个大四合院,北房五间、西房两间、东房两间,院子的东南角有南房小三间,穿过南房又有个小后院,在小后院中看这南房反而成了北房,正门和窗子都是向南的,小院中有满墙攀援的山药豆,东西对称有两个小杂物间,出小院便是东屋背后、院落最深处的冗长夹道,经过这条夹道又可通回大四合院。

院内最主要的五间北房是父亲的书房,围着墙满满的都是书架,中间还有横着的好几行,书架的格局是和图书馆一样的摆法。当时进步书刊、中外名著很多,我很小就读了冰心的《繁星》、爱罗先珂和安徒生的童话、鲁迅的《呐喊》、《彷徨》以及易卜生的《娜拉》、都德的《最后一课》、高尔基的《母亲》和泰戈尔的诗。东屋则存满了从创刊号就开始的《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月刊》和《大公报》的逐月合订本等等。这些书刊,一直影响着我的成长,我是多么热爱这个充满精神食粮的大粮仓。

日本鬼子来了,我家不得不把进步书刊统统埋在家中各处地下,表面上只剩下古线装书和古画。虽然躲避过日本侵华的灾难,却没有躲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不但将满屋的古画古书全部抄走,还有一些极有价值的照片也荡然无存了。

我家所存仅齐白石送给父亲的带款作品90余帧,白石老人题父亲作品75帧,赵望云、李苦禅、王雪涛等人他们自己所没有的千余幅佳作——多是他们在我家十几年中即兴之作,父亲几十年收藏的唐宋以来的艺术珍品,直至扬州八怪、八大山人和吴昌硕、陈师曾的珍贵卷轴、册页,更有宋版《南华经》、明版《群芳谱》、古本《三坟》,数以万计的文物和图书,都是国宝啊,

对考古界非常重要的三叶贝化石、龟板甲骨断片也全都抄走了！当时，仅被捣毁的父亲的几百块名贵石章的残块和被砸碎的数百张百代公司唱片的断片，撒落在三条胡同里，成为不堪回首的一片狼藉。那时父亲心中的痛楚和失落是可想而知的。

父亲屋内堆满的书籍、资料和工艺、美术品，均因地制宜地布置得充满诗情画意，他亲手栽培的花草也盆盆透露着主人热爱生命的博大胸怀，屋内的一切，均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美、一种崇高的情趣、一种炽热的追求，这一切，深深印在我心里，让我终生牢记，难以忘怀。

文革遭难后的父亲曾诗记“老眼昏花懒读书，闲来摹画板桥竹；我也有家深竹里，未识明公记得不？”指的就是我幼时居住过的“琴室”门前的那片竹林。如今我虽然已经87岁，但每想起父亲那迷人的书房和他亲手种植的伴我成长的庭院林木，依然是我一生中最甜美的心底的伊甸园。

一张明信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了，当时在北平国立艺专读书的我还差一年毕业，艺专为续办下去，一次次通知同学去报到，我坚决不去，随时准备离开北平去参加抗日工作。当时和一个小时候很要好的朋友赵晓镜经常偷偷联系，准备好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箱子，等待时机和她一同出去。父亲此时在天津女师教书，每次回家给我留有作业，读的书要有读书笔记，每天要书写魏碑《龙门二十品》一篇。此时我家的进步书刊大部埋在院里，怕日本鬼子搜查。我非常喜欢我的读书笔记，因为父亲在每一页上都留有用红毛笔写下的批语和挂满行间的红圈圈，几十年来，我一直留到文化大革命才被焚毁，我是多么的惋惜和怅然啊！

如今我尚记忆的批语有：

今日能做的事决不要推至明日。

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要麻烦别人。

要气度高雅，但是不能骄傲自负。

要坚定，但是不能固执己见。

要坚决果断，但不能顽固不化。

山因风雨而朗润，梅因霜雪而傲然，荷因淤

泥而高洁，人因遗憾而多彩。

你能赠送给别人的最有价值的礼物是一个良好的榜样。

“知人者，知也。自知者明也。”

“胜人者有力也，自强者，强也，知足者，富也。”

我能记得和影响我成长的语句也仅这一点了。“逝者如斯夫”，时间是无情的，它冲走了多少人间美好的东西啊！

有一次，父亲临去天津，将一个仅有的存折给了我，支持我离开北平，任我去找自己选择的出路，存折共70元，这在当时是多么的不容易，这是父亲的多少心血呀！

不久，我又接到在艺专与我最要好的同学张瑞芳的信，她也离开北平了。

接到瑞芳的信，我的热血沸腾了，恨不能和她一起同行。因此，更坚定了我走的信念和决心，心想或去南迁湖南沅陵的艺专，或想办法参加抗日工作，总之，一定要离开北平。

1938年我与赵晓镜和她的一个亲戚一同离开北平，到天津乘船去上海，又辗转艰难地到了武汉，此时，武汉已告吃紧，便在湖北的老河口参加了战地服务团。

离开天津前，到天津女师去向父亲告别，亲情难舍……嘱咐路上一定要小心，临行交给我一张明信片，我含着泪匆匆地去上船了。

明信片上密密麻麻写着：

芹，

你初次出门，要处处小心。

如果你不能成为山顶上的高松，那就去当棵山谷里的小树吧，但一定要当棵溪边最好的小树。

如果你不能成为一棵大树，那就当一丛小灌木，如果你不能成为一丛小灌木，那就当一片小草地。

如果你不能成为大道，那就当一条小路，如果你不能成为太阳，就当一颗小星吧！决定你的不是你尺寸的大小，而在立志做一个最好的你！

奶奶想你！我记挂你！

这张明信片一直陪伴我走过茫茫的人生，但就这点足以成为我灵魂深处的无尽的资源，也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夺去了！

眼中的话语

让我永远难忘、常常心酸和内疚的一件往事，“文化大革命”中父亲的家先后被“抄”八次，北房5间满满的书画荡然无存，后来父亲在诗中自述“四壁萧然，满目皆空”，不久大四合院的住房被强行占用，父亲被赶到隔院那家一间十几平米的破屋居住，接踵而来的是在美术学院的关押，解除关押之后，便是在居住地强制劳动，任何人均不准和他来往，每月只给七元钱的生活费，生计陷于绝境。当时父亲的住处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每当我从和平里家中坐13路公共汽车到北京四中上班的厂桥车站时，经常看见父亲拄着拐杖，穿着一身旧蓝制服站在车站的路口深情地望着我。因地处我任教的四中和父亲的居住点多有相识之人，不敢招呼更不敢说话。多次，我故意走过去又走过来，让彼此多看上几眼，他有时也装不相识地走过去；我虽有时特意擦肩而过，将一张10元钞票塞到他手里，但仍不敢说一句话，连一声“爹”也不敢叫。历史的河流啊！长流不息，流的是我深沉的思念和无尽的哀伤！

我永远难忘这无数次刹那间的深深的亲情……

也永远难忘父亲当时的身影和他眼中的话语……永远难忘……永远难忘……

我父亲出生于《马关条约》签订的1895年8月18日，逝世于1984年的清明日，今年清明节是父亲逝世20周年纪念日。20年前的5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父亲的逝世纪念会上，习仲勋说：“王森然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革命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在新文化传播、教育学、文学、史学、哲学、美学、语言文字学、社会学、文学教育、史学教育、艺术教育、美术理论研究和国画创作诸方面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业绩，不仅表现在文字上、言论上，更重要的是传播在青年中的进步影响和革命意识。他不仅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理论家，而且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实践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遭到了惨重的迫害，但他对党、对人民、对革命的由衷之情没有丝毫的改变。”王任重说：“王森然教授是我国

最早接受民主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积极地投身‘五四’、‘五卅’等我国现代史上的历次重大革命运动，为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王森然教授的逝世是这位巨人生命的终结，但他的名字将千古流传。”

父亲临终，将他贫苦一生的全部积蓄捐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除给他奔波付出过而至今仍贫困的陕北、河北老区办学以外，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捐助了奖学金基金，90岁病中的父亲在遗言中写到：

中国学术处于大改革之前夜，东方固有文化已渐不为青年所重，西风东来，利多害少，以长避短，唯在主体之强。汉有丝绸之路，唐有佛教文化，皆为我民族文化所囿，而不受制于外族，蒙古女贞文化薄弱，入主中原，反为汉文化同化，史鉴殷殷，不可不知也。余寄望于来者，总结中华文化之精华，随时代之发展与社会之变革，从而创造继承传统不断更新之现代中国文明，立于世界前列而无愧，前景灿然，为之雀跃哉。

文化范围至广，人生有限，皓首穷一艺，非天才勤奋兼美者无所成。美术青年之多空前，美术史、论至关重要，治此学者极少，惊人著作尚称罕见，有愧于数千文明。昔年有志于此，颠顿荒忽，岁月蹉跎，悔之晚矣，“文革”十载，水深火热，个人损失，沧海一粟，殊不足道。余行年九十，朝不虑夕，清苦半生，奔波一世，学无所成，至庸至愚。森然一身一家，皆吾土吾民所哺育，祖国不强，个人绝无出路矣！愿以余之部分稿费及生活节蓄，作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奖学金，每年奖励学生史论著述一二篇，积积以年，必有英才脱颖而出。治学与得奖本系风马牛，著作乃对社会负责，而非为微利也。森然之所以愿尽蚁力者，为大时代推波助澜而已。

近百年来美术家寥阒，身后或荣或枯，后人考证，史料奇少，下笔艰难。确有掌故，继往开来，翔实而有卓识之作，当优先授奖。以上管见，未必有当，明者晒而教之，感德无涯。

1987年8月19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第241号文件，中央美术学院正式将父亲的捐赠设为“王森然美术史奖学金”。

（2004年4月4日完稿于北京西苑坡上村三不易书屋）（责任编辑 赵友慈）

新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会议

● 张彦

如今，大大小小的国际会议一个接着一个在中国召开，已是家常便饭，司空见惯了。但是，设想一下，50年以前，在建国初期那百废待兴的艰苦日子里，要举行一个有几十个国家的几百位代表参加的盛大国际会议，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作为当年会议新闻处的一名工作人员的我，1952年10月2日至13日在北京举行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至今仍历历在目，许多感人的场面难以忘怀。

当时，刚刚从战火中诞生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要在废墟上重建家园，还被迫卷入了朝鲜战争以保家卫国。何况，美国不仅对新中国实行经济封锁，而且派遣第七舰队驶入台湾海峡，对我统一大业造成极大障碍。与此同时，在越南、寮国（现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地，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遭到殖民主义的镇压和外国的武装干涉，局部战争也在扩大。这一切使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所以，新中国在建国的第二天，1949年10月2日，就成立了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积极地投入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保卫世界和平的运动。1951年2月，世界和平理事会在柏林开会时提出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人民和平会议的建议。同年10月，印度建议这个会议在北京举行，获得一致的赞同。这对于当时正处于如此困境的中国，具有何等重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52年3月21日，宋庆龄、郭沫若、彭真、陈叔通、李四光、马寅初、张奚若、刘宁一、蔡畅、茅盾、廖承志等11位代表各界的知名人士，联名发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发起书》，希望本地区和平人士聚集一堂共商大计。果然，各国纷纷热烈响应，并相继进行自身的筹备工作，随后商定同年6月在北京举行筹备会议。中国的筹委会也随之成立，担任筹委会主席的北京市市长彭真，从第一天起就一针见血地指出：

我们必须认识到，出席这个会议的代表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他们有不同的政治见解，还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因此，要使会议成功，关键在于自始至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

作为东道国的中国，自然要身肩特殊的重任：准备合适会场，安排代表的食宿，保证会议的物资供应，调集各种语言的翻译人员和工作人员分批进行培训，并与各国筹委会密切联系。当时这一系列的工作难度之大，今天的人们也许难以想象。但是，北京人民为克服困难所表现出的革命热情，也是难以想象的。由于当时在全北京还找不出一个能举行这样大型国际会议的会场，中央决定将中南海的怀仁堂改建成为一座足够900人开会的大礼堂，并且安装中、英、俄、西四种语言的同声传译设备。北京的工人和工程师们二话没说就肩负起了这一沉重担子，并且在规定的时间内漂亮地完成了任务。当时长安街上的老北京饭店是全市最大最好的饭店，但是远不能解决全部外宾的住宿问题。于是，市政府7月做出决定，将北京金鱼胡同正在为接待工商界来京人士兴建了一半的楼房立即着手改建成为一座能够接待外宾的高层大楼，并且限期保质完成。由于从中央到地方的全方位的支持，经过来自各方面的工人、专家和技术人员日以继夜的共同努力，终于出现了奇迹：一座九层豪华的“和平宾馆”，在两个月之内拔地而起。一时间，这成了北京城有口皆碑的一段佳话。

亚太和会的筹备会议于6月3日至6日在老北京饭店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亚洲、澳洲、北美洲和拉丁美洲20个国家的47名代表，互相交流了本国的和平运动与积极支持召开亚太和会的各种工作。由于意见分歧，在文件起草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争论。例如，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代表就不赞成把民族独立与争取和平运动连接在一起。于是，在会内会外，中国代表团的

彭真、刘宁一、廖承志分别与这些代表展开协商,以摆事实、讲道理的方式做耐心说服工作,让他们看到民族独立的斗争与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是紧密不可分的。经过协商以后虽然基本上取得一致,但仍有个别代表反对在文件中称美国为“侵略者”。中国方面接受了这个意见,删去了美国的字样,但谁都不难看出,在当时的形势下是谁在阻碍和平。经过四天的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全体一致通过了筹备会议《宣言》,将大会的筹备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民主协商精神,在筹备会议期间就已初步显示了它的威力。

1952年10月2日,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终于在崭新的怀仁堂隆重地开幕了。一进门,是一个巨幅的屏风,上面写着中英俄西四种文字的“和平万岁”。主席台上悬挂着毕加索的“和平鸽”巨画,两旁竖立着参加会议的37个国家的国旗。出席会议的有353名代表、38名列席代表和23名特邀代表和来宾共414人。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和社会阶层,持有不同的政治见解和宗教信仰。有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作家、教授、医生、律师、商人、宗教界人士和社会活动家。这些代表,大多数来自尚未与我国建交的国家。由于受到当时存在的恶意宣传的影响,不少人对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心存疑虑。因此,面对这样复杂的情况,要团结一大批初次相识又互不了解的新朋友到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中来,在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与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其艰巨可想而知。

出席亚太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共40人,阵容之强大,只要看看这些各方面重量级人物的名字就一目了然了。团长是宋庆龄,副团长是郭沫若和彭真,成员包括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少数民族的代表,以及学术界、工商界的知名人士和宗教界领袖人物。名单上除了上述11名发起人外,还有李德全、罗隆基、包尔汉、吴耀宗、吴蕴初、萧三、冀朝鼎、陈翰笙、蔡楚生、钱三强、金仲华、老舍、钱端升、梅兰芳、华罗庚、许广平、曹禺、赵忠尧、刘良模、王芸生、周培源、赵朴初等;特邀来宾3人是:著名的民主人士章伯钧、抗日名将蔡廷锴以及代表中国参加审判二次大战战犯的律师梅汝璈。

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彭真在会议开始以前就向全体团员坦率地表明了他对开好这次会议的一个总的看法:秉承毛主席和周总理指示的精神,我们

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际友人,唱的调子要不高不低,要发挥各人自身的优势,言行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兵对兵,将对将,广交朋友。方法上要始终贯彻民主协商的精神,以扩大和平团结的国际统一战线。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各国朋友所关心的,一些来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会因此受到鼓舞。我们要在会外多做工作,还要发动其他国家的代表做工作,让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会议的主人。要让他们了解和亲眼观察中国,好的坏的都要让他们看,这样才能突破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封锁、造谣和污蔑。这一席肺腑之言,显然对会议的成功起了很大作用。

会议的第一天,宋庆龄用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致开幕词:《动员起来,为亚洲、太平洋区域与全世界的和平而斗争》。听得出来,她当时的感情非常激动。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她一开始就把这次会议同1933年她在上海参加的保卫和平国际会议加以对比。她说:“那时候,日本已经强占了中国的东北,而且准备用它作为基地向我们全面进攻,然后向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发动进攻……这次会议比起前次会议,有着何等的不同!”她接着对大家说:“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聚集一堂,这件事本身就标志着人类历史中的和平事业的重大发展。对于居住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或更远的地方的广大而不同地区的人民群众,这是有着辉煌的意义。中国的榜样,使他们更坚定地掌握了一个基本真理:民族独立与和平是从同一个斗争中产生出来的。”

彭真代表北京和全国人民向大会致贺词时,除了阐明中国人民对和平的热切愿望和对本次会议将要讨论的几个问题的看法以外,还特别欢迎远道而来的代表们趁此机会参观北京和中国各地,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他说:“新中国成立仅仅三年,旧中国遗留下来许多落后东西,不可能完全消除,但诸位可以看到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和希望,生气勃勃地进行祖国的建设。他们不允许任何人来侵略自己的祖国,也绝不会去侵略别人。”

做大会总报告的是郭沫若,题目是《团结一心,保卫和平》。他要求大会讨论五个议题:一、全面解决日本问题,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二、采取步骤,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终止朝鲜等地的战争;三、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四、保障所有国家的民族独立;五、禁止战争叫嚣和种种仇恨的宣传,取消一切对和平运动的压制。

接着致辞的都是各方面的有代表性的人物,例如澳大利亚的牧师梅纳德、英国工党的伯恩斯、印度国大党的克其鲁等人。

会议头两天各国代表的发言,大方向是一致的,一般都能充分地各抒己见,包括不尽相同的看法。但是,苏联代表却以“老大哥”的口吻在会外对我们表示不满,认为第一天的发言安排不当,责问为什么让英国代表伯恩斯任意宣传工党主



中国代表团在亚太和会上,右起:郭沫若、宋庆龄、彭真、马寅初

张。受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的代表,也认为郭沫若的报告中过分强调民族解放运动的作用。苏联代表还建议,今后要防止在大会上自发的发言,一切发言必须由我们事先审查,不妥当的就不能在大会上讲。他们还认为,由中国任大会秘书长,印度、日本任副秘书长就够了,不必再增加其他国家的6个人。总之,权力一定要集中,不宜分散。这些意见与我们广泛地团结国际友人、力求避免包办操纵的原则是不相容的,但又不宜于与苏联发生公开矛盾。于是,就由熟悉苏联的萧三同志耐心地向他们做说服工作,让他们认识到这是民间的国际和平会议,甚至要准备会上可能出现骂中国、苏联的场面,我们也只能沉住气听,否则反而对我不利。事实证明,对于不同意见,中国代表团实行坚持原则与耐心说服相结合的方针,是行之有效的。

按照日程,在随后几天的大会上,由八个国家的代表分别作了关于日本问题、朝鲜问题、文化交流、经济交流、民族独立、缔结五大国和平公约、妇女儿童福利等报告,引发了许多代表争先恐后地上去踊跃发言,介绍本国的斗争情况,发表自己的看法。此外,特邀代表、担任国际民主法律协会细菌战调查团团长的布兰德魏纳教授,在发言中揭露了他亲自调查证实的美军对朝鲜及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在各小组会讨论文件起草的过程中,为了使各方面意见都能吸收进来,八个小组共开了59次会,有

120多人发言。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几个大问题:对和平的威胁来自何方,如何分清正义和非正义战争,和平与民族独立的关系等根本性问题。通过民主讨论和充分协商,终于使各方面的意见达成一致或接近,最后通过了十一个决议文件和一个《告世界人民书》。

为了开好这个会议,中国所有相关部门包括外交部、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外文出版社以及新华社、国际广播电台、报刊等媒体,无不全力以赴予以支持。我所在的外文出版社是当时最大的对外宣传机构,因此就成了为大会提供各种语言文字翻译和出版中英文每日公报的基地。曾经在联合国担任多年同声传译工作的唐笙,是外文出版社提供的“头号种子”。她不仅挑起了大会翻译的重任,还开了我国同声传译的先河,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学生。我和几个同志当时是在新华社社长、大会新闻处长吴冷西的领导下负责每天出版大会中英文《公报》。为了保证每天一大早将《公报》送到每一个代表手中,我们日夜奔走于会场、编辑部、外文印刷厂之间,直至深夜。连我们的外国专家陈依范也同甘共苦日夜不分地干,外文出版社的领导刘尊棋则坐镇社里为文件的翻译质量把关。为了翻译多种语言,我们当时十分缺人,甚至不得不从英国特别请来能从英语译为其他语言的专家。

大会结束后,中国还邀请了各国代表分三路乘专列去全国各地参观访问,以增进他们对新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从代表们回去以后的反应来看,让他们眼见

为实,实事求是,的确起了很好的作用。虽然,他们当中有的由于说了中国的好话而受到本国当局的指责。像美国代表威廉·鲍惠尔甚至由于在中国揭露了美国细菌战罪行而遭到政府起诉,因而长期受到政治迫害,直到30年后才获得平反。但是,这些人回去以后都成了促进与中国友好的积极分子,活跃在本国和国际和平运动中。这些事实都证明,亚太和会发挥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总而言之,无论从当时、还是从50年后的今天来加以评价,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都应该说是国际关系史上一座耀眼的里程碑。它之所以能开得如此圆满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代表团忠实执行了中央求同存异的英明方针,实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目标,形成了一条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为我国后来的各种国际会议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责任编辑 李晨)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历史转折的前奏	程中原 夏杏珍	38.00	6.00
苏共亡党十年祭	黄苇町	22.00	5.00
人民公社兴亡录	宋海庆	36.00	6.00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	邓 野	29.80	5.00
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	吴 思	23.80	5.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5.00
斯大林(上中下册)	德安沃尔科戈诺夫	78.00	8.00
动荡岁月秘闻	温乐群等	72.00	9.00
扛起地狱的闸门	丁 群	21.00	5.00
张闻天年谱	张培森	65.00	8.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8.00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	徐庆全	24.00	5.00
再生中国——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	李 艳 熊志勇	44.80	7.00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	范 硕	36.00	6.00
断桅扬帆——蒙冤25年的公安局长	丁兆甲	26.00	5.00
特别审判——林彪、江青			
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	图 们 肖思科	28.00	5.00
改革风云中的万里	张广友	20.00	5.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5.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5.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5.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5.00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	凌志军	25.00	5.00
25年——1978—2002中国大陆			
四分之一世纪巨变的民间观察	王 安	26.80	5.00
我向百姓说实话	李昌平	20.00	5.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5.00
影剧之王田汉——			
爱国唯美的浪漫人生	张耀杰	25.00	5.00
戏剧大师曹禺——			
呕心沥血的悲喜人生	张耀杰	20.00	5.00
白色花劫——“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大纪实	林 希	25.00	5.00
才子邓拓——一位蒙冤者的血泪人生	张 帆	25.00	5.00
中国人物年鉴	中国中外名人文化研究会	158.00	7.00
蒋介石评说古今人物	戎向东	29.80	5.00
十年来影响中国经济决策的论点	张国华	28.00	5.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历史转折的前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1975年是极不寻常的一年。作为从大乱走向大治的努力,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尝试。作为历史转折的前奏,作为邓小平理论的孕育,1975年整顿的历史,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

作者以严谨科学的态度和富有激情的文笔叙述这段惊心动魄的历史,有许多史料是首次披露,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史料价值和艺术感染力。

《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1944年~1946年间,国共两党关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的争论,是两种对立的国家政体的争论,是争取一个怎么样的抗战结果的争论,因而也是国共两党政治对立全部历史关系的最高表现形态。本书对这一长达两年的政争的发生、发展和终结,进行了全程的跟踪考察,集中论述了国共两党是如何由政争走向战争的。

《文坛拨乱反正实录》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代初期,拨乱反正的决策揭开了回春的历程。被称为“政治的晴雨表”的文学艺术界,其从复苏趋向繁荣的历程,不仅与当时的政治气候相伴随,并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作者披露了意识形态领域重大事件的内幕,及新时期文坛从队伍建设到方针调整等诸方面的来龙去脉。作者致力于收藏未曾刊布的文坛名家书札和档案材料,及对诸多文坛老前辈的采访,因而使本书材料鲜为人知、丰富可信。

《扛起地狱的闸门》第二条战线的英豪们,他们与第一条战线上人民解放军英雄一起,怀着对真理、对理想、对光明未来的真诚追求,以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谱写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壮丽诗篇,他们托起地狱的闸门、帮助万千受难者逃出地狱,而他们的许多人却为此牺牲了宝贵的生命。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

张开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西部地区新疆罗布泊上空。中国第一次将原子核裂变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升上了戈壁荒漠,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中国人终于迈进了原子核时代。

30多年前的那天,激动和喜悦的心情,传遍了整个祖国大地,巨龙腾飞,震动了整个国际朝野。但是,原子弹的爆炸成功,谈何容易。除了要突破科技领域中的无数难关,真正掌握确保原子弹起爆成功的奥秘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情况,那就是国家当时正处于经济最困难时期,可以说中国人勒紧了裤带,把原子弹研制出来,那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科学务实、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会永放光芒。我要向世人说的有许多许多,现在只能将其中鲜为人知的部分重要内容作一回顾。

一、毛泽东对制造原子弹的决策是这样形成的

1945年8月13日,美国人在广岛投下了原子弹。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说:“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只是空的。”

1946年8月6日,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延安枣园树下采访了毛泽东,毛泽东说出了流传于世的一句话:“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

1951年下半年,法国科学院院长、世界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居里夫人的女婿,法国共产党员)让人传话,“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对原子弹在战略上蔑视,而在战术上逐渐重视起来。

1954年,毛泽东对来访的赫鲁晓夫提出,能否在制造核武器方面给中国以援助。

1956年,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8年,毛泽东正式表态:“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

中国的核工业正式上马了。原子弹正式开始确定研制了。

二、赫鲁晓夫翻脸不认账,却给中国制造原子弹燃起了自力更生之火

1957年,中国与苏联经过多次谈判协商,10月份,两国正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该协定明文规定,为援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并派专家来中国帮助研制。

核武器研究院的科技人员,听到这一消息,都甚为兴奋。为了配合这一援助计划,科技人员每天突击学习俄文,办公室、走廊上、宿舍、食

堂一片俄语声。我当时是研究院的自动组件研究室负责人,后为院学术秘书兼团委书记,我们年轻人在一起谈话的内容,离不了希望早日得到苏联的原子弹样品和图纸资料,早日上马,早日出成果,早日作出自己的贡献。

但是,就在我们每天等着、盘算着的时候,情况发展却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1959年初来了一位苏联专家,但是他对原子弹的技术问题只字不提,怎么问他都不说,就是重复一句话“你们都去工厂实习”。他口袋里装了一本资料,上班拿出来看看,下班装着就走,从不让中国人接触。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哑巴和尚”。

1960年7月16日,赫鲁晓夫完全翻脸不认账了,决定撤走在华全部专家。8月23日,在核工业部系统工作的200多名苏联专家全部撤回国内,并把重要的图纸资料全部带走,原来应该供应的设备也不供应了。

中央果断决定,自力更生,自己动手搞出原子弹。核武器研究院很快组成三大部——理论部、试验部、总体部,排列出原子弹的各项技术关,分工到各研究小组,分配到每个人,全面开始攻关;在长城外面很快建立了小型爆炸物理试验场,迅速开展了试验工作;在青海草原建立大型爆炸物理试验场和特种炸药浇注车间,以及其他相应配套的自动控制、机械加工等场地,各项理论研究和实际试验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攻关如此有成就,进展如此之快,出乎国内、国际上的预料,包括研制人员本身在内。五年之后,原子弹爆炸获得完全的成功,十分巧合,卡中国人脖子的赫鲁晓夫也在同时被他的同伴发动宫廷政变赶下了台。

赫鲁晓夫低估了中国人的志气,更低估了从事核工业的科技人员,他们在中国是一流的,在国际上也是一流的。

三、原子弹的重大技术关——同步聚焦被成功突破了

美国人在1945年制造出三颗原子弹,其中两颗是“内爆”型,一颗是“枪法”型,在广岛投下的是“枪法”型,在长崎投下的是“内爆”型。据1960年7月17日《纽约时报》报道,“内爆”

型原子弹如果研制成功,就表明下一步有可能研制出氢弹,“内爆”型是一种有发展前途的原子弹。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采用了“内爆”型。所谓“内爆”型是将大量炸药起爆的能量压向内心,产生高温、高压,使内心里的核材料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核能。但是困难的问题在于炸药起爆后,能量并不是完全向内心压缩,而是向四周扩散,这就无法实现核裂变。

从60年代开始,国际太阳能技术的许多报道,曾多次提到同步聚焦这一问题,但是没有关于这一技术内容和实现手段的任何报道。

要解决这一重大技术关,应当是如何使炸药同步起爆,能量聚焦,科学家把这一技术问题叫做同步聚焦。

中国人的最大优点之一是发奋和勤劳。面对这一技术难题,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经过无数次的理论计算和试验,从北京长城脚下试验到青海湖金银滩,从小型到中型再到大型,从局部到整体,一步一步的试下去,最后实现了炸药起爆的能量完全压向内心,同步聚焦技术关成功突破了。

四、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研制出来了

1964年初,国务院国防工办在常务副主任赵尔陆上将的主持下,召开国防各工业部部长会议,核工业部部长刘杰在会上高兴地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核材料铀235已经研制出来了。”大家听了甚为兴奋,赵尔陆说:“好!那好!我们已经有了粮食,有了粮食,我们就可以做饭了。”这句话生动风趣地表达了这一成果的重要性。

核材料铀235是原子弹的核心材料,原子弹是用铀235原子裂变时产生的巨大能量而爆炸的,没有铀235,原子弹是无法制造出来的。

铀235研制过程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系统工程,从探矿、选矿、开采到最后的提取成功,有上百道工序,经过了许多家工厂。从南方的矿山开挖、选矿,由粗加工到细加工,再到精加工,一步一步的筛选,一步一步的提取,将半成品送到北方某工厂,再由北方某工厂加工后送到西部多家工厂,最后提取。整个工艺流程要经过大半个中

国,缺少一道工序也不成。每一道工序都有极严格的技术要求,工作量之大、工艺要求之细、技术要求之强,不是有真才实学的行家里手,是完不成的。

赵尔陆在得知铀 235 核材料研制出来后不久,决定前往西部某地亲自查看。他在核工业部部长刘杰的陪同下,第一次看到了宝贵的黑色铀 235,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粮食就是这块“黑金”。我当时有幸随同前去,荣幸地看到了这块世界上极稀少、极珍贵、极秘密,既可以为人类造福又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的“黑色金子”。

五、周恩来和中央专门委员会委员审看了原子弹怎样才会起爆的纪录影片

中央 15 人专门委员会是国家管理领导两弹事业的最高机构,由周恩来、贺龙、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刘杰等人组成,周恩来是主任。

随着原子弹研制工作的开展,中央专委委员和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特别关心进展情况,他们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原子弹究竟怎样才会起爆?研制工作进展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哪些成果?性格豪爽的陈毅外交部长,着急地跑到核武器研究院了解情况。他说:“有了原子弹就有了实力,做外交工作讲起话来就有了分量了,我支持你们。”当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也把专家叫去询问,原子弹搞得怎样了?他说出一句既表示要有决心,又很外行的话,“用柴火烧也要把原子弹烧响”。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同步聚焦技术取得初步成果后,拍摄了一部绝密电影,从聚集元件开始介绍,对各种部件、器件的研制,到炸药浇注,再进行各部件组装,从内心到外层,一层一层的展示,最后组装一个大球,引出了密密麻麻的电线,这个大球除了核材料铀 235 未装上,其他的几乎全部装上了,离原子弹的真正实体已近在咫尺。最后的镜头是这个大球起爆,虽然不是原子弹,但是爆炸的威力和蘑菇云也非同小可。

1964 年初,影片制成,没有配音(出于保密也不让配音),只同意在放映时,有人做口头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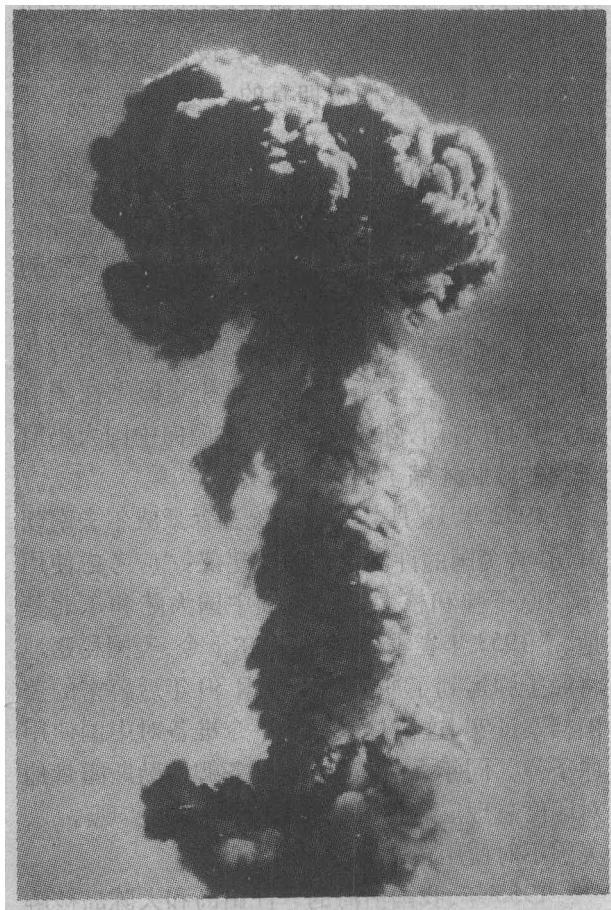
绍,并决定在一次中央专委开会前放映。我是这次放映的具体负责人和组织者。我们选了两位放映员,一位是国防科委的,一位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女同志,又从核武器研究院选了一位解说员,是位女技术人员。我们提前两小时就到了中南海西花厅会议室,在会议室后面的一间小屋子挂上了银幕,在我往柱子上钉钉子时,工作人员说,总理正在休息,让我轻一点。

下午 2 时,专门委员会准时开会,首先放映这部影片。中央专委委员们和有关领导,看了以后,兴奋得直点头,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他们都认为我们国家的原子弹有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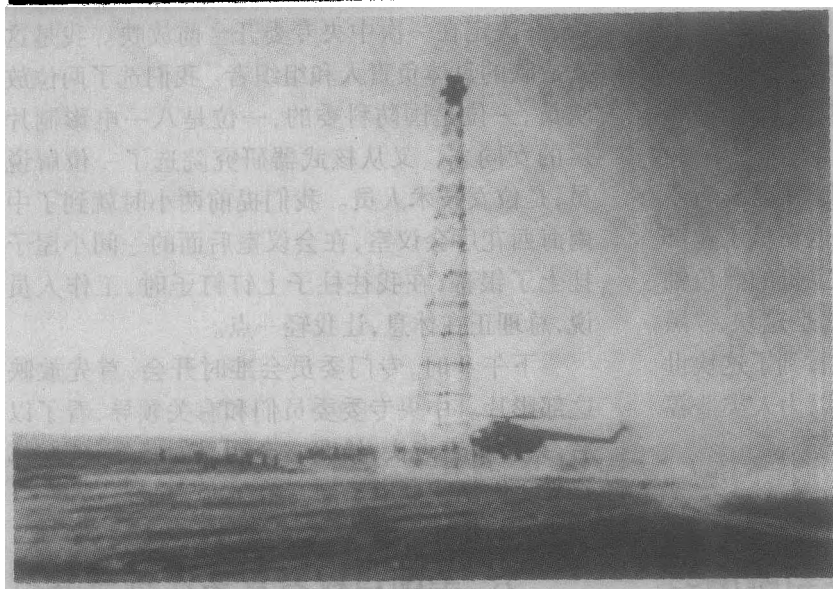
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要对中国扔原子弹

在过去的历史中,美国当权者曾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扔原子弹,这是有案可查的。

1950 年 10 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志



原子弹爆炸后的蘑菇云



中国第一次核试验时托举原子弹的钢塔

愿军发动猛烈的进攻，把敌人打得节节败退，溃逃了400多公里，麦克阿瑟紧急报告了美国总统杜鲁门。

杜鲁门这位曾经下令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的总统，产生了可怕而危险的念头，并很快公开了他的想法。他对新闻记者说：“要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武器，挽回朝鲜战局。”

随即，美联社播出重要新闻，“杜鲁门总统于11月30日表示，美国正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如果有必要采取这一措施的话”。

这条带有爆炸性的新闻震动全世界，引起西欧各国的恐慌，英国首相艾德礼立即飞往华盛顿，会见杜鲁门，陈述利害。杜鲁门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威胁才缩了回去。

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美国的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东北基地。”1953年春季，艾森豪威尔下令，美国秘密地将原子弹运到了冲绳岛。根据30年后解密的美档案证实，这位总统确实下令准备对中国使用原子弹。同年5月份，美国国务卿杜勒斯露骨地对印度总理尼赫鲁说：“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1955年，我国沿海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被解放，美国国会正式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

器。随即，美国军方研究出原子弹袭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

据美国现在解密的档案证实，1955年3月10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国务卿杜勒斯说过，“我们将不得不使用原子武器，只有它们才能有效地对付中国大陆的机场”。3月15日，杜勒斯对新闻界宣布“我们可能利用某些小型原子武器”。

美国当权者虽多次扬言并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却迟迟不敢按下核按钮。在很大程度上是当时中苏结盟，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对他们有很大的遏制作用。现在看来，中国决心研制核武器，在当时和今天是多么重要的意义啊。

七、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最后一道工序插雷管至关重要

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采用铁塔上爆炸的方式，即先把原子弹在地面组装好，不能插雷管，而后吊升到塔顶，进行固定、检查、测试，等工作完成后，最后才能插雷管。

这个铁塔是北京金属结构厂生产的。当年工厂只知道生产这个高度102米的庞大铁塔是个重要任务，而并不知道做何用途。我几乎每月都要去工厂一次，看看生产情况，质量如何，成了他们的常客。

这个高塔竖立在大戈壁上，成了罗布泊一幅独特的风景，除了它，四周几百里都是一色的沙漠，铁塔如同伫立在万里荒漠的一位巨人。

铁塔竖立在大戈壁，因为当地多风多沙，早晚温差甚大，技术人员在铁塔上工作非常困难，除了恶劣的自然条件外，就是铁塔的自然摆动。我上到铁塔后只呆了20多分钟，铁塔的摆动就使我头晕眼花，比乘船反应还大。

在如此困难的工作条件下，必须把数量甚多、危险甚大的雷管插好，多么困难、心理压力有多大就可想而知了。

当年的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今天的中国科

学院院士、著名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特别强调这一点,原子弹能否爆炸成功,就看最后插雷管的了。这是因为雷管是否能按规定要求插到正确的位置,直接影响到原子弹是否能同步起爆,否则原子弹爆炸试验就失败了。

当年曾爬到塔顶上插雷管的一位技术人员,后来在电视上讲了当年在铁塔上插雷管的感受。他以他的忠心和无畏精神,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将雷管插的完全到位,同步起爆获得了完全的成功,我们应该记住他。

八、毛泽东和周恩来在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报告后,都同样问道“是不是真的核爆炸”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现场总指挥是张爱萍(当时任副总参谋长),副总指挥是刘西尧(当时任核工业部副部长),他们根据中央的决定和命令,在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宣布原子弹试验的倒计时,零点定为1964年10月16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

1964年10月16日那天清晨,罗布泊的天气不太理想,云层较低,能见度不太好。但随后不久,试验场整个场区气象好转,为正式试验提供了较好的天气条件,是个好兆头。

北京时间下午2时59分40秒,历史性的时刻到了,主控制站技术人员按下决定历史的电钮,10秒钟后,自动控制系统进入自动控制状态,这时倒计时从10到零点顺序跳动。这10秒是扣动人们心弦的10秒,因为在10秒内原子弹从雷管点火,炸药起爆开始,能量向内心聚焦,高温高压压缩铀235材料,核材料达到超临界值,中子轰击原子核,原子核产生裂变,释放出大量能量。只见零点一到,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成功了,我们向全世界说成功了。

张爱萍拿起现场直通北京中南海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的专线电话,极为兴奋地向周恩来报告核爆炸成功了。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是不是真的核爆炸”?张爱萍继续报告,我们已看到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周恩来当即代表中央向原子弹研制和参试人员表示热烈的祝贺,随即赶到人民大会堂报告毛泽东。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地提出“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印发了号外。美联社和路透社也相继进行了报道。国内、国际上引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

九、原子弹是全国大力协同的成果

核武器研究院制定第一颗原子弹研制方针时,就明确为:主要技术以我为主,同时要考虑全国大力协同。

在原子弹的理论计算、物理爆炸试验、各项主要技术关突破、核材料生产等,都必须由核工业部自己负责研究解决,别的部门代替不了。但原子弹的其他相关部件、器件、测试手段,以及相关的配套协作工程,十分庞大。涉及到国防工业各部门、民用工业部门、科学研究部门、大专院校、各军种、兵种许多部门,是一件了不起的全国



核爆炸后被破坏的房屋

系统配套工程。不是直接参与这项工作的人,是无法体会到的。

例如原子弹本身配套的特种雷管、炸药是兵器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许多特殊电子元件、器件是电子工业部所属厂、所研制的,短时间可释放大容量的电源是民用部门研究出来的,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我曾看过一个协作配套项目表,仅中央各部、中国科学院、部队科研生产部门以及地方工业部门就有数十家数百项重要的配套项目直接与原子弹爆炸有关,涉及机械、电气、电子、轻工、化工等许多行业。

这里举几个例子,将原子弹托举起来的铁塔,是北京地方工业生产的;为隔除各测试点电容的影响,需要用塑料布覆盖,这些塑料布,数量甚为可观,也是地方工业生产的;爆炸前,每个人都戴上副防止光辐射的眼镜,这也是民用工业生产的。还有从新疆境内主要火车站向核基地运输庞大的物资和人员,大量的解放牌汽车,一条一条长龙通向罗布泊,从天上往下看极为壮观,这些汽车是机械工业部生产的。还有许多测试仪器,如高速照相机、特殊示波器、精密天平、精密电表等等,缺一不可。总之,几乎各行各业都为原子弹爆炸出了力。

十、中国人勒紧裤腰带研制出原子弹,感人至深的故事如搬上银幕可获得奥斯卡奖

我国的原子弹正式起步研制是1959年下半年,这个时期正是我国经济困难时期,粮食定量供应,副食品短缺。核武器研究院的广大科技人员,同样度过了每天挨饿、身体浮肿的艰苦时期。

但是,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却出现了奇迹,科研人员热火朝天,没有灰心丧气,没有消极沉闷,整个核武器研究院的人员,像蒸汽机车一样,加上点煤、水,就用尽全力向前奔驰。

科研人员每天在食堂都吃不饱,但回到研究室立刻开展工作,两个多小时后,肚子提抗议了,于是有的人拿出酱油瓶冲一杯汤;有的人挖一勺古巴黄色糖冲一杯糖水;还有的人拿出伊拉克蜜枣,含到嘴里。“加餐后”立即又埋头科研工作,

就这样坚持到下班。大家自我鼓励和互相鼓励:喝一杯酱油汤或糖水,应坚持工作1个小时以上;吃一粒伊拉克蜜枣,应坚持工作1个半小时以上。

我国的两弹元勋邓稼先,当时是院理论部主任,他的岳父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许德珩,有时支援他一点粮票。他拿这点粮票,作为奖励,谁的理论计算又快又好,他奖励谁几两粮票。在当时从事国家尖端技术的人员,能得到几两粮票,是一种最高奖赏,今天的人们是无法理解的。

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著名核物理学家朱光亚,从长城外爆炸物理试验场回来,途中买一点青颜色杏子,回到院内送了几个给我。因快要下班了,正是饥饿的时候,我既没有洗手又没有洗杏,马上吃进肚里,是苦是涩是酸,也未来得及感觉,但觉得有了点力气,就继续加了一会儿班,看着窗外还未落山的太阳,说了一句“光亚同志今天真是雪里送炭”。这件事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远在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基地,百万大军在那里从事科研工作和基建工程,那里大戈壁的客观条件本身就很艰苦了,在三年国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断炊的问题,更是雪上加霜。罗布泊本来植物就很稀少,可以吃的如榆树叶、沙枣树籽,甚至骆驼草,几乎都被他们拿来充饥了。

这里我想起当时的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的一段话:“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今天的朋友们,你们可曾想到过曾经有过如此困难、如此忍饥挨饿的人把原子弹搞出来。有了他们艰苦奋斗的闪光精神,才有我们今天的强大中国。这难道不是奇迹吗?

原子弹爆炸后,第一时间看到的能量是闪光,科学家把它叫做光辐射,有极强的亮度,但是它比起从事我国原子弹事业的科技人员的内心的闪光,也只是第二位的。

我们国家有许多有才华的优秀导演和演员,如果能把这些故事情节及科技人员闪光的内心世界拍成电影,我认为完全可能获得奥斯卡奖。

(责任编辑 李晨)

铁骨金声 巍巍其人

——吕荧先生逝世 35 周年祭

● 赵淮青

青岛岁月

吕荧先生是中国近代文坛上一位享有很高声誉的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1950 年初秋,著名作家王统照先生奉调辞别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前往济南出任山东省文联主席。接替他担任文史系主任的是刚从大连来的吕荧先生,当王先生在他主持的欢迎大会上,热情地向大家介绍了吕荧教授时,同学们都非常兴奋,半是对王先生的惜别,半是对吕先生的敬仰,有的同学开玩笑说:“真是鱼与熊掌不可得兼也!”

我与吕荧先生真正近距离地接触,是次年春天,文史系分成中文、历史两系,他为中文系讲授《文艺学》的时候。记得那天,吕先生穿了一身深灰色凡尔丁中山装,面庞清癯、白皙,戴一副深褐色近视眼镜,让人一看就想起瞿秋白的容貌来。他显得有点羸弱,春暖时节,那双黑色高筒布棉鞋还未能脱下来。他微微颌首向大家致意,并不开口,转身在黑板上写下《文艺学》三个大字,苍劲有力。第一节课似乎讲了一些学习注意事项之类,诸如要记好课堂笔记等等,别的内容我就记不得了。

然而几堂课下来,同学们发现,吕先生讲课实在非同寻常,内容丰富,条理井然,分析透彻,见解精辟,他有自己的理论系统,有扎实的文史哲功底,且能深入浅出地表达,教学水平堪称一流。同学们还发现,这位先生讲课不苟言笑,庄重沉稳,自有一种风度翩翩的动人处。

消息很快传开了,文学院的历史系、外文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教室内外人挤得满满当当,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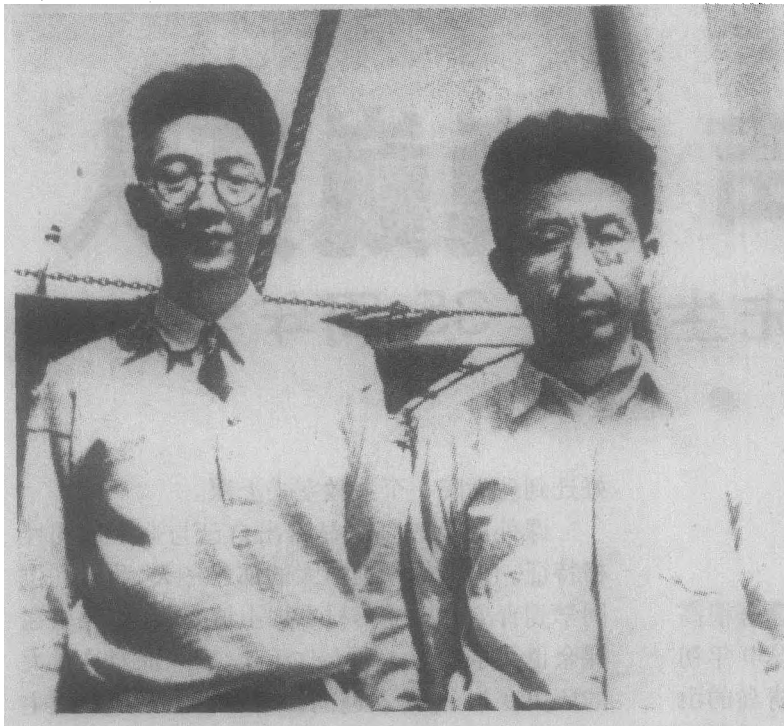
好迁到理学院一个大教室去上课。

课外的吕先生也显露出自己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记得他刚到山大的那年冬天,我与几位同学到青岛郊区的李村参加土地改革。吕先生在课余也偶尔参加一些土改活动。看来面对这样大的历史变革,他是欢迎的,兴奋的;但对斗争地主一些过火的行为,情绪似乎又有点抵牾。一天,空中飘着雪花,吕先生披一件棉布大衣,来参加批斗大会。当他看到几个中年妇女扑向跪在地上的地主,用脱下的鞋底披头盖脸地打,嘴里还骂着不堪入耳的粗野的话时,他便退到围观群众的后头,较早地离开了会场。

1951 年,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吕先生对此也有自己的看法。曾对去看望他的同学们说,武训也是你们山东的一个圣人,他办学学错在哪里?没有钱,到处募捐甚至乞讨,正表现了他对办学的坚韧执着,怎么成了罪人呢?我的老乡冯玉祥就崇拜武训,步他的后尘办义学……

几十年以后,我才知道,《武训传》的倒霉,不过是万人唾骂的江青出于对孙瑜、赵丹等一大批电影艺术家的嫉妒,抓住影片中的个别问题,比如写了农民起义的失败,便兴风作浪,状告到毛泽东那里,随后展开了那场声势浩大的批判。这也是对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施加思想桎梏、迫害知识分子的一个开端。而吕荧先生当时所持的态度,正表现了他的特立独行的性格。

那年盛夏,青年团山东省委在青岛举办海滨夏令营,参加者为全省大中学生代表,我也有幸忝列其内。一天傍晚,吕先生托人把我找去。当我走进地处海滨金口二路他的家,推开门,浓浓的



1949年5月9日,吕荧乘船离开台湾,经香港回北平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右为骆宾基

烟草味混合着中药味扑面而来,桌上摆着凌乱的报章杂志,还有一大摞文章底稿,壁下全是书,多是外文版。另一间房子有两个小女孩,大的七八岁,小的四五岁,由阿姨看着。吕先生几年前已与妻子分居,过着单身生活。

吕先生让我来,是征求我的意见。他告诉我,海滨夏令营要请他去讲现代文学。他不太知道听讲人的具体情况,应该讲些什么呢?我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对他说:这些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和小城市,文化程度参差不齐;大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学理、工科或农、医科的,讲的内容不宜太深太专……他凝神听我说,不时点头。

先生喜怒不形于色,威仪俨然,使我觉得有些拘束,正准备告辞时,他的话头突然转了。他大概知道我是系学生会的一名“干部”,问起了同学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报名参加军干校)、思想改造、下乡进厂等情况,然后对有关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学校组织你们参加一些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要你们向社会学习,这是好的,但是,你们好不容易踏进大学这个门坎,主要任务应该是读书。要珍惜时间啊!我曾对系党支部的同志说过,我们是正规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固然重要,但不

要影响更不能代替本科功课的学习。”记得他还向我解释,感性知识毕竟有它的个别性,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书本知识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比起实际来,是一种更全面、更普遍、更深刻的知识……

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说这样一些话,我感到很新鲜,觉得持之有故,言之有理。那时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已过,位于济南的华东革命大学和齐鲁大学文学院合并到山东大学来。从吕先生的话里我听出,他对华大有些领导的“左”的做法是有看法的,据说他对来自华大的系领导还说过:“我们可不能误人子弟啊!”

我与吕先生的个别接触不多,但已经觉察到,他虽话少,却很精辟,很尖锐,才情学识不同一般。我还感到,先生待人处事耿介不曲,爱憎分明。

乍一接近,似乎内向深沉,实际上热情诚恳,率真坦荡,不论怎么忙碌劳累,他从不拒绝学生前往讨教,可谓诲人不倦,慷慨无私。

独一无二的运动

也就在那年冬天,山东大学爆发了一场全国独一无二的运动。1951年11月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文艺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署名张祺,题目是《离开毛主席的文艺思想是无法进行文艺教学的》。文章内容主要是“揭露”吕荧在《文艺学》教学中,不重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导作用,看起来来自解放区的新文学作品,盲目崇拜西欧和俄罗斯名著,等等。

张祺是中文系办公室的一名资料员,他并没有听过吕先生的讲课。据知情人说,他向《文艺报》投书,是有人背后指使并经过有关领导研究和过目的。

这封“读者来信”刊载于中央权威刊物,在山东大学自然引起了轩然大波。来自华东大学、当时担任山东大学副教务长的一位领导指令要吕荧检查,要中文系学生对吕荧展开批判。系党

支部书记积极到各班进行动员,要求同学们写小字报,开小组讨论会,为召开全系批判大会作准备。他甚至在一个班上说:谁不参加批判吕荧,是对党的号召的态度问题,党团员是要受到批评甚至受到严厉处分的。但是系里绝大多数同学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学出于气愤,将那期《文艺报》撕得粉碎,有些同学联名写信给《文艺报》,指出张祺的信,纯属道听途说,捕风捉影,断章取义,片面歪曲,要求澄清事实。那些日子,整个系里的空气相当紧张,但吕先生拒绝作出任何检讨,他说,他无错可认,他要对自己负责,也要对学生和读者负责。

在学校大礼堂召开的批判吕荧的大会上,尽管华岗校长不赞成在会场的横标上出现“批判”二字,最后写成了“文艺学教学思想讨论会”,但由于这个会是经过有些人精心策划的,发言人言辞相当尖锐激烈。我坐在会场的后几排,思绪纷纭,想起吕先生几次讲的“取法乎上,仅得乎中;取法乎中,仅得乎下”,这难道也错了吗?看看坐在左前方的吕荧先生,却挺直腰板,岿然不动。他曾想登台驳斥,被中文系副主任奉命挡住。

几天后,吕荧把两个孩子交给保姆照看,自己去了上海,先住在朋友何满子家。在此期间,他曾接到华岗校长来信,殷切希望他返回山大继续做教学和研究工作,吕荧复信婉然拒绝。不久,他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之聘,到出版社担任特约翻译去了。吕荧先生这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是我平生所仅见。

如今,时间过去了50多年,当我再来回顾山大中文系那场独有的“左”式运动时,心情依然沉重。吕荧先生讲授《文艺学》,即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时当解放初期,绝大多数大学的文学教坛都还刚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吕先生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已经有了相当深入系统的研究。在教学中,他用新的文艺观点来分析讲解他自己对中外文学精品的研究成果,这在当时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世事不公,回报他的竟是一场大批判。这真让人啼笑皆非,不可理喻。而更让人遗憾可惜的是,我们的《文艺学》课程由此夭折,并永远失去了一位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好老师。

吕荧在从上海前往北京赴任的路上,绕道青

岛探望两个孩子。有一天,我在系图书馆门前与他相遇,虽匆匆一晤,却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他穿一件白衬衫,没有寒暄,也没有笑容,劈头就问我:“听说你们参加了市里工商界的五反运动,去了多长时间?”我说:“一个半月吧。”他立时表现出惊讶,说道:“那不打乱了学习计划吗?”看来,“大学不是政治训练班”的想法仍在他心中盘旋。他还说:“这几年,你们哪门功课从头到尾地学完了?系里这么多有名望的先生,却不能好好向他们学习,多可惜呀!”看来他虽已离任,还在关怀着同学们的学习。听着他的这些议论,我心中隐隐感受到,先生似乎在为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忧虑。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文革”之后,我更加意识到,在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已经初露端倪,文化园地已经开始沙化,而吕先生,凭着他超人的敏感与远见,不是开了批判“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些谬论的先河吗!

这是我见到吕荧先生的最后一面,一年多之后,我便到了大西北,从此云泥相隔,音问断绝。而他那时而深思时而激动的声音容貌,却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定格在我的眼前。

当年在山东大学,吕荧先生的为人治学精神,都曾为广大师生所称道。他是安徽天长县人,原名何佶,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在校时积极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曾创办进步期刊《浪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受到北大“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的校风的熏陶。抗日战争爆发,当他正要与作家罗烽结伴去延安时,途中突然患病,改去四川疗养。1939年在昆明西南联大复学,兼攻历史、文学、哲学和外文。1941年毕业后,到四川涪陵等地教中学,经常往来重庆,与进步作家、文艺理论家冯雪峰、胡风、聂绀弩、邵荃麟、骆宾基等交往甚密。同时埋头读书,刻苦著述,出版文学论文集《人的花朵》(评论鲁迅、曹禺、艾青、田间等人的作品)、《文学的倾向》,翻译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奠定了左翼文学评论家、翻译家的地位。吕荧知识广博,文章有创见,意境涵泳,有文采,学识与品才俱备,在抗日大后方的文艺界颇有名望,嗣后他去贵州大学、台湾师范大学任教。为迎接全国解放,1949年4

月,经香港去北平,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那年10月,他到大连去开展工人文艺运动,辅导工人文学创作,出版《关于工人文艺》论文集。

厄运从天而降

世间的事真让人难以琢磨。以胡风为首的文学派,一朝之间变成“胡风反革命集团”,那是1955年5月间的事。当时吕荧正担任《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版的顾问,他和萧乾都因中外文学造诣深厚又谙熟外文,被胡乔木看中,受到《人民日报》聘请。胡风案发时,文艺界上层领导认为,吕荧与胡风虽有文字交往,但关系不深。1955年5月25日,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声讨“胡风反革命集团”。当时胡风夫妇已被逮捕,胡风的不少友人也失去人身自由,而吕荧还能被邀与会,并且能够上台发言,说明上面当时尚未把他划入那个“反革命集团”之内。但正是由于那次发言,他成为唯一敢为胡风申辩的人,并为此招来厄运。

1956年春夏之交,我去宁夏银川采访,在文联领导姚以壮的家中与诗人李季不期而遇,对坐在炕桌两边聊起来。李季有点调侃地对我说:“你们那个老师吕荧呀,真是笨拙的反革命!本来没把他划到那个圈子里,主席团也没打算让他发言,谁想他三番两次递条子要求发言,就让他上台了。可谁也没想到他竟为胡风辩护,说胡风是文艺思想问题,不属于政治问题,意思是胡风不是反革命……这个人真是书呆子的可以了!但是此话出口,举座皆惊,全场好一阵才回过味来。这么一个沉着庄重的人,怎能在那样一个众口一辞、一片声讨的大会上说出这种话来?这不是与会议的决议唱反调吗?后来主席台上有同志站出来把他往台下轰,大会主席郭沫若也站起来让他‘停止发言’,他这才走下台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面对着这位大名鼎鼎而又平易近人的诗人,我呆呆地听他叙述,心潮难平!是的,这就是我所熟悉的吕荧先生,他从来就是这样,把自己认准的事情直言出口,毫不隐讳,无所畏惧,决不闪烁其辞。历史已经证明,他在胡风批判会上的那些话是黄钟大吕,金声震天,将永远响彻在历史的

上空。吕荧蔑视以言代法、言出法随,他敢于面对强权,而隐忍苟活绝不是他的个性。据说,在当时席卷全国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风暴中,吕荧是第一个公开站出来,声言胡风不是反革命的人。

当吕荧发言时,《人民日报》上已经公布了胡风“罪行”的第二批材料,以他的睿智,不会不知道这是有来头的,是当今最高领导的旨意,但他还是挺身而出了。吕荧就是这样一位为民请命、舍身求法、敢于为正义承担苦难的伟丈夫。

多年之后,女作家韩文敏告诉我,那天最先站出来把吕荧轰下台的不是别人,正是诗人、文艺评论家张光年,他当头棒喝:“吕荧!不要再说你那一套了,先交代你和胡风的关系吧!”当韩文敏后来访问张光年时,他没有否认这一切,而且对吕荧表示了深深的歉疚之情。

那次声讨胡风的大会开过不到一个月,吕荧被隔离审查。先是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第三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罪行”材料时,他被划为“胡风分子”,同时公安部门派人把他看管起来。这使他无法理解,日夜忧思如焚,悲愤交加。始而精神恍惚,继而幻觉幻听,大脑神经受到严重刺激。直到后来解除管制,他的好友聂绀弩、萧军等人去看他,他还惊慌失措,高喊“特务”,把他们拒之门外。

但是谁也难以预料,也不知是哪位领导批准,1956年5月25日,吕荧突然被宣布解除审查。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从1957年开始,吕荧又提笔写文章了。那年12月,他的美学论文《美是什么》登载于《人民日报》,并且加了一篇让所有关心他的人都舒心顺气的“编者按”,那篇“编者按”实际上是为他在政治上平了反。文字不长,我且照录如下:“本文作者在解放前和胡风有较密切的来往。当1955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揭露,引起全国人民声讨的时候,他对胡风的反革命面目依然没有认识,反而为胡风辩解,这是严重的错误。后来查明,作者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并无政治上的联系。他对自己过去历史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已经有所认识。我们欢迎他参加关于美学问题的讨论。”

据悉,“编者按”是由胡乔木执笔,经毛泽东过目,虽然仍有一些不实之词,却使所有关心爱

护吕荧的人如释重负,为之庆幸。人们原以为他的体力和精神已被折磨殆尽,无法再写作了,谁知政治处境改变之后,他的写作才气又爆发出来,没过多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版了译著普列哈诺夫的《论西欧文学》,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文学论文集《艺术的理解》。在以后的几年里,吕荧集中精力研究美学,写文章与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蔡仪诸位商榷美学问题,独树一帜,自成一家。

弃尸荒野

腥风血雨的“文革”铺天盖地的开始了,吕荧无处藏身,无法幸免,很快被红卫兵抄了家。不过他们大失所望,全部家当只不过是一些破旧家具,还有一些旧书、旧画,另有三块砖头支着一口锅,聊以生存而已。四合院很快被他所在单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人强行搬入。特别是有个姓孙的外文编辑觊觎着他住的那间向阳房,不时制造事端。有一天,吕荧在井台上洗苹果,手里拿着削水果的小刀。他俩发生了口角。孙某写出大字报,声称吕荧“持刀图谋行凶”,强烈要求有关方面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年6月,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亲自批示:“胡风反革命分子吕荧,一贯思想反动,影响社会治安,应收容强制劳动。”一声令下,吕荧被押往良乡农场劳动改造。

吕荧被捕时,衣衫褴褛,赤脚穿一双胶鞋。但他不忘带上未完成的书稿,还有一架旧英文打字机,他还带上准备开夜车写文章用的若干包蜡烛。可是一到农场,看到人挤得如罐头的通铺,大便马桶就摆在脚底下,粗糙又不足量的饭食,力不胜任的劳动,他的一切向往都变成了泡影。很快,打字机被没收了;因为饥饿,他不得不把一包包蜡烛换成了玉米粒混合着玉米叶磨粉做成的窝头。

女作家韩文敏和吕荧的大女儿潘怡都访问过与吕荧同住一囚室的难友姜葆琛,姜是清华大学毕业生,他对吕荧的同情和友情,是吕荧劳改生涯霏霏寒流中的丝丝暖风,抚慰着吕荧痛苦的心灵。据姜葆琛说,吕荧到农场后,很快消瘦下来。与众不同,他平时几乎不说话,以沉默对待队长的责问。因此常被当作批斗的靶子,辱骂和殴打是常有的事。据另一位难友陆俊说,吕荧

打饭回来,没有筷子,站在囚室前用手抓着吃,此时此刻,他常常仰望天空,口中念念有词,眼神里流露出惨伤和悲愤的情绪。

祖国在受难,人民在受苦。吕荧在劳改中虽然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但他不能忘情于外界的事情,一早一晚注意听从高音喇叭里传出的新闻联播节目。姜葆琛偶尔被批准进城看病,吕荧便托他到有关单位看看大字报,他挂念着他的朋友冯雪峰、聂绀弩、萧军、楼适夷、骆宾基等人的命运,可是每每给他带来的都是揪心的消息……

吕荧以沉默抗议一切,有时却对囚室外的几株开白花的茨菰开口说话,喃喃道:“真美呀,真美!”吕荧爱美,爱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他的一生是为美而奋斗的,他留给人间的是美。如今他见茨菰花开花落,这是劳改农场唯一的美啊!我想,他这时一定会想起他的友人阿垅的那两句诗:“我们无罪,然后我们凋谢!”他自己不就是一朵盛开的绝美的花,然后在狂风暴雨中凋谢的么!

1968年10月,吕荧和姜葆琛等人作为“老残队”被遣送到清河农场继续劳改。他俩一如既往,相依为命,相互关照。吕荧虽寡言,但对姜葆琛却能倾诉心曲。他曾说过:“一定要坚信:这个不公正的时代,一定会过去的!……”他还说过:“你年轻,一定要活着出去……”当他兴致好时,还谈起如何写作。真是耿耿此心,天地可鉴。

冬天到了,吕荧心身交瘁,如风前残烛。加上饥饿,有病无医无药,那床长满虱子的破棉絮早已难遮风寒,人变成皮包骨头,命如游丝。

当生命的最后一个春天到来时,他已不能看到窗外初萌的绿草芽了,心碎神伤,奄奄一息。有一天,他忽然想抽支烟,姜葆琛只能为他买包最次的烟,他抽了几口,便永远闭上了眼睛。那是1969年3月5日,一领苇席草草包裹,几锹黄土随便掩埋,半块砖头上用粉笔写了“吕荧”二字。那年他55岁,令人想起“生以身谏,死以尸谏”那两句话。

吕荧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35年了,他一生正直,光明磊落,侠气贯胸,而又历尽劫波,命运多蹇。他没有坟墓,更没有碑碣,但他的浩然正气,他的辉煌事业,他的光风霁月的人格魅力,将永留在天地之间。(责任编辑 方 隽)

悼念袁晓园女士

● 欧 初



2003年11月18日晚,我接到中华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理事长李宝光女士自北京来的电话,说袁晓园女士于17日下午在南京仙逝。心里一阵难过,我把这一噩耗告知工作人员,请其立即打电话给袁女士的亲属严敬先生,表示哀悼,并敬献花圈。

袁女士是当代的奇女子,慈祥、刚毅、多才,是她留给我的深刻印象。

她少小的时候,就养成了勤奋学习的习惯,对传统文学、书画艺术、英语都很有心得,尤其是汉文造诣很深;她又是我国第一位女外交家。上世纪30年代,她出任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副领事6年,为外交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她不但是外交人才,而且还是个汉文字学家,在文字改革中曾提出“袁氏汉字拼音”的方案;她对哲学也有研究,对人生、社会的各种现象分析的十分条理;有文学修养内涵,她的书法苍劲而典雅;她热爱祖国,夫妻俩曾联名上书国民党当局,呼吁国共合作,和平统一,因而遭到开除国民党籍和通缉,因而被迫经香港转到美国定居。

她告诉我,新中国成立后,她一次回国,周总理见她,对她说:“你研究汉文字,应该回来研究,才会有优越的研究条件。”她认为总理的话很有道理,遂于1985年申请回国入籍,美国有关办理人员奇怪地问她:“很多外国人都希望能来美国定居而未被批准,可你却为什么反而舍弃美国籍而回中国?”她态度鲜明地回答:“我热爱我的民族,热爱我的国家,我对汉文字有点研究,我要回国致力于文化事业。”

她热爱文化艺术事业,1993年中华炎黄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在广州成立,1995年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第二次理事会在三亚召开,她都参加了。雅集中,老人精神矍铄,毫不龙钟。她或笑语连篇,或诗酒唱和,或玩弄翰墨,大家对此十分感动。

2002年5月22日,中华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第三届理事会议要在广州召开。她于5月21日又从徐州飞来了。刚下飞机,知道住处离广州艺术博物馆不远,马上要求前往参观。当晚香港梁洁华博士举行小型晚宴,她、任

仲夷夫妇、李宝光女士、祁烽、陈开枝和我参加,大家谈笑风生。她神情爽朗,毫不显老。谈到老人要有乐观的精神,要成立一个什么会的时候,她提出“我们是不老会的,就叫不老会吧!”大家一致赞成,并立即推举仲夷为会长,她为名誉会长,80岁以上的祁烽和我都当了会员。随后名誉会长立即在红布上挥笔书“不老会”三个大字,我们在红布上签名。“不老会”三个大字,却被不知哪位“识货”的人,顺手牵羊拿去了。

在第二天的中华女子诗书画联谊中心第三届理事会上,她发言思路敏捷,口齿伶俐,她说:“……我经过许多曲折,但我不怕困难,什么困难,可以想办法把它克服……我不认老……”一番短小精练、富有人生哲理的话,赢得与会者热烈的掌声。香港亚洲电视台王明清小姐立即专访了她。她对记者侃侃而谈,认为艺术要不断求新、求变,不落俗套,要想“古怪”也不容易,怪要怪的有趣。老人又关心国家大事,又慷慨大方,乐于助人。归国后,她曾捐赠6万美元,资助泰山石刻及《人民日报》海外版大楼建设,又曾对贫困地区儿童、孕妇有过资助。1998年南京江苏遇上百年一遇的大水灾,她除捐赠书画作品外,还亲自到长江大堤慰问抗洪官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她病重弥留之际,亲属向其报告我国神舟五号飞船升天的消息后,她瞪大眼睛兴奋地说:“中国人永远不会落后,中国总有一天会赶上美国!”

老人走了,但她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曾手书一诗赠我:“不拜耶稣不参禅,不信气功不练拳。人间哪有不老药,顺其自然到百年。”诗意明快豁达,充分反映老人宽阔胸怀和顺其自然的心态,也许这就是她活到102岁的原因吧,我想。

追踪两千多年前的战备工程

● 王雪生

1992年6月,在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衢江北岸,距县城约5公里处的小南海镇石岩背村,几位农民在抽水抗旱时,因为小水池中的水大旱不涸,从而意外地发现了小水池底下,原来是一个人工开凿的巨大石窟,洞内凿痕整齐有序,清晰如初。现已开发的7个石窟,面积都在一千平方米以上,其中最大的石窟面积达一万平方米,洞高20余米,并有4根巨大石柱支撑着顶部,石窟非常奇特而壮观。现已初步查明,在石岩背村附近共有24个石窟(据村民介绍,附近还有许多被耕种时填埋的洞口),形成了一个巨大而神秘的石窟群,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2000年10月,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屯溪区东郊12公里处浯村的花山地区,沿新安江南岸5公里的地段内,初步探明分布着36个石窟,是一个规模更大的人造石窟群。当时,已开发并正式对外开放的2号石窟,面积为4800平方米,洞深146米,高10多米;35号石窟面积竟达12600平方米,深170米,高10多米。其中有26根大石柱顶天立地,并有36间石室围绕着中间的大厅,气势雄伟,堪称中华一绝。回观洞口,雾气腾腾,更充满着神秘的色彩。

花山石窟群发现后不久,在其东侧沿新安江几公里处的黄山市歙县王村镇烟村,又发现了烟村石窟群。烟村石窟群地处新安江畔的山丘之中,全系古代人工开凿,数量也多达36个,石窟面积均有数千平方米之大。

这些千古奇迹被发现后,引起国内外新闻界、旅游界、考古界、学术界、各级政府与广大群众的浓厚兴趣和密切关注,纷纷前往参观、考察和研究。作者曾应邀先后赴现地踏勘,并听取了有关人员的详细介绍。

千古石窟群成因,众说纷纭

谜团丛生的千古石窟群,究竟是什么人开挖的?是

什么年代开挖的?其用途是什么?内部的大量石料运往何方了?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为何不见文字记载?等等问题,都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分析和研究,以求得一个有理有据、切合实际的答案,解开千古之谜。据各地新闻报道,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成因”说:

一是“采石场”说。由于地表石料非常坚硬,经济的方式是下挖;又说,长条逐层下剥、横断取石的“石老鼠方式”发轫于汉代,所以断定开挖年代在汉——明之间。再以历史记载,龙游“县建于明”,以部分城墙和民宅所用石料的尺寸为佐证,说明所采石料用于明代建城。另据报道,浙江个别文物专业人员甚至断定:龙游石窟只是一个古代废弃的采石场,其文化内涵很低。对于“采石场”说,花山谜窟的导游小姐们给予了最有力的反驳:假如单纯为了采石,何不露天开采省时、省力又省钱?因为地下开采的成本要高出地面近十倍;何况地下的石料质量并不太好;为了运料方便,势必要多口出料,但所有石窟却都只有一个洞口,更何况石窟内部又是多层次、多石室、多石槽、多暗井,而且洞壁的凿痕整齐、细腻而美观,这一切显然是采石场所不需要的。她们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人利用其中部分石料的可能性。

二是“仓库”说。以龙游3号石窟石柱的枰头形状和洞壁凿痕是汉代流行纹饰为由,断定其为汉代所建;夏天洞内温度稳定在摄氏15度左右,最适合于储存粮食。史料记载,汉宣帝命令“边郡皆筑仓”;明代龙游县志又有“常平仓,在县北”之说,加之其中一个窟内淤泥经化学分析含盐量较高,证明石窟是国家仓库。后来在清淤中还发现了西汉的釉陶。还有说,花山石窟群是“徽州盐商仓库”,在古徽州六县的宋、元、明、清历代千余名商人中,“巨富”就有230多人,他们大多为盐商,而且其中好多人的故乡就在花山石窟群附近地域,只有他们才能投巨资开凿

石窟群作为盐库。但是,由于上述三个石窟群处在地广人稀之地,其内部空间又特别大,作为仓库的主要成因说也难以服人,但后人利用其中个别石窟作仓库也是有可能的。

三是“宫殿”说。有人说,龙游是春秋时代姑蔑国的国都,石窟装饰之精致,如为采石、仓储,均无必要;石窟符合南方建筑“五分水”原则,冬暖夏凉,与都城隔江相望,故推断为姑蔑国的宫殿,或有帝王、诸侯生前选造陵墓的可能性。据《吴越春秋》卷八记载:“姑末,即春秋越姑蔑之地。”春秋时代,姑蔑是越国南部的重要城邑。姑蔑国国都之说,纯属讹传。因此,“宫殿”说是没有根据的。

四是“贺齐屯兵”说。据《新安志》载:东汉时期,公元208年,孙权为削平黟、歙等地的山越,派威武中郎将贺齐屯兵于溪水之上,后改新安江上游水域为屯溪。“屯溪”也因此而得名。认为这些石窟群是贺齐的屯兵洞和弹药库(石块),并以石窟中的出土文物,矛、斧、陶片、灯盏和大量未及使用的石块为佐证。铁矛的出土,是石窟用于屯兵的主要物证,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凿窟屯兵费时费力,不是短时间内能建成的。对于占据绝对优势的军队来说,对付乌合之众的“山越”,显然没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所以“贺齐屯兵”说的可能性也不大。

此外,还有其它许多成因说,如“花石纲”、“方腊洞”、“临安造殿”、“修建徽州府和渔梁坝”等等说法。由于这些成因说的历史都只有几百年,尚不足千年,都被花山谜窟中厚达5-6厘米的石钟乳所否定。石钟乳,也称钟乳石,是由含碳酸钙的水溶液沿石窟内壁流淌并逐渐蒸发、凝结而成的,常见于天然溶洞之中。据地质人员推断,生长到5-6厘米厚的石钟乳,需有1500-2000年的时间。这个时间界定非常重要,证明其开挖年代只会更早,而不会晚于这个时间。所以,其它这些成因说,也就都不能成立了。但是,后人出于某种需要,继续利用古代石窟群的可能性,仍然不能一概排除,否则接踵而来的新问题也是无法解释的。如花山谜窟中出土的青花瓷片证明,在春秋时代之后,石窟中曾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其中,确有已凿好的巨大石梁、石柱,尚未运出,它证明确实有人曾利用其中石料的可能性。据《中国通史》第五册记载:北宋末期(1120年10月)方腊确曾利用青溪(今浙江省淳安县)新安江边的帮源峒石窟,聚集贫苦农民举行起义,但于次年8月即告失败,英勇就义。因此,方腊根本不可能去开挖石

窟群。另据报道,《龙游县志》卷16所载,清朝康熙年间翰林余询曾写过赞美和猜测石窟的诗作。这说明在清代,当时有些地下水位较低的石窟,还没有被水淹没,存在着被后人继续利用的条件。针对各种成因说,除了需继续寻找实物佐证外,还应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从石窟群内外的共同特征方面作深入细致的研究。

千古石窟群具有明显的军事特征

在战略部署上,具有藏龙卧虎之势。从战略整体角度看,花山、烟村和龙游三处石窟群,都位于浙江(今钱塘江)上游,当地地广人稀,地形起伏,位置十分隐蔽。且采取大分散、小集中的部署,既便于管理,又不易被敌发现。石窟群紧靠江边,水陆交通方便,从水路可以直达东海,便于军队实施战略机动和出击,保持作战行动的机密性和突然性。当地地质属于红(白)砂岩,石质不是特别坚硬,适宜于开挖石窟群。在这些地区建立屯兵基地,进行秘密扩军备战,是较为理想的选择,真可谓藏龙卧虎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

战术上,隐蔽集结兵力,又便于互相呼应,进可攻、退可守。从战术上看,石窟群所在地域就是一个坚固的防御地域。依托石窟群作战,可以互相呼应,进可攻,退可守,使作战行动立于不败之地。每个石窟的出入口又非常隐蔽,龙游石窟群位于较低的起伏地上,地形比较平缓,洞口平面长宽各约为4-5米,面积一般约为20平方米左右,周围有竹林或灌木丛严密遮蔽,若无人指点是很难发现目标的。未开发的石窟仍为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小水池,原来房屋建在池边的村民都不知水下有何物。花山谜窟的洞口则位于丘陵地中的山腰、山脚或江边,高低错落,既隐蔽、又便于人员出入。现在个别浸泡在江水之中的洞口,与新安江千年的河道变迁、河床提高有直接关系,古人决不可能在水中去开凿石窟。各地石窟群的共同特点,是口小、单口、窟多、隐蔽,石窟内部又是多层次、多石室、多石槽、多水池,中间厅大、空间大,便于人员的生活和活动。这样的石窟群,只有用于军事目的,才能发挥其出奇制胜的神奇功效。

技术上,精心勘察,巧妙设计,构思独特,施工严格。从技术上看,石窟群的勘察、设计和施工都是相当科学的。据地质专家考察介绍,花山石窟中的红(白)麻石,石质为中生代的砂质岩,属于沉积岩的一种;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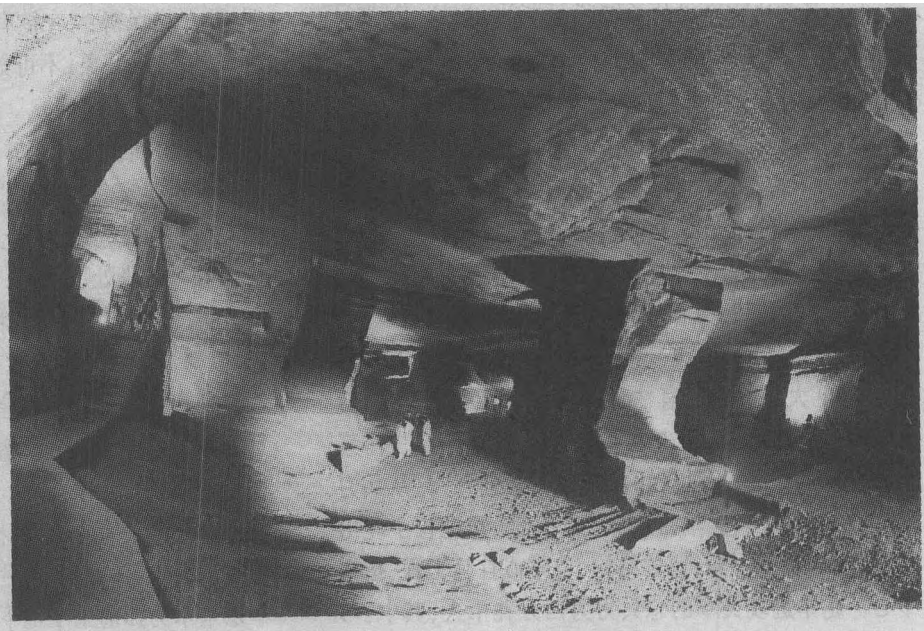
游石窟中的红石（也称红砂石），石质为长石石英砂岩，含铁量较高，属于沉积岩中的紫红页砂岩。这些沉积岩石质的共同特性为：质地密度小，孔隙率大，渗水性能好，结构比较疏松，容易风化。我估计其坚硬系数为3-4左右，即相当于300-400号水泥制品的抗压强度。由此可见，这种石质既有一定的坚硬性，又不十分坚硬，古人有能力在其中开凿石窟。石窟采取向下倾斜的开挖，出入口顶部的厚度虽只有几米，但顶部岩石的整体性较好，不易倒塌。花山个别石窟虽开口较宽，因留有石柱作为口部支撑，仍很坚固。龙游有几个石窟之间相距只有数十米，却不在同一条垂直轴线上开挖，而形成“七斗星”型的平面布局，石窟互相依存就更坚固可靠。这都证明，石窟群是经过精心勘察选定的。石窟内部最高达20余米，最大跨度近百米，其中众多巨大的石柱就起到支撑稳固的作用，防止顶部垮塌。石窟内顶部都有个共同特点，即有约45度倾斜，如同一个半弧形的“倒簸箕”状，符合力学原理，使石窟内部整体更加稳固，虽经渗水千年浸泡而不倒塌。石窟内有大小不等的石室相分隔，它们各有不同的用途，如指挥室、卧室，储藏兵器、粮食和各种用品等等，中间的大厅可用于人员的集体活动和居住。水池、暗井，不但可以解决饮用水问题，还可使石窟内的地面保持干燥。这种巧妙设计和独特构思，明显是用于秘密囤集军队人员、粮食和物资等军事用途的，而且有长远打算。这方面的设计构思，酷似现代军事工程。

在砂岩中构筑如此巨大的地下工程，究竟是采取什么方式开挖的呢？从现场观察，没有任何爆破痕迹。中国发明的火药，出现在公元7世纪。可见，开挖石窟群的时代，还不具备实施爆破的物质技术条件。整齐有序、精雕细刻的凿痕证明，它完全是采取手工用金属利器开凿而成的。花山石窟中出土的铁钎、铁斧、铁质油灯等开凿用具实物，也证实了这一点。在古代生产劳动工具极其落后的情况下，靠手工开挖一个如此巨大的石窟，没有大批劳动力和五至十年时间是办不到的。

当然，待开凿深入地下之后，随着工程作业面的不断扩大，即可展开更多的劳动力，日以继夜地轮番作业，可以大大加速施工进度。道道凿痕，一丝不苟，又证明其施工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它也是古代能工巧匠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与血汗的印记。

有人又会问：开凿石窟群的石渣达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立方米之多，运到哪里去了？肯定的回答是：就近堆积。这里举一个已解密的现代军事工程实例：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全军共构筑坑道1250公里，相当于陇海铁路从连云港至西安段，挖了一条石质隧道；共挖堑壕、交通壕6240公里，接近于万里长城的长度（6700公里）；共挖出土石六千万立方米，以一立方米为单位排列，长达六万公里，可绕地球一周半。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和参与者（中国人民志愿军军事建筑部计划参谋），我的回答是：挖出的土石方，就近堆积。天长日久，经风吹日晒，雨水浇灌，上面自然就草木丛生了。石窟群沿江由石渣堆积而成的小高地（如钻探这种小高地的石质，必然疏松、破碎），还可以屏障其出入口，使江中船只和沿江行人难以窥视其位置。

通过对上述军事特征的观察、分析和研究，证明这些石窟和各石窟群之间不是孤立的，而存在着内在的互相联系，即它们都是围绕着一个共同的军事目的服务的。构筑如此大规模的石窟群，决不是某种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从而为进一步探索其开挖用途和开挖年代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花山2号石窟内景

春秋末期的地下军事工程已显露

根据《史记》、《吴越春秋》、《国语》、《春秋左传》和古代战争历史研究资料等记载,江苏、浙江、安徽一带在古代发生的战争,其规模最大、时间最长、谋略最高超者,莫过于春秋末期的吴越之战。越国消灭吴国的战争,发生在春秋末期,即公元前496年至公元前473年(周敬王24年至周元王3年),长达23年之久。它也是古代战争中,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一场比较典型的战争。

通过对千古石窟群现有的实物佐证(钟乳石、铁矛等等)和军事特征的调查分析,以及对吴越两国战争历史的追踪研究,基本上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越国有必要在战略后方建立秘密的囤兵基地。越国灭吴战争,面临着强大的对手。吴国强大,兵力众多,谋略高超,而越国弱小,人烟稀少,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加之越已对吴称臣,受吴国监控。因此,越国的战争准备是在十分不利、十分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它不可能大张旗鼓地搞扩军备战,必须避开吴国的一切监视和侦察活动。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确保进攻的突然性和出奇制胜,越国的一切军事活动,都必须极其机密地进行。越国在战略后方选择既能隐蔽战争企图,又便于实施战略机动和出击的地区,秘密构筑囤集重兵的基地,是深谋远虑和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秘密扩充、训练和囤集重兵集团,是勾践发起灭吴战争的客观需要,也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所在。所以说,花山、烟村和龙游石窟群,就是在这种特定历史背景下,即在越国战争准备阶段,军事斗争需要与可能相一致的特殊产物。

二、千古石窟群能秘密囤兵数万之众。到目前为止,花山、烟村和龙游三个石窟群,共发现96个石窟(在淳安等地可能还会有新的发现)。按照龙游已开发的7个石窟容量情况估计,囤兵三千人是完全可以的,24个石窟估计可囤兵一万至一万二千人。花山石窟群的规模更大,36个石窟估计可容纳一万五千至二万人。烟村36个石窟,至少也可容纳一万五千人左右。三个石窟群的总容量,估计可容纳四万至五万人。从兵力部署的重点看,其大本营(即总指挥部)可能位于花山石窟群。花山35号石窟的结构,也颇似首脑工程、指挥中心。越军进攻吴军的总兵力为四万九千人,其中:习流(习水战之兵)二千人、俊士(经过训练的士卒)四

万人、君子(越王的警卫部队)六千人、诸御(在职军官)一千人。当然,这些兵力中,有些是部署在国都附近,同时也不能排除还有秘密囤集在其它地方的。越军秘密聚集数万兵力,究竟囤集在何处?其主力,可能就集中在上述地区。他们边扩军、边训练、边施工,逐步完成构筑石窟群和囤兵任务。

三、越国具备开凿石窟群的技术力量。当时,越国能派出大批能工巧匠,帮助吴王修建姑苏台和馆娃宫等最古老的宫室与园林建筑;后来,修复会稽城廓的设计和施工,也十分巧妙与精致。灭吴之后,范蠡看透了勾践的为人,写信对文种说:越王为人,可以共患难,而不可共处乐。即不辞而别,隐居齐国。勾践“乃使良工铸金像范蠡之形,置之坐侧,朝夕论政”(《吴越春秋》卷十)。这一切,都证明越国的技术力量是很强的。由此可见,越国开挖地下石窟群的技术力量是具备的。此外,石窟中的一些痕迹,该如何解释?如:花山窟内的石柱高处,有方形盲孔和圆形盲孔,到底是干什么用的?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插进木杆,可以用绳索拉挂上多盏油灯,提高照明效果。所以,有的孔边还有少量烟熏的痕迹。二是插进木杆,设立箭靶,作为练习射箭之用;龙游石窟中雕刻有类似奔马、闪电等图案和无头石人像,其含意是什么?它可能标志着开挖者的决心,表示一旦重兵出击,将如同万马奔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吴国,斩杀夫差之意。

四、为什么构筑石窟群而没有文字记载?这与保密有极大的关系。越国的大夫们在对勾践献计时,反复强调,要严格保密:“今欲有计,不宜前露其辞。”“圣人之谋,不可见其象,不可知其情,临事而伐,故前无剿过之兵,后无伏袭之患。”“君王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取天下不难,而况于吴乎?”何况构筑石窟群秘密藏兵,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核心绝密工程,怎么能外传?对国防工程的保密程度,古今中外皆如此。古代对泄密者和窃密者都主张处以死刑,杀勿赦。即使一些帝王的陵墓,为防止被盗,也往往将知情者灭口,以绝后患。因此,其知情人只是极少数有关的决策者。加之历代战乱和各种变故,即使有机密文字档案,也可能已毁于一旦。再如夫差在黄池会盟时,闻报越军袭占姑苏,太子被俘。恐影响其争霸,为了保密,连续将七个情报人员杀死。勾践在灭吴后,对相国文种说:“子有阴谋兵法,倾敌取国。九术之策,今用三已破吴,其六尚在子所,愿幸以余术为孤前王于地下谋吴之前人。”说罢,赐剑文种,令其自杀。勾践为根绝后患,使相国文种无罪而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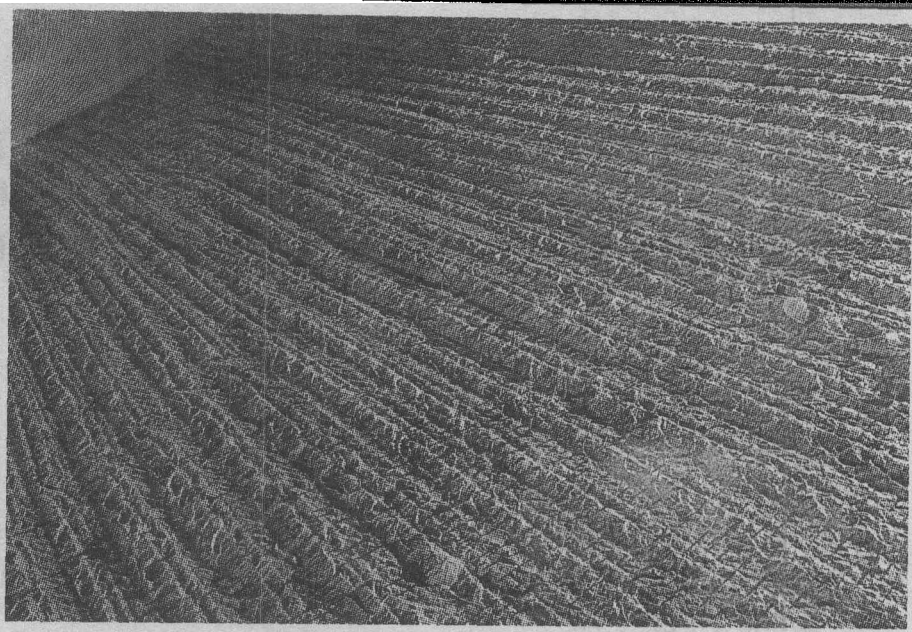
在灭吴战争中，勾践各种计谋，无所不用其极。在古代兵法《三十六计》中，“笑里藏刀”、“美人计”、“趁火打劫”等，都总结和引用了越国灭吴战争的成功之例。当吴国在为争霸而忙于修邗沟、挖黄沟的时候，越国却在埋头苦干挖石窟。密谋掘窟囤兵，不愧为勾践一个“闭口无传，守之以神”、出奇制胜的绝招。

五、石窟群构筑年代，约有 2480 多年。按照勾践回国后开始策划施工（他构筑石窟群，是否与他曾被囚于石室而受到启示有关，就无法考证

了），直至第一次进攻吴国之前建成使用的时间推算，即大约在公元前 491 年至公元前 482 年之间建成使用，距今约有 2480 多年之久。这个时间，与石窟内的石钟乳和出土的铁质兵器等也比较吻合。

六、石窟群中可能遗留什么武器装备？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战争依附于经济，生产方式决定作战方式。作战武器，自古以来就是由生产工具和交通工具转化而来的。据史料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由当时的猎具和农具改制而成的武器，只有青铜造的白兵（刀、剑、干、戈、矛、戟、殳、弓、矢等），铁矛和铁剑到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才出现。中国最早的炮是越国发明并投入使用的，是用抛石弹杀伤敌人的机械，称为“投机”、“飞石机”、“发石车”等，据《汉书·甘延寿传》注引《范蠡兵法》称：“飞石重十二斤，为机发，行二百步。”由此可见，越国当时的武器、装备必定较为原始而简单，随着军队的出动，会将所有的武器、装备带走。故在石窟群中遗留的武器、装备和物资一定不会多，但也不能排除遗留少数青铜和铁制兵器，以及陶瓷之类等生活用品的可能性。花山石窟中出土的铁矛，是证明石窟用途和开挖时代的最有力的实物佐证之一，这个“宝中之宝”也为解开整个石窟群体系千古之谜，提供了一把“金钥匙”。如能进一步找到青铜兵器，那就更是铁证如山了。

七、后人是否会继续利用这些石窟群？这完全是可能的。后人为了某种需要，局部、少数、甚至个别地利用石窟来采石、仓储、居住等等，都是完全可能的，但不可



石窟内的原始凿痕

能全部利用。举一个现代地下军事工程为例：我国不少城市的人民防空工程，建成之后，平时封存不用。由于地下工程的温度比较稳定，有冬暖夏凉的特点，现在有部分就已被人利用，作为地下商场、旅店、餐厅、娱乐场，还有少数人防工程被用作存放物资、蔬菜和水果，甚至用来培养食用蘑菇等等。由于这种功能的转变，千百年之后，考古人员也许会有更多新的“成因”说，但从整体和本质上研究，都不能改变其本来的面貌，即人民防空地下工程。

千古石窟群具有重大的文化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根据现地的、考古实物的和历史的证据，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综合分析与研究，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花山、烟村和龙游石窟群，是属于春秋末期越国的地下军事工程建筑物。它们同属于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工程体系，并为同一战略目标服务。这些鲜为人知的千古石窟群，是中国最古老的地下军事工程，也是全世界最古老的地下军事工程。它和战国时代的万里长城，是我国地下、地上的两大最古老的军事工程，是中华民族古代文化历史的瑰宝，是人类文明智慧的结晶，也是不可再生的世界文化遗产，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旅游开发价值。同时，还应继续深入开展考古和学术研究活动，进一步寻找实物佐证，以求得共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谁翻译了《伏尔加纤夫曲》

● 达 生

《伏尔加纤夫曲》(又名《伏尔加船夫曲》)是一首著名的苏俄歌曲。它作为我国最早传唱的俄罗斯民歌之一,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传入中国,受到广泛欢迎。它激励了一代人,不怕艰难险阻,奋力拼搏,勇往直前,鼓舞他们走上革命解放的道路,并且得到现代人们的喜爱。它浑厚悲怆、沉重有力的音乐语言使人想起列宾的著名油画《伏尔加纤夫曲》,想起中国黄河、长江上的纤夫,想起中国的黄河船夫曲、川江号子和大路歌。

《伏尔加纤夫曲》中文歌词的译配通顺有力,琅琅上口,词意通俗而深刻。对照俄文原文可以看出,“齐心协力把纤拉”、“踏开世界的不平路”的翻译对原文又有新的升华。这首歌的译配至今已经经过了七八十年时间的考验,得到了音乐界和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喜爱。令人不解的是:这么一首著名的歌曲,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传唱,至今译配者却为“佚名”。到底这首著名歌曲的译配者是谁?为什么会这么长时间“佚名”?一直是人们心中的一个谜团。近来翻阅《艾思奇文集》偶然得到一条重要信息,又查阅了相关的一些文章,终于得到答案——原来这首歌的译配者并不是音乐界人士,而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艾思奇!

艾思奇作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在老一辈的广大知识分子和党员干部中几乎无人不晓,他的《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讲座和《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都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



1929年,艾思奇从日本返回昆明

响,但他在音乐界的贡献却鲜为人知。下面将我所查到的有关资料介绍给大家,以帮助解开人们心头的这个谜团。

1、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艾思奇文集》中刊有艾思奇年谱,摘录如下:

1928年(18岁)……艾思奇从日本秘密运回许多日、德、英等文的马列主义经典原著……还将一些革命歌曲带回昆明,并将《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交给聂耳在昆明教唱。

2、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9月版《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中所刊的艾思奇年

谱对这段历史也有同样的记述,并补充说明道:

艾思奇和聂耳是同学、好友,曾将世界音乐家名人小传赠给聂耳,向他传播马列主义,宣传革命思想。后在上海有更深的交往和友情。

3、艾思奇大哥的同学好友冯素陶(原山西省人大主任,共产党建党初期,云南早期共产党员,现已近百岁)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他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养病(兼有其他任务)时,带回一些世界作曲名家的传记,如《贝多芬传》等赠聂耳……又把《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译成中文教聂耳唱……(见《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21页)

4、关于艾思奇和聂耳的友情,邹高翔文章《哲学家在哲学之外》写道:

艾思奇和聂耳不但是同乡,而且是至交。音乐是他们友谊的桥梁……1928年,(下转78页)

发人深省的官署对联

● 赖某深

封建时代,许多官员往往在各级官署门口贴上自撰的对联。这类对联多有施政纲领的味道。由于撰写者的经历不同,抱负不同,处世态度不同,所撰对联内容也大异其趣:有的提醒自己廉洁奉公,有的告诫所属要安分守己,有的申明要秉公执法,也有的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嘴里讲清正廉明,背后却贪赃枉法。从文风上看,由于此类对联颇像安民告示,往往平白如话,通俗易懂,很少用典。

据《楹联丛话》,明代王阳明每赴新任,都要以两块高脚牌作为行队前导,两块木牌上写就一副引人注

目的对联:

求通民情 愿闻己过

联语简明扼要地表现了他的官风和政愿。林则徐任江苏廉访使时,也将这两句话写成对联贴在大门两旁。

清代余小霞任三防主簿时,题衙署联曰:

与百姓有缘,才来此地;

期寸心无愧,不鄙斯民。

将自己到该地作官看作是和当地百姓的一种缘分,表示为官要对得住自己的良心,不鄙视和欺侮百姓。

封建时代,尽管贪官污吏多如牛毛,“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

来”就是封建官场真实的写照,但是也有为数不少的官员把为政清廉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清代谢时雨任杭州太守时题大堂联云:

为政戒贪,贪利贪,贪名亦贪,勿务声华忘政本;

养廉宜俭,俭己俭,俭人非俭,还崇宽大葆廉隅。

在现代研究腐败的学者看来,贪婪不仅是指贪图钱财,贪名(即费尽心机,捏造政绩,为自己脸上贴金,想方设法为自己树碑立传)也是贪。谢时雨在几百年前即有如此见解,实属难得。

为政清廉不仅要严于律己,而且严格要求下属和家人。杨福五任漳州太守时题大堂联便是由此下笔:

第一严自己关防,其余则门内家丁,堂前胥吏;

凡百为斯民打算,即此是告天心事,报国经纶。

有些官署对联则是出语浅显,切中时弊。福建福安县署大堂联云:

什么叫做好官?能免士民咒骂,足矣;

有何称为善政?只求狱讼公平,难哉。

此联以自问自答的疑问句式,提出了做好官、行善政的最低标准,使人品出了为官清廉的难处。

广州郡守署中一联则是说的老实话:

不要钱原非易事 太要好亦是私心

惟一的尺度就是非分之财不取,不义之财不要。

封建时代的州县官兼理司法,因此判案公允、不徇私枉法便是许多官署对联的重要内容。桂超万任梁平县令时题大堂联云:

我如卖法脑涂地 尔敢欺心头有天

以赌咒发誓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心迹,也算难能可贵。

杨炳坤任息县县令时题大堂联则可看出他的良心未泯:

每施鞭扑心常惻 不事苞苴梦亦清

清末俞樾题江苏某官署联则谆谆劝告大家息讼,不要轻易提起诉讼:

听讼吾犹人,纵到此平反,已苦下情迟上达;

举头天不远,愿大家猛醒,莫将私意入公门。

清代杨昌濬题浙江某官署联云:

看阶前草绿苔青,无非生意;

听墙外鸦啼鹊噪,恐有冤魂。

清代古文学家吕璜遭受冤狱15年,昭雪后任浙江庆元县知县。他题大堂对联立意是,我不判错案,你也别告错人:

我也曾为冤枉痛入心来,敢糊涂忘了当日;

汝不必逞机谋争个胜去,看终久害了自家。

有些对联阐明了自己的为政之道。梁章钜任职荆州时,于厅事漫题一联云:

政惟求于民便 事皆可与人言

赵慎畛题桂林抚署二堂联云:

为政不在多言,须息息从省身克己而出;

当官务持大体,思事事皆民生国计所关。

有的对联则像安民告示。清代武承谟任无锡县令,接印前一天在县衙内多处悬挂对联,其中衙前照壁上的是:

罔违道,罔拂民,真正公平,心欺无忤;

不容情,不受贿,招摇撞骗,法所必严。

大堂联云:

人人论功名,功有实功,名有实名。存一点掩耳盗铃之私心,终为无益;

官官称父母,父必真父,母必真母。做几件悬羊卖狗的假事,总不相干。

这些对联贴出后,“四乡人皆聚观”。好人快意,坏人惊慌。据梁章钜《楹联丛话》记载:“时先声所夺,平日绅衿之出入县庭者,皆悚息危惧,有避至他省者。”对联作为一种舆论宣传,其威力之大,可以想见。

清代州县衙门大堂的前面都立有一座碑,碑面北,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意思是,你的俸禄都来自老百姓的血汗,不要以为老百姓好欺负,头顶三尺有青天,昧了良心是要遭上天报应的。这座碑称为戒石铭,又叫戒石箴,是皇帝用来戒飭官吏奉公守法,不得贪赃虐民的。

(上接76页)艾思奇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给聂耳带回许多世界音乐家的传记,同时还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见《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262—263页)

5、艾思奇的夫人王丹一在回忆文章中有如下记述:

(20世纪)50年代,美国男低音黑人歌唱家罗伯逊演唱的热爱和平的歌曲在中国负有盛名,艾思奇喜欢听他的唱片。他平时也常用有素养的男中音唱一些歌剧段子或外国民歌,每当他听到罗伯逊唱的《伏尔加船夫曲》时,便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这是一首反映劳苦大众心声的俄罗斯民歌。艾思奇对这首歌曲怀有特殊的感情,是

一些官署对联便从戒石铭立意:

阳奉阴违,天有难遮之眼;

民穷财尽,地无可剥之皮。

这是张公灿任无锡知县时的题联,语言质朴但含意深远。陈景登任晋州知府时,也在厅事自题一联云:

头上有青天,作事须循天理;

眼前皆瘠地,存心不刮地皮。

在今天看来,仅仅依靠道德说教,宣传因果报应的迷信学说来遏制腐败是不足取的。要使官员的权力不至于滥用,必须制定合理的制度和严密的法律,使权力得以制衡,这样才能使那些自律意识不强的官员不敢妄动。

也有一些贪官喜欢附庸风雅,借对联来标榜自己。清末,多琪到湖北浠水任县令。他一到,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民不聊生。某年除夕,他居然恬不知耻在官署悬挂一联:

奉君命来守是邦,两度蝶飞,只求对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其民共安此土,八年鸿爪,最难忘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俨然一副正人君子模样,可是此联当晚就被人改动了几个字,变成:

奉王命来虐是邦,两度蝗飞,哪管你头上青天,眼前赤子;

与胥吏共刮此土,八年狼藉,只剩得山间白石,寺里清泉。

揭出了他的老底。(责任编辑 赵友慈)

他早年从日本带回并翻译成中文,送给他的老乡、著名音乐家聂耳,并和他一道传唱。(见《人民的哲学家——艾思奇纪念文集》119页)

从以上资料可以推断:是艾思奇早在1928年将《伏尔加船夫曲》译配成中文,并交给聂耳在昆明首先传唱。由于艾思奇是哲学家,工作精力全在马列主义哲学的研究、宣传、教育方面,译配外文歌曲只是偶尔为之的业余爱好。他在译配好歌曲交给聂耳后,从未去关注过此曲译配者的署名问题。而聂耳这位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又英年早逝(1935年23岁时不幸在日本溺水逝世),也未来得及解决这个问题。终使《伏尔加纤夫曲》的译配者成为鲜为人知的“秘密”。

(责任编辑 李晨)

编 摘 信 来 者 读

我们订阅《炎黄春秋》已有五年了,周围的好多教师和单位都订阅它。下面谈谈读《炎黄春秋》的一些感受。

一、教师的良师益友——《炎黄春秋》

我多年来从事历史教学,历史课本来就枯燥无味,手头资料缺乏,讲起课来不活跃。自从订阅了《炎黄春秋》,我的课堂教学大为改观,在县、学校组织的大型公开课教学中,我的课一直受到师生的好评。有人问我,你知道的为什么这么多?我告诉他们,是《炎黄春秋》帮了我的大忙。在我的课堂教学带动下,一大批文科教师和单位都订阅了《炎黄春秋》。

二、《炎黄春秋》是一本思想性、知识性很严肃的杂志

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鉴出往昔的是非,可以辨出现实的善与恶、美与丑。贵刊刊出的文章,有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身经历和知道的是是非非,是真实的记录,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可信度很高。

我在讲到太平天国灭亡的时候,把《洪秀全在美女包围中走向灭亡》一文搬到课堂上,让学生了解洪秀全从41岁进南京城至52岁自尽,在美女丛中生活11年,从未走出天京城门一步,让学生了解到,太平天国灭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在讲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过去的教科书对他有评价。可《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陈独秀一案有了新说法》,开拓了学生知识面,让学生知道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了解史学前沿动态,陈独秀终于堂堂正正又归入了中共领导人的行列。

再如,中国近现代史结合课文插入的文章太多了,如,张学良、张闻天、叶挺、周恩来、彭德怀、胡耀邦、邓小平的南巡,改革开放的来龙去脉等等。

《炎黄春秋》是一本中国近现代史活教材,一些文章是近年来披露的原始史料,极为珍贵。由于正确的使用了贵刊,我的知识面拓宽了,学生的成绩提高了,特别是理解、分析问题的能力提高了。衷心感谢贵刊帮了我的大忙。

三、群书中的佼佼者——《炎黄春秋》

《炎黄春秋》以史为鉴的办刊宗旨,决定了它的严肃

性、真实性,实事求是。贵刊能否突破史的范围,多办一些像海外事、文配画这样的栏目。通过阅读贵刊,拓宽知识面,不仅用于教学,而且在生活方面得到启发。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学到很多现实生活中学不到的东西:淡薄名利,不被权势所吓倒,敢于坚持真理,等等。恳请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能把过去亲身的经历和所知道的史实,更多地发表在《炎黄春秋》上刊登出来,让读者拜读,留下珍贵的史料。

山东省泗水县特教学校、第二中学 汪龙义、汪会江

二

《炎黄春秋》的文章读起来令人回味,不少文章颇有史料价值。有的文章具有真知灼见,有的振聋发聩,有的仗义执言,有的文笔犀利,有的直言不讳。

本着贵刊愿与读者沟通的精神,我冒昧地将杂志编校方面的差错提出来供参考。2004年第1期61页右栏倒数第1行“第二任主席汉森(1825—1946年)”,其生卒时间可能有误,一个人活120多岁怕不太可能。第2期47页左栏倒数第2、3行“窃听器”应为“窃听器”。同页右栏倒数第2行“湮没的史事”应为“湮没的史实”。第2期79页左栏第15行“诺大的庄园”应为“偌大的庄园”。

彭光中

三

2004年第2期《炎黄春秋》的差错:第6页图文说明:“粟裕夫楚青和秘书鞠开”,显系“粟裕夫人楚青和秘书鞠开”之误。第14页右栏第10行:肖木突然惊叫起来:“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个就轮到我們了。”于会泳把“于会泳”的名字放在后面显然是多余;第15页左栏第3段第4行:他们召集市委警备区副政委李彬山……开会。警备区虽履行市委军事部和兵役机构的职能,但在编制上不在市委的序列,而属于军队序列,正确的称呼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第24页左栏小标题是:艺术创作中孕育出《禁锢的世界》,而在下面的正文中却多次排成《禁锢的世界》。第51页左栏第2段:今年7月,一位部委领导到南方考察……杂志是今年2月4日出版的,怎么把今年7月份的事写出来了?估计这篇稿子写的是2003年的事情,今年刊登时没把时间概念更正过来。

南化文

面谀与听谀

——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

陈四益 文 丁 聪 画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尽忠和尽礼都要求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哪里还有犯颜直谏,哪里还有面折廷争!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赶紧迎合、顺着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赶紧收起。这种迎合与顺从,同谄,确实没有太大的差别。

如果事情办好了,迎合、顺从似乎都成了大大的功劳。及至事情办坏了,尽管点子是主子出的,责任却常常落到臣、奴的头上,说他们“逢君为恶”,不能直言规谏云云,也算是活该倒楣。为臣的“六邪”,即所谓具臣、谀臣、奸臣、谗臣、贼臣、亡国之臣,其中一种就叫谀臣:“主所言皆曰善,主所为皆曰可,隐而求主之所好,即进之以快主之耳目。偷合苟容,与主为乐,不顾其后害,如此者,谀臣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上头说什么都欢呼叫好,上头干什么都说应当应当,暗暗探听上头喜欢什么就说什么、做什么、送什么,让上头听着看着拿着高兴。只要上头高兴,拍马屁、装孙子,随声附和,哪管原则,全不顾会给今后带来什么严重的危害。这样的人就是谀臣。

指责谀臣是完全应该的,今天的干部不能当谀臣。遗憾的是,即便今天已经没有了君臣主奴之分,有的人在精神上依旧没有摆脱奴才的地位。前面讲的“谀臣现象”,依然到处可见其现代翻版。有的人就是靠上所言皆曰善,上所为皆曰可,偷合苟容而步步高升的。孔子



说“六十而耳顺”。但过了耳顺之年的我却依然无法适应在公众场合对上级那些露骨的吹捧。“在某某的正确领导下,在某某的亲切关怀下,在某某的直接指导下……”诸如此类近于肉麻当有趣的谀辞,常常都听得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这种当面吹捧在一些地方已经成了官场惯例,习以为常,把封建时代的主奴关系带到了共产党里,从而败坏了党的风气。于是有人提出:面谀者,罢。凡对上级当面吹捧者,不管动机如何,一律罢免。这意见我赞成。矫枉过正。不过正难于矫枉。

但是,吹捧之成,总有两面。说的固然有过,听的难道就不负责任?人家这样肉麻地吹捧,被吹的人听着却安之若素,甚至面有得色,岂不怪哉!面谀总要有对象。没有爱戴高帽的角色,面谀者也就无所施其伎,即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所以,应当立一条规矩,在党内、政府内,上下级之间,禁绝一切无聊的吹捧。面谀者固然当罢,接受面谀而不制止、不批评的,也一样该受到处分。这样坚持实行一段时间,或许风气可以为之一变。诗曰:

面谀风行事可嗟,竞相仿效闹群蛙。
何当一扫歪邪气,云淡天清看物华。

本期: 终审 杨继绳

执行主编 李 晨

审校 赵友慈

欢迎继续订阅

《炎黄春秋》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 以史为鉴 与时俱进

《炎黄春秋》是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以弘扬中华文化、增进爱国大团结为办刊宗旨。对古今中外、特别是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是非功过，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不增美、不溢恶、不媚俗，求实存真，以史为鉴，以史资治，在林林总总的期刊之林中具有鲜明特色。

《炎黄春秋》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老革命家，是革命和建设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有的是资深的专家学者，对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在海内外读者中享有很高声誉。

2004年以来《炎黄春秋》订户逐月上升，希望广大读者下半年继续支持本刊，订阅本刊。

本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国内总发行：北京市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82-507 国内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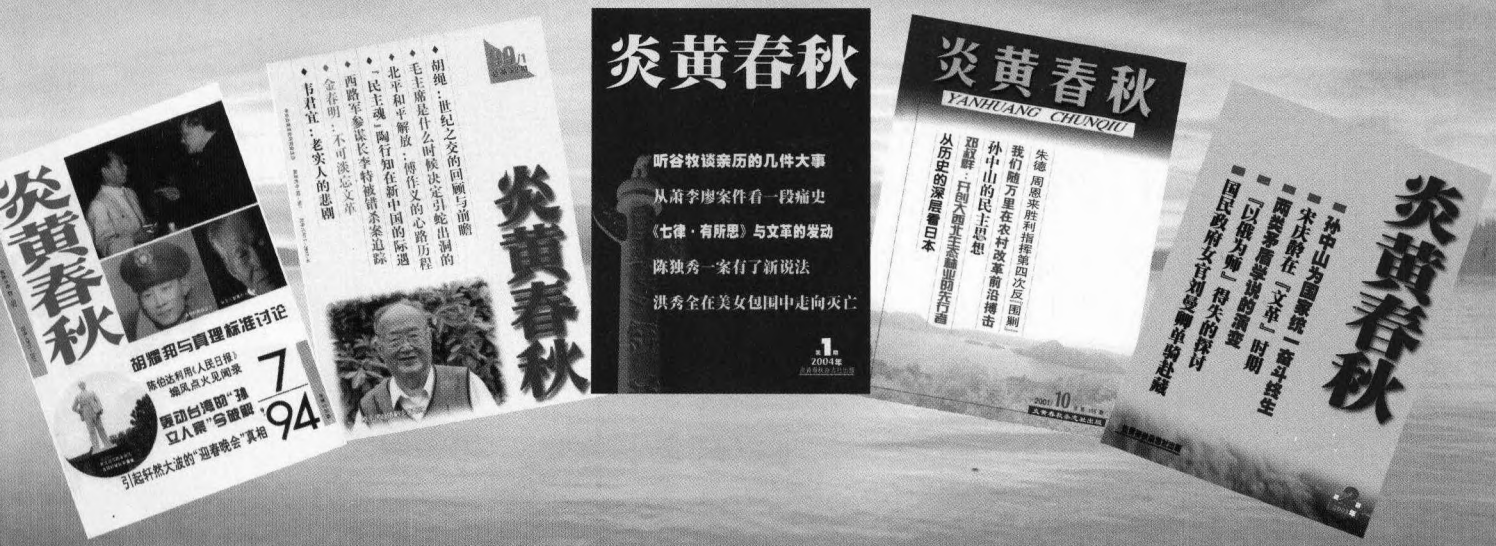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邮发代号：1274M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政编码：100045

电话：(010)68532048 68532569

如在当地邮局订阅有困难，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订阅，免付邮费。



- 董老指示我们“在商言商”
- 周恩来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
- 日据时期的台湾“文斗”志士
-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十大要闻
- 吕荧先生逝世35周年祭
- 张春桥追查“黑材料”的疯狂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